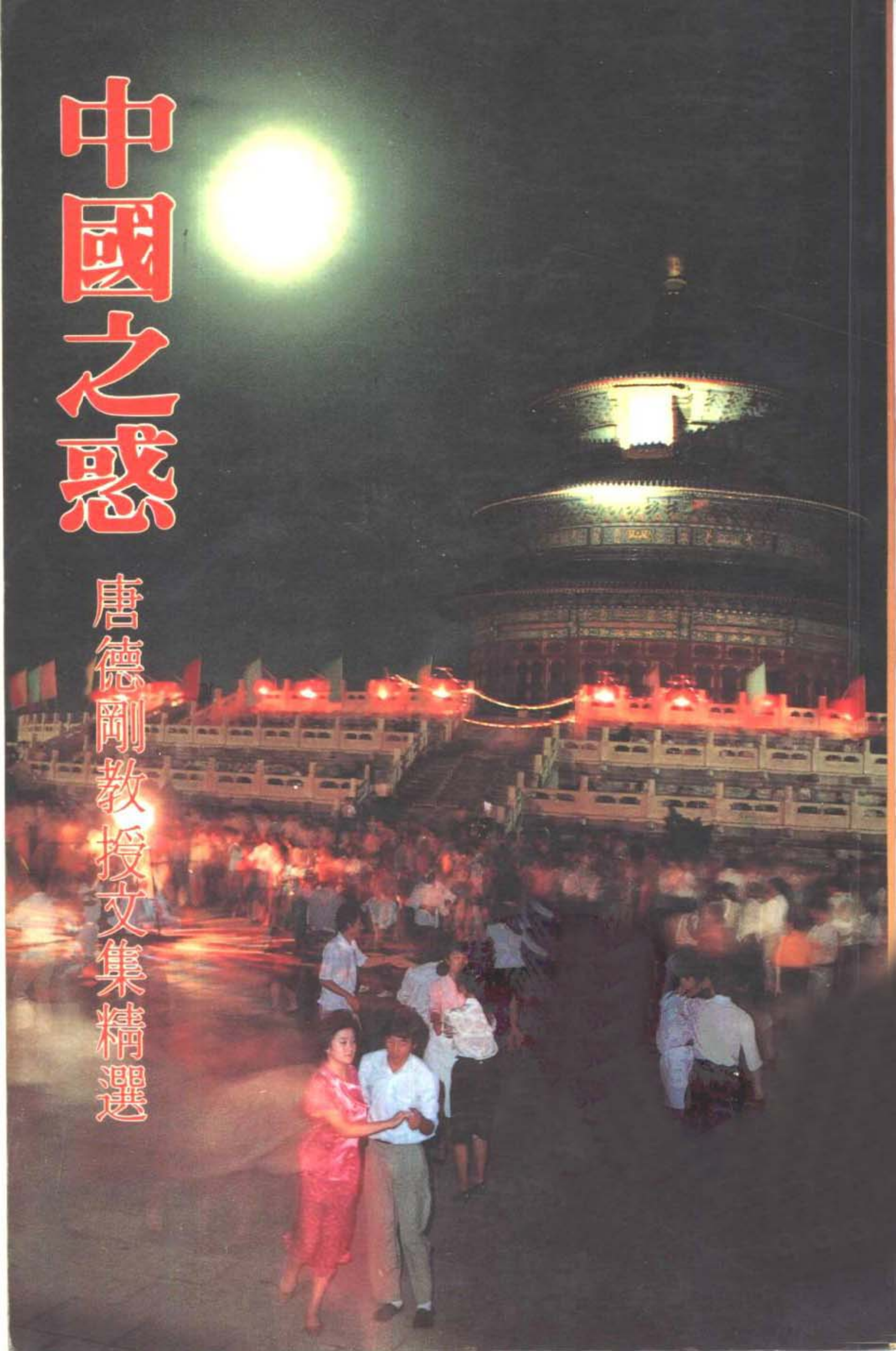


中國之惑

唐德剛教授文集精選



中國之惑

——唐德剛教授文集精選



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作者簡介

唐德剛

安徽人，一九二〇年生。國立中央大學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執筆者、《李宗仁回憶錄》執筆者。現任紐約市立大學亞洲系系主任。

著作：

- ① 李宗仁回憶錄一九七七（已有十種以上版本）
- ② 胡適口述自傳（傳記文學一九八一年出版）
- ③ 胡適雜憶（傳記文學一九七九年出版）
- ④ 戰爭與愛情（上）（下）（遠流一九八八年出版）
- ⑤ 五十年代底塵埃（傳記文學一九八一年出版）

序

陸鏗

謹以至誠，向讀者推薦唐德剛教授的評論文集《中國之惑》。

安徽出人才，以近代人物論，李鴻章、段祺瑞、柏文蔚、陳獨秀、胡適、馮玉祥、張治中、孫立人、趙樸初、楊振寧，皆聲聞天下，唐德剛教授其一也。

德剛，一九二〇年出生於合肥，今年足七十歲，年屆古稀，生氣蓬勃。其文章之生氣，更具振聳發矇之功。抗日戰爭期中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戰後負笈美國，繼續史學深造，在哥倫比亞大學得博士學位。遠於五十年代末期，即在哥大執教，與五六位老教授分教一門「漢學概論」，德剛分到之課，乃「論雜家」，由於求學時代早已遍讀雜家著作，功底深厚，治學授業，發而為文，自己亦變成「雜家」，新詩、舊詞、散文，小說無一不寫，政論尤顯其「雜」之特色，更難能可貴者，其文風別具一格，寓意深邃，而妙趣橫生。文字之運用，已入化境，嬉笑怒罵，超凡拔俗，既有韓昌黎之雄渾，又富蘇東坡之俊逸，兼具馬克·吐溫的辛辣和海明威的天真，尤可敬者是他有一顆熱血沸騰的中國心。

1 序

讀德剛之文，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中國心的跳動。即使他以春秋之筆，批評時政，毫不留情，有如其

II 序

鄉賢包龍圖之嚴峻，仍然流露充沛之民族感情。

詩人聞一多在《祈禱》一詩中有句：

「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

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

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

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

唐德剛教授的《中國之惑》，就是最好的回答。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感恩節

目錄

序	陸鏗	I
毛澤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政策		1
知識分子算老幾？		
——再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17
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與統治者的控制手段		
——三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27
要有個駕駛執照		
——國共是非談之一		42
向麻將客學習		
——國共是非談之二		52
小鳥吃餅的時代永不再來		
——國共是非談之三		69

鄧蔣兩公百年後

——海峽兩岸必須面對的變局……

89

十載功勳才一半

——為鄧小平半途結賬……

109

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鄧小平變法」

三訪大陸……

「惑」在哪裏？

——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

137

民權初步

——讀《胡耀邦訪問記》的感想……

123

為國共兩黨臉紅

——讀「中英協議」感慨萬千……

171

迎鄧，慰蔣，勸台獨

為「五四」結賬……

184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胡適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紀念演講會講稿……

177

「銅像」遲早會出現的

——紀念雷震先生逝世十周年……

213

王賡武天降大任……

224

有幸有不幸

——美國華人作家看王蒙……

232

毛澤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政策

毛主席不是選出來的嗎？

毛氏罵國民黨不民主罵了一輩子。但到他老人家自己晚年的時候，却對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的「選舉」，提出了公開的否定（早年的毛澤東因為聲威未定，心裏敢想，口不敢言）。在文革後期毛氏一再的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見毛主席「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毛氏又說他認為周恩來當總理是「中央派的」。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所規定的選舉這，選舉那，都是空話。但是毛主席不是選出來的嗎？如果毛主席不是選的而是自己派的，那又何必假惺惺地搞一套「人大」「黨大」的假選舉呢？既然搞了又何必當眾戮穿呢？

這一點，事實上共產黨就比國民黨慫直可愛！到今天的「台灣有三害，立監國大代」還不是厚着臉

皮硬說自己是國民公選的嗎？

毛氏分明知道「選舉」是假的，而他自己又有勇氣加以拆穿，但在他統治下的人民中國却一選再選，又是什麼道理呢？這個毛澤東思想中的結，毛氏自己一直未解開，其實，其中並無什麼深文大義。「選舉」這個東西自古希臘貝殼投票開始，到今日大美帝國二百周年大選，一直就是都市小資產階級所搞出來的「上層建築」。它與無產階級本無親戚關係。倒霉的無產階級在鬥爭過程中不幸地被都市小資產階級洗了腦而不自覺，因而也搞起選舉來。選舉對於無產階級來說，直如鄉下哥哥學文化，脫下草鞋穿皮鞋，打領帶，結果周身不舒服。毛澤東之所以比列寧偉大，就是毛老大箍上了這一條林語堂所謂的「狗領」的領帶，不舒服時還敢公開否定，而列寧這個鄉下哥哥，雖然當眾出醜，却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選舉」這個「文明字眼」，不過是諸端之一耳！其他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文明字眼」被無產階級仁兄們借去佩帶的可多着呢！文革以後，知青下放者，一千二百餘萬人。遵從毛主席的教導，向貧下中農學習，抓革命，促生產，本是革命青年的本份。但是下放久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知青，個個都感到無「前途」，感到「苦悶」，而滿腹「牢騷」蠢蠢然有泗水之志焉。試問「前途」，「苦悶」，「牢騷」等等「文明字眼」，又豈是無產階級的東西？

朋友！「前途」這個概念，和「苦悶」、「牢騷」等諸種心理狀態一樣是「凡知識分子皆有之」的通性，它們也是和小資產階級分不開的！試看社會主義革命中，最革命最前進的貧下中農就不想什麼「前途」，不感覺任何「苦悶」，也不發什麼「牢騷」，所以毛主席稱之為「倚靠階級」！那些被集體下

放的「一個跑，一個跳，一個吃人，一個吃草」的東西，就有點「靠」不住了！

無產階級的昇華

一言以蔽之，「無產階級」——包括貧下中農的「無產」階級（non-property class）——不能有「知識」。一有知識，它就要發生昇華作用，不論「有產」（property）或「無產」（non-property），都會轉化為「中間階級」（middle class）。中間階級自有其中間階級的世界觀、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但要自由，要平等，還要食有魚，出有車。而推動這一昇華作用的動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是「經濟」重於「文化」。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文化是跟着經濟上升的。但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則適得其反。因為教育起飛究竟比工業起飛要容易多了。不說兩者同時起飛，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二者之中有一個一飛冲天，則馬克思主義，就要不「修」自「修」了。

列寧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北歐老毛子就沒有懂得這個道理。他體驗到共產主義在英國搞不起來，乃喟然歎曰：「英國的工人，被資本家收買了。」其實不是。英國工人並不是被資本家收買了，不革命了。而是英國因為各種因素的驅策（包括對海外殖民地的剝削）而經濟起飛了。資本家固然賺大錢，工人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也同時提高了。一次大戰前後的英國工人已不再是馬克思所說的「普羅階級」，而是具有中產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了。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一類的口號失去興趣，而轉向「巴厘滿」立法的和平轉變。這便是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執政的社會背景。到七十年代的今日，英國共產黨亦已

擯棄莫斯科而走工黨路線，其道理亦在此。

這一無產階級的昇華現象在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尤其顯著。今日美國總人口約兩億，而美國工聯和產業職工總會（AFL-CIO）的會員總數約合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如加上會員的家屬則是美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的人民是美國「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內的正規軍。要搞「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那應該是他們專政了。相反的，美國的第一大工會的AFL-CIO是如眾周知的相當反動的團體。搞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以血汗工資接濟的在大學裏讀書的兒女。而最反對他們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左傾的下一代。

越戰期間，美國民意測驗表示得最清楚。凡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往往是最「反動」的地區。那些資本家和「高級知份」所住的地區，則反而較為「進步」。這一現象其實並不費解，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美國產業工人早已不是馬、恩、列、史、毛所想象的普羅。他們和英國工人一樣，早已由普羅階級昇華為小資產階級了，他們除每周三十五小時的工作之外，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早已中產階級化了。

朋友！你能說那賺兩萬美金一年的通用汽車廠內的產業工人是普羅階級嗎？他們有洋房有汽車，冬有水汀，夏有冷氣，看的有彩色電視，玩的有捲毛洋狗。縱使有點「剩餘價值」給人家「剝削」了，也就算了。去鬥爭，去專政，實在犯不着了。

美國工人固然得天獨厚，其實西歐的工人的中產階級化也只是程度的問題。既然大家都是中產階級，所以大家也就搞搞中產階級的巴厘滿衙門的政治也就夠了。什麼「暴力」，什麼「專政」，還是讓那

些「國際「毛派」(Maoists)去搞算了。

君不見擁有黨員數百萬的法共和意共乎？他們要搞議會政治了，反對俄共的「剝削人權」。他們主張「信仰自由」「文藝自由」。人數較少的西共，對這些「文明字眼」也大有興趣。他們認為他們鄰家的葡共所以搞糟了，就是葡共盲目走莫斯科路線，搞一黨專政，弄得眾叛親離，全國喊打的結果。

須知葡萄牙這個小國是西歐最落後的國家，人口至今尚有三分之二是文盲。這樣落後的國家莫斯科路線尚且走不通，如走北京路線那就更是緣木求魚了。

對這種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昇華之道，一無「實踐的知識」的我們偉大的毛主席，面對這種世界性的發展，難免就傻了眼了。毛澤東思想本有其正確性。毛氏反對書本子知識，認為只有實踐的知識才是知識，基本上也不能算錯。可是毛氏也有他自己的「矛盾論」裏所不能解決的矛盾。因為七十年代裏世界經濟社會和學術文化的發展實在太複雜了。那個垂釣於中南海的八十老翁是無法「實踐」的。不能實踐，他也就只有靠書本知識了。

更不幸的是毛公那個偌大的書房之內的書本子所能提供的「知識」，實在也很有限。那一部據說毛氏真的一本本地讀完了的，八百本的綫裝二十四史內的英雄人物們，就沒有一個是屬於汽車階級的。

那一堆據說毛公讀後會與蘇聯權威理論家由定(P. F. Yudin)有過長期切磋和辯難的漢譯洋書，也只是些結論完全相同的一家之言。就憑這點點脫離實踐的「書本子知識」而盱衡世界革命，慨歎人心不古說「世界上一百多個共產黨，已經有一半以上不相信馬列主義了。」那就有點以偏概全，脫離現實

了。

試問那些法共意共西共英共，乃至美共加共和拉共（拉丁美洲）就完全忘却階級仇恨不想搞無產階級專政了嗎？

非也！他們是非不爲也，是不能也。他們底黨在部分地戰勝了資本家之後，黨的本身也早已中產階級化了。關於階級鬥爭等等傳統的老把戲，他們貴黨，既不能搞，也不想搞，更不必搞了。

我們「鬥志昂揚」的中國無產階級的戰士們，不去實踐地瞭解人家的牌底，光是坐在井底訕笑他們，那難免就如林姑娘所說的「不怪自家無見識，翻將醜語詆他人」了。

人民內部的惡性循環

不過話分兩頭。以上所說的無產階級昇華的現象，在目前是只能發生在經濟和文化雙重起飛的工業化的社會裏——也就是所謂「先進的國家」底社會裏。至於那些今日仍是文盲遍地的「落後地區」或「第三世界」裏的情形，自當別論。

七十年代裏的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事實上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也就是說既非先進，也非落後；既是先進，也是落後。近三十年來由於國共兩黨努力普及教育的結果，知識分子在全國人口比率上激劇上昇。而在同一時期裏，工業化在國民經濟中的百分比則上昇得有限。換言之即是中國（尤其是中國大陸）在今日仍是個農業國家，它那以農爲本的社會經濟基礎還不足以負荷那個有高度中間階級意識、並

且日益壯大的青年知識階級。

這個萬分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有限底工商業的都市社會無法消化的情況之下，就只好由黨和政府強制「下放」。但是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仍是很原始的。那些滿腹「代數」「幾何」和「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青年，一經「下放」則除了向貧下中農學習些體力勞動之外，滿肚皮的「知識」却一無所用。因而近十幾年來的大陸就發生了一種怪現象。政府和黨一面大力普及教育，大量製造「知識分子」，而另一面則大量浪費「知識」。

同時正因為「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是和「小資產階級」分不開的，因而大陸上還有一種更嚴重的矛盾現象，那便是共產黨一面正冷酷無情地打擊和消滅小資產階級，另一面却在大量製造小資產階級。這是一個「人民內部的矛盾」，也是個辯證唯物主義對立和統一的領域之內，很難解決的惡性循環。

林彪這個叛徒，口不擇言地說知青下放是「變相的勞改」。知道解放前中國社會情況的老頑固們至少也可以說那是「學非所用」。既然「非所用」，那又何必「學」呢？一學就學出了問題，因而要把他們送到農村去由貧下中農來加以「再教育」，這豈不多此一舉了嗎？青年人一生下地就乾脆不受教育，直接去做革命的貧下中農，豈不省事？

從「省事」這一點來着想，我們不禁感覺到我國古代的秦皇漢武實在是聰明。秦始皇認為最「省事」的辦法，便是「以愚黔首」。秦始皇之道雖被漢武帝「修正」了很多，但這「以愚黔首」的原則是基本上被承繼了。終我國帝王兩千年之治，「黔首」是被他們「愚」得夠慘了。

有一位美籍華人教授，讀了蔣總裁「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遺墨而大不以爲然。他認爲那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比蔣氏高明多了。其實教授有所不知，顧炎武所說的「匹夫」並不是貧下中農！顧氏所說的「匹夫」正是你們大學教授那一層唧唧喳喳的匹夫呢？與市井小民何有？

老實說兩千年來真想搞「匹夫有責」的還是剛剛去世的毛主席。他要把「國民黨留下來的」匹夫全都搞掉，然後再從貧下中農的階層內培養出一批新的匹夫來。可是他老人家搞了二十多年，還是搞不通，現在也不能搞了。

文法科大學不必辦了嗎

文革以後，毛主席不是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換言之就是「文法科大學大可以不必辦了。」縱使爲着貧下中農的子弟，文法科的大學爲什麼不必辦了呢？其理甚明。秦始皇焚書，所「焚」的也只是文法科大學的「書」，理工科大學之書，也不在被焚之列。

不幸的是我們的毛主席並不相信美國那個反對工業化、主張小農制的桀符生，而相信德國的馬克思。他要搞大農制和工業化。這樣，則「老農」和「老圃」的知識就不夠用了。所以他還是要辦「理工科大學」。中學呢？當然更要辦了，因爲中小學是國民基本教授，豈可不辦？如此，則毛氏便吃了近三百年來洋框框裏發展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形式主義的虧而不自覺。他根本不了解普及的自由教育是甚麼回事。

美國教育家杜威，曾總結三百年來西方自由教育的經驗而提出「教育除教育本身以外無目的」的口號。中國傳統教育的宗旨原來也是一樣的。在理論上說，中國傳統教育的目的也只是「讀書知禮」，並不爲着發財吃飯。

西歐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以後的教育，也是爲教育而教育的。「教育」並不等於「職業訓練」。可是在西歐工業革命之後，社會上的各項職業開始專業化。因而專業化的職業訓練，也漸漸侵入教育界，變成教育的一部分，甚至轉而喧賓奪主。爲教育而教育的教育機構反而淪爲國民基本教育的中小學，所謂「高等教育」便逐漸被專業化訓練科目所獨佔了。大學變成了專業化的職業訓練班。那原是最下乘的開火車頭的火伕們（engineer）的知識，也居然變成大學裏的專修科了。那些打算盤搞買賣的生意人和衙役皂隸的知識不用說也擠入大學校園之內變成了條理分明的學問。

學究老夫子如杜威者流，面對這一發展，逐漸看不順眼了，慨歎人心不古之餘，他們要搶救被科學和機器所場糟了的人類文明，因而提出他那有名的「杜威教育哲學」來。經杜威這一呼籲，西歐北美東亞甚至蘇聯的教育均大受影響，所謂「自由教育」和「人文學科」（liberal arts）在高等教育總算保持了一部份。今日歐美大學本科低年級學生不急於選擇專修科系，便是爲教育而教育的中小學教育之延長。受足了國民所應有的人文教育再進而接受專業化的職業訓練。

所以中小學和大學裏的低級班，在今日西方是純粹爲教育而教育的人文學科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大學高班和研究院則是高度專業化的學術訓練。理工科高度專業化；文法科也是一樣

高度專業化。「隔行如隔山」，「一行不到一行黑」。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裏，無論那項建設——如「五年計劃」，都市設計，環境污染之處理等等——都是千百個各行各業專家通力合作的心血總結晶。在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裏是沒有甚麼叫做「通人」的。

中國古人說「不讀三通何以爲通人？」在今日高度分工的社會裏，你熟讀「十通」，可能仍然是「一竅不通」。因爲高等常識，並不能代替「一技之長」。無「一技」之長在一個分工極細的社會裏是很難插足的。因爲有「綜合之才」的行政管理人員，也是「專材」，不是「常識」可以應付得了的。

試看亨利·福特以後工業界沿用未變的「流水作業制」(assembly line)在當初這一制度簡直被認爲是「工業學大慶」的不二法門。但這一制度在超工業化的國家裏已漸被廢棄，其主要原因便是在這一制度內，工人都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但人畢竟是人，他還有究竟與機器不同的部分。這一部分如不開刀割除，則人與機器完全混合爲一（如卓別靈的名劇「摩登時代」中所表演的），終難全部協調。尤其是在高度工業化之後而經濟文化雙重起飛的社會內，「人」的「知識」被提高了之後，這一個把人當機器零件使用的制度，就開始出毛病。現在造小汽車馳名的瑞典的烏烏汽車廠(Volvo)就正在試用一種新制度來代替效能遞減的流水作業制。而這一新工作制之試行則有賴於各種工程師，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工商管理專材，生理學家，醫護人員，乃至文學藝術家等等之通力合作、分析與設計。

一個小小工作制度之改進，其牽涉各種專業人員之廣泛有如是者。若談設計範圍之大，牽涉之廣，

影響社會人生之深遠如中國之「五年計劃」者，則又當何如？如果吾人對已發展與超發展的社會型態，毫無所知，而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前途只是理工科大學而已，這種概念在稍有深度的學術圈子內，聽者之間但相視一笑而已，因為它不值一駁。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毛氏似乎主張大辦國民教育的中、小學。中小學教育是個甚麼東西呢？中、小學教育是國民常識教育。不是專業教育，是杜威的「教育就是教育的目的」；是孔老二的「有教無類」。在今日中國也可說是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常識教育。

須知在杜威哲學之下成長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只是為訓練中學師資而設的。杜威還有杜威的另一面，他絕無反對「專業訓練」的意圖。而今日中國，只搞常識教育，專業訓練則只限於「理、工」。『文、法』似乎無「專業訓練」之必要。這就變成了「半部杜威」了。

想不到有指導「超西方」(post-Western)工業化社會發展潛力的毛澤東思想，在教育上所承繼的只是「半部杜威」和「半部論語」，能不令流落在海外的華裔知識分子洩氣！

再者這些奇談怪論出之於毛主席之口是情有可原的。他老人家是住山洞出身的第一代革命領袖，有其樸素的革命傳統。老實人說真心話，這是樸素的偉大革命者，可敬和可愛的一面。他們不像一般政客的搔首弄姿，裝腔作勢。但是他底樸素言詞，第二代接班的領袖們如果竟愚昧到信以為真的程度，那八萬萬炎黃子孫就要開始養癰子來革命了！

何以「知識分子最無知識」

毛澤東主席還有一句最動聽的口頭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

這我們也相信是他老人家的真心話。不是受了知識分子的氣，咬着牙齒說出的憤激之詞。因為毛氏對「知識分子」這一社會現象的「實踐知識」還停滯在「前工業化」(pre-industrialization)時期，而沒有跟着時代進步。

心理學家知道，一個人未跟着時代發展的少年時期的經驗往往下意識地支配着他老年時代的思想和社會行爲。這一心理現象，在近代中國舊式家庭裏，頑固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們身上表現得最明顯。

抗戰勝利之初，我們那孝思不匱的蔣主席回到奉化之後所料理的第一件私事便是重修蔣氏宗祠。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所有國代、立委自然更搞得全國家廟林立了。可是委座有所不知，宗祠、族譜這些東西原都是社會流動性極小的農業社會裏搞「五世同堂」的產物。在高度工業化以後的「三民主義的社會」裏是不可能延續的。

蔣公過世，經國先生爲念先帝之遺德，對蔣氏宗祠可能還不時祭掃。到孝文、孝武兩兄，恐怕就要陽奉陰違。再到他二人哲嗣的時代，恐怕祖先牌子就要變成拍球拍子了。

蔣公身爲總裁，是國父遺教的承繼者，爲甚麼對三民主義道路上的社會發展如此茫然呢？無他，總裁日理萬機，那有工夫去研究社會學呢？對三民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未弄清楚，所以就被潛伏在他下意

識中未經發展的少年時代的經驗所主宰了！

在一個大家庭中，一個獨裁頑強的老祖父，往往會搞得一家人啼笑皆非。大家明知其落伍還是要奉承顏色，鞠躬如也，好讓他老人家含笑歸天。可是一個國家如被這樣一個老祖父所主宰了，其情況就只是啼笑皆非了。

且說毛主席心目中的知識分子，顯然還是「五四時代」胡適，陳獨秀，梁漱溟……一類的知識分子。那是一個從中古農業社會向近代化工業社會發展的「轉移時代」(transitional period)。這時代中的知識分子的特點甚多，舉其要者：(一)人數少，以稀為貴；(二)常識豐富，新舊中西，樣樣都來；(三)談起專業則一竅不通。這種知識分子中的「大師」們，就好處來說，功在「啓蒙」；就壞處來說，那就是「膚淺」。膚淺而硬要裝腔作勢，那就變成毛澤東所說的「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但別小看他們。他們自有不朽的影響。時勢製造了他們，他們也製造了時勢。他們不需要像江青同志他們那樣硬幹，便佔領了文化、宣傳、教育各要津，掌握了一切的公共知識交流的媒介 (public media)。北京一屁，舉國聞香！其中有雄辯之才，和常識特別豐富的少數，便容易譁眾取寵。

胡適之先生那時便是常識最豐富，辯才最敏捷的一位。他不論中西，不分文法，都能頭頭是道地吹出一大套來。那些只通一經的老學究吹他不過。心服口服的便歎為「中西之學俱粹」的異才。口服心不服的如黃季剛者流，則公開的在「紅樓」之外解小便，以示抗議。

但是吾人試翻翻周策縱先生所編的「五四資料錄」看看這些人當時在吹些啥子，我們就知道他們吹的是：「科學」、「民主」；「國故與西化」；「問題與主義」；「科學與玄學」；「宗教與美學」；「水滸傳與紅樓夢」等等。其中最偉大的則是梁漱溟先生。他搞的是包羅萬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但是你如問問他們一些具體的小問題，他們不是不屑一談，便談而荒誕。胡適之先生那時就主張「談」問題；李大釗就要「談」主義。其實李大釗的肚子裏就沒有多少主義。胡適能說會講的嘴巴裏，也「談」不出多少真正的問題來。

君不聞適之先生晚年醉心「兩黨制」嗎？他老人家忽然心血來潮，搞起毛主席的「一分爲二」來。他以爲把一個老大的國民黨劈頭一刀，一半變爲國家黨，一半變爲人民黨，台灣就立刻變成「兩黨制」了。當然蔣總統認爲這只是「書生之見」未加理會。恐怕「我的學生毛潤之」對「我的朋友胡適之」這一主張便更覺得幼稚可笑。在毛學生看來，胡老師的三十六頂博士方巾，實在抵不上韶山冲裏，貧下中農的一個草帽子！其然哉？豈不然哉？大師猶且如此，則二師、三師之流，不用說更是自鄙以下矣！

不特此也。最壞的還是現代中國的永不退休制。不但「主席」、「總統」、「國代」、「立委」不退休，名流學者，又何嘗退休？六十年前，就讀完全套「大英百科全書」的青年學者，雖然六十年後大英一科全書也讀不了，還不是杏壇高據，絳帳春風，繼續指導其博士弟子嗎？

可憐的是我們湘潭土包子的毛老大，六十年前在北大做「二十八劃生」時代，「紅樓」之內，吹牛無份。「紅樓」之外，小便不敢。但他底秉賦是聰明的，觀察是銳敏的。他所見所聞吹牛小便之士，不

過如此！及至他乘龍跨鳳，位躋九五之時，他所見所聞的在國共和議，人民政協上夸夸其談的，以及後來在海外反共，海內搖尾的，還不是那幾位？這些「分子」名則名矣，但是究竟「知識」到哪裏去，就大有問題了！

朋友，你如默坐沉思，想想中國六十年來的文化班底，和他們底社會行爲，你能說毛主席的名言「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沒有科學根據嗎？他要停辦文法科大學，是荒謬絕倫嗎？

毛主席是不是知識分子

但是，糟糕的便是毛主席本身是不是知識分子呢？蔣總裁會說：「你讀書，我就不讀書？」依樣畫葫蘆，吾人如「捨得一身剮」也反唇相譏說：「我們是知識分子，你姓毛的就不是知識分子嗎？」

還有，知識分子是否就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呢？未發展、發展中、已發展和超發展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質」和「量」，以及它在社會上所扮的角色，是否完全一樣呢？

事實上，毛公不但也是個知識分子，他還是個老牌知識分子。他底思想、觀念等心理現象是屬於休而不退的「五四遺老」那個範疇之內的。不同的是毛公有權，其他遺老則連個老婆也管不了。當然，「毛澤東思想」亦有其「捲上珠簾總不如」的一面，否則他也「奪」不了「權」。

可是毛氏——和其同輩的國共兩黨內的理論家們一樣——顯然是不了解一個落後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蛻變所必經的程序。他以偏概全地把各不同時代和各種不同的社會所產生的各

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籠統歸納到他少年時代經驗之內，而一鍋醢之！他犯了他自己所立的「無調查研究，便無發言權」的戒條。因而提到知識分子的問題，就難免瞎扯淡！

原刊《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十月號

知識分子算老幾？

——再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本文析論列寧所謂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原是沒有的。毛澤東變通之，將中國知識分子一分爲三，加以「統戰」或「打擊」。一方面要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培養未成功之前，對知識分子採行各種不同的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前兩年，有一天孤獨的毛主席閑居無事，便找他最寵愛的小姪女王海蓉來聊天解悶。主席問她看過「唐詩別裁」、「聖經」和「佛經」沒有。

「不讀，」海蓉鼓起小嘴說，「要讀這些東西幹甚麼？」

「要做翻譯，又不讀『聖經』、『佛經』這怎麼行呢？」主席說，「你讀過『聊齋』嗎？」

海蓉當然更未讀過這些鬼呀、狐呀的非無產階級的壞書。主席說「聊齋」可以讀。「聊齋」上寫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幫助人可主動啦！

主席又問海蓉，「知識分子」英語怎麼講？因爲主席這位老童生，雖然老了，還在學英語。海蓉的英語顯然比主席的也好的有限。她答不出來。主席有點失望了。

「我看你這個人，」主席指着她底小鼻子，搖搖頭，笑笑說，「學習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識分子，又不會講『知識分子』這個詞。」

海蓉沒辦法，只好去翻她那本「漢英詞典」。說也奇怪，她那字典裏有「知識」，也有「分子」，就是沒有說明把「知識」和「分子」加在一起是個甚麼東西？主席不相信。他老人家把海蓉的字典拿過去，再戴上老花眼鏡，翻了半天也找不出個「知識分子」來！

「這本『漢英詞典』沒有用，」主席取下眼鏡，搖搖頭，「回去後要你們學校編一部質量好的『漢英詞典』，把新的政治詞匯都編進去，最好舉例說明每個字的用法。」

海蓉返學後自然反映了她家長的意見。海蓉的學校是北京城內第一流的外國語學院，人才濟濟。一年之內，不消說一本「質量較好的」漢英詞典就出現了。那字典裏不但有「知識」有「分子」，也有「知識」加「分子」。在這本書（一九六四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英時事用語詞匯」）裏，「知識分子」的英譯是「英特萊克區」，和「英特里梗崔」二兄弟。前者是英語的「嫡系」，不折不扣的英語；而後者却是一個「乾兒子」。原文是俄語，在英文裏因為找不到同義字，所以把俄語拉丁化，成爲英文裏的「外來語」。

是親生子呢？還是乾兒子？

但是中文「知識分子」這個詞，譯成英文，究竟是英文中的親生子呢？還是乾兒子呢？這兩個字一

英一俄，意思雖相近，但是涵義並不完全相同。「英特萊克區」(intellectual) 在英文中是指受過高等(或相同)教育以上的專業人員如教授、醫師、作家、工程師、報刊編輯、戲劇編導員、發明家、各業高級研究員等等。社會上一般受過普通乃至大學教育的人民並不包括在這一概念之內。所以「英特萊克區」的涵義事實上是今日中國大陸上所謂的「高知」。因而在同一字典內編者們把「高知」譯成「高度合格的『英特萊克區』」就不正確了。

中國近代語文上所用的「知識分子」一詞，原自舊時代「讀書人」(官名曰「士」)這一名詞蛻變而來。在舊中國大約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民是讀過書的。所以一讀詩書便與眾不同，自然就是「士子」或「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中再就讀書之多寡深淺而分成等級。郭沫若、馮友蘭、錢學森、姚文元等就變成「高知」；一般中學教員、技術員、黨委、書記等則是普通知識分子；那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大、中學生和紅衛兵等，則是「知青」。不管三級或九等，總之都是屬於「知識分子」範疇之內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便不是英文裏的「英特萊克區」，而是俄文裏的「英特里梗崔」(intelligentsia)了。

革命前的俄國和解放前的中國情形很相似。兩處都是教育落後，文盲遍地。「讀書人」是少數中的少數。「物以稀為貴」，少數受過教育的人自然也就特殊化起來。我國自古帝王和當今的政治領袖們，都爲了這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所謂「讀書人」傷透腦筋。俄國革命後亦然。當時列寧對那佔俄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兵大眾，駕馭得輕鬆愉快；唯獨對這七嘴八舌的少數受過教育的「英特里梗崔

「感到窮於應付。斯大林後來大殺了一陣，但並未能解決問題。今日的布日茲涅夫仍然還不知道如何應付他們才好。」

中國的「反英特萊克區主義」

不用說中國的國共兩黨，也是很討厭「英特里梗崔」，尤其是「英特萊克區」的。這一政治心理狀態，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上叫做「反英特萊克區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據說國民黨蔣總裁生前便最討厭人們在他面前說「我們讀書人」如何如何的。傳聞王世杰有一次不小心便說了這一句犯諱的話。總裁面色一變說，「你讀書，我就不讀書？」倒楣的王世杰就丟官了。

國民黨以前的重要派系，以及今日在台灣的當權派，也是最討厭高知的。他們認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概括名之為「自由分子」）在政治上動搖不定，却專喜搞「毒素思想」。但為抵制中共的「統戰」，他們也從而統之。他們統戰的原則很簡單，那就是捧我者作官，違我者坐牢。李敖、柏楊嘴尖膽大，坐牢如儀；那些隔洋椎胸，把共產黨罵得血淋淋牙癢癢的自然也可特邀封賞。至於「英特里梗崔」仁兄在當今政治上、社會上，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究竟算老幾？他們是一概不管；也一無所知，更不願知道。

中共在這方面比它底難兄國民黨要高明一籌。他們知道知識分子不大好搞。雖然毛主席老早便下定決心，要把知識分子「脫褲子，割尾巴」，而中共在立黨之初便訂立了循序而進的「知識分子政策」。

政策之後，也有一套完整的列寧主義教條和毛澤東思想。

列寧說「英特里梗崔」仁兄本身無階級性。他底階級成份應以他各個體出身的階級成份來決定。出身於資產階級的便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於工人階級的自然就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家雖同爲「知識分子」，但在「階級意識」上却有革命與反革命之別。多數黨應就不同的階級意識，對他們分別處理！

列寧這一理論搬到中國來，可就成了問題。前已說過，古老中國的知識分子原是土包子，土名曰「讀書人」。讀書要用錢，無錢還「讀」啥「書」呢？所以敵國在解放前沒有甚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加以近百年來，父祖輩不爭氣，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我們也未發過大財，所以也沒有甚麼「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的知識分子多半出身於中、小地主，中、小商人，和中、下級公教人員的家庭。出身於「大」字號的是少而又少。所以我們只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此中國知識分子是和小資產階級分不開的。試看五十年來國共兩黨的高層領袖、各級政府官吏、軍官、教授、牧師、醫師、工程師、中小學教員等等，哪個能跳出「小資產階級」的範疇？既然大家出身相同，請問革命導師，他們之間究應如何分別處理呢？

幸好我們自己的革命先進，却能在「以馬克思列寧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上，找出一個變通辦法來。把列寧的原理論正反倒置，他們把背景完全相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其對「革命」的態度而劃分爲「右、中、左」三派。然後設法「孤立」那些「反革命」的「右派」；「團結」

可左可右的「中間派」；「利用」那些「同情革命」的「左派」。這樣一來，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就原則大定，細枝末節，因地制宜，運用之妙，那就存乎一心了。

老實說，中共這種三位一體的知識分子政策相當高明；行起來也相當厲害。君不見三十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不是一批一批地被中共「團結」和「利用」去了嗎？那原有相當羣衆基礎的國民黨中堅派系，如CC系，到抗戰後，可說被中共完全「孤立」了。形單影隻，陳立夫先生最後只好跑到美國去餵鷄了事。那些團結在「民主同盟」旗幟下的中間人士呢？他們不是在「聯合政府」號召下，一個立正向左轉，全部靠攏過去了嗎？至於極左翼的知識分子，自三十年代魯迅、郭沫若開始，到胡風、周揚、田漢等「左翼作家」，到後來的吳春晗、范文瀾、翦伯贊等，一直在替中共賣命，那就更不必說了。

「全部包下來！」

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實行之成功和巧妙，那只會搞「走路靠左邊」的國民黨與之相較，就瞠乎其後矣。所以毛澤東把他的「統戰」列爲中共的「三寶」之一，與「馬列主義」和「解放軍」同等重視，實自有其道理在焉！

一九四九年中共終於勝利了。數以千萬計的「英特利梗崔」除極少數逃出大陸之外，全部落入中共掌握之中。全體在握，自然就沒有甚麼統戰不統戰了。中共解放初期的知識分子政策，據毛氏後來的自述，便是「全部包下來！」根據既定的政策，在「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尚未培養出來之前，對這

批「國民黨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仍然要在「再教育」之後，繼續利用。

這一「包下來」的政策，在當時還是相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前，大陸上各項文教建設還是值得誇耀的。一般的成就原因雖多，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貢獻，也功不可沒。試問解放之後，如果沒有一個陣容強大的「英特裡梗崔」，哪裏有新中國呢？但是他們都是共產黨「包下來」的一批。至於毛主席所想要「培養」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時在搖籃裏還找不着呢！

關於「再教育」一點，中共本來就未存奢望。到一九五六大鳴大放之後，似乎就乾脆絕望了。本來就「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說，性屬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可能協調的。共產黨對他們的基本政策便是生不許其放屁，死要絕其子孫。暫時寬大的目的，是讓時間來慢慢解決他們，以便緩緩長成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到時和平接班。

不幸的是，那全部高知出身的中共高級領導集團之內，看法並不一致。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之後，在高級黨人默許，甚或慫恿之下，全國極左翼的高知——所謂「三十年代權威」——突然猖獗起來，後來竟然嚴重到「海瑞罵皇帝」的程度。爲了鎮壓他們這一次「猖狂的進攻」，毛主席才發動了「紅衛兵」加以反擊。文化大革命一起，兩年之內，高居知識寶座的「權威」們，和黨內同情他們的牛鬼蛇神便一道垮了下去。所以文革在知識領域內的表現，可以說便是毛氏對他先時「包下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他個全部活埋。自此以後，除了極少數能陪毛主席抽烟作詩的章老、郭老、范老等，像動物園內的珍禽異獸一般，經黨的特別「保護」之外，大陸上舊有的高知，可說是所餘無幾了。

「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哪裏？

文革以後，照理說大陸上應該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天下。但是今日吾人如屈指試數大陸上的新舊老幼一切高知，除了一批無名英雄的科學家之外，在社會科學和文藝領域之內，簡直就找不出幾個人來。

老實說，「批林批孔」，搞「樣板戲」，打倒孔宋（孔丘、宋江），都是好題目。當年陳獨秀、胡適之等就是搞這行起家的。

文革以後的大陸，這類運動，此起彼伏，一直未停過，但永遠却是雷聲大，雨點小，始終未搞出啥名堂來。吾人謀生之暇，想學點文化，但逛遍香港各書舖，翻盡人民出版社，簡直就找不出一兩篇可讀之文，和可誦之詩。連寫封建殘餘的「放屁體」的舊詩人，似乎也只剩了毛主席一個。五十港幣，一個週末，所得仍只是千篇一律的滿紙荒唐言，一把傷心淚，不得不歎息而返。

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已經快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時間不算短！縱使解放後才出生的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現在也應該是他們出版「三十前文錄」的時候了。我國自漢唐以迄明清，任何朝代如有三十年大治均可孵育一批「自己的」知識分子來。但是當今我們的毛主席所心心念念要培養的「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究竟哪裏去了呢？呼之不出，求之不得，因而人們就要懷疑毛主席所想念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有沒有這個東西了！

「知識階級」的「階級意識」

咱們中國人說話總歡喜囫圇吞棗。在舊中國我們老歡喜用「知識階級」這一名詞。現在不用了，因為列寧和毛澤東都說這一名詞不通。知識分子是沒有共同的階級性的，那來什麼知識階級呢？

可是如果「知識分子」——雖然他們賢愚不等，窮通各異，貧富有別，信仰互殊——正因為他們有了若干「知識」，却產生了一種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意識，而這一意識又為非知識分子所無的話，則此種共同意識會不會把不同階層裏的知識分子連串起來，成爲一個非經濟性的社會階級呢？這個非經濟性的社會階級如果（不幸地）是個「客觀存在」的話，那問題便複雜了。因為共產黨——包括蘇共和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都是根據他們唯物主義者所肯定的「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所制訂的。一旦這個胡適所謂的「百依百順的女孩子」忽然倔強起來不聽話了，那他們一切政策的「客觀」基礎就可能動搖。基礎動搖，則細枝末節的「上層建築」就不值得詳細討論了。

什麼是知識分子的共同意識呢？共同意識就是一種「人皆有之」的意識形態。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便是孟子所認爲凡「人」「皆有之」的通性。但是「知識分子」這種特殊的「人」，是否亦有其「凡知識分子皆有之」的通性呢？根據當代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研究，這通性頗有可能。他們認爲構成整個社會的各單位，如階級、社團，以及各種職業界，均各有其個別的共同意識，

他們名之曰「次文化」(subculture)。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否認這一次文化的存在，不過他們所着重的只是經濟階級的次文化，他們叫做「階級意識」；其他一切次文化只是階級意識的附庸罷了。

不幸的是，如果「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確有其次文化為非知識分子所無，則中國俗語所說的「知識階級」便可能存在。不但存在，並且很可能還具有他們特殊的階級意識呢。如此則中國知識分子除了他們個別隸屬的經濟階級之外，還有一個他們所共有的知識階級。這兩個階級之間可能「調和」，也可能「鬥爭」。同樣地，一個知識分子個體，也有兩重意識，這兩重意識之間，可能「對立」，也可能「統一」。一個身為中文大學校長的「名士」，就經濟階級的成份來說，應該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個在餐館內「打工」的「寒士」，自然是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餐館的廚房和大學校長的辦公房之間的懸殊何啻霄壤？這兩個經濟階級之間，可「鬥」之處，固然很多，但是這二位「名士」和「寒士」之間就沒有他們的「共同語言」了嗎？如有，那他們所說的「共同語言」(speak the same language)就是他們所共有的中國知識階級的階級意識。這種意識有它底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它在中國的社會變動中所發生的正負兩方的作用是很複雜的。其複雜性則不是「會審公廨」內自命不凡的洋法官們所能充分瞭解的。因而列寧大師根據他觀察西歐文化邊緣的俄國「英特里梗崔」所得的結論，這一「洋框框」是否能概括中國情況，就值我們虛心研究的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與統治者的控制手段

——三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志氣」和「前途」

甚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呢？

中國知識分子最高貴的品格就是有「志氣」。兩千多年前孔老二就教他的學生有志氣。毛主席也稱讚那些不用功而好搗亂的學生，說他們比王海蓉有志氣。

孔門的志氣是「學優則仕」。仕的目的不是升官發財而是「治國平天下」。用一句當代的術語來說，讀書的目的就是搞革命，為國家求獨立，為階級求解放。「治國平天下」這一口號，雖是孔黨的宣傳部長曾參提出的，但是它對申、韓、楊、墨、老、莊諸家，乃至今日的國、共、青年、社會、民盟、鄉建……諸黨也完全適用。諸子百家和左右各黨的「主義」雖大相逕庭，但他們教育黨員的「志氣」却完全一樣。因而兩千年來這一觀念「潛移默化」(internalization)的結果便凝結成中國知識分子個個都有的「志氣」。古人說得好，「士各有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青年毛澤東，其志也，不在小。立志要拆奉化城，十幾歲的蔣志清，其雄心亦有可觀者焉。

其他壯士、烈士、勇士、名士、寒士、學士、博士、哲士、研士……等，其志雖不如毛澤東之雄偉，然亦各懷大志。不用說那些名見「春秋雜誌」和「傳記文學」的志士仁人，個個都志得意滿，就是那些名不見經傳的酸士、寒士至少也可以「齎志以歿」。

總之一個「分子」一旦有了「知識」，他就要「力爭上游」「不甘雌伏」，就要「拚命向上爬」。大爬，就要爬上天安門，以滿足「澄清天下之志」；小爬，也要爬上汽車駕駛台，看出個「光明前途」。如果插隊落戶，毫無「前途」，那還是甚麼知識分子呢？

這種「拚命向上爬」之心，我國人一般叫做「進取心」。西方心理學家乾脆把它叫作「侵略性」(aggressiveness)。這種侵略性如發之於剛強正直慷慨悲歌之士，那他很可能為民族存亡，階級翻身，或信仰主義之實現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董孤筆」「常山舌」等等血淋淋的故事，就是這一方面的寫照。同樣的侵略性如發之於玲瓏乖巧之士，那他就可能為着位尊多金而「頭懸樑」「椎刺股」，甚或「嗜痂」「舔痔」地不顧一切地去四處鑽營。總之不論是好是壞，這一侵略性非發洩不可，失去了發洩對象，便要發生心理學家所說的「侵略性的移植」(transplantation of aggressiveness)的種種毛病來。小則移植為打老婆甩罐子發神經，或冒鯊魚吞噬之險泅水逃港。大則搞陰謀鬧造反——替毛主席造反，或造毛主席的反。這種毛病事實上不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知識分子」所專有，共產黨在解放後所培養出來的小一輩的「老佛爺」和「赫司令」們不也都深深地感染着這種毛病嗎？

治人和被治

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種通性便是他們的中間性。因為他們的老祖宗原是「中間階級」出身，他們克紹箕裘，也成爲中間性人物。什麼是中間性呢？那就是身居中間，對上受命，對下施令。如果一個知識分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那他他就是個「絕物」。做絕物不但上下失據，同時也左右失和。

換言之，中國知識分子是習於治人或被治，他們不能自治。如果硬搞個洋框框來舉手投票，那大家都要做齊天大聖。我志不遂，則勾心鬥角，成功在我，失敗由你，結果天倒大家滅，同歸於盡。上海以前有個「三友實業社」，據說該社總是一友管事，二友搗鬼，三友消極。我國國粹之一的麻將的玩法也是一人坐庄三人搗亂。搓麻將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歡喜的遊戲，也最能代表知識分子的社會行爲。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要想工作有成效，一定要「打掃廟宇，請進真神，老師復位，小兵回營」。我們的蔣總統毛主席這兩位「老師」，都是在這種知識分子傳統之下應運而生的偉大領袖。沒有他兩位老人家分別坐庄，過去五十年我們中國知識分子這場麻將也打不下去。

須知賭場有賭場的規矩，所謂「賭奸，賭滑，不賭賴」。但是今日這兩個賭場上的賭徒顯然都是下海不久的新手。兩家都是奸滑不足，而要賴有餘的。

看倌！你說這種共產黨失去原則的內部鬥爭是他們第二代黨魁們所犯的幼稚病嗎？不是的！這是我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與黨何有！

騙人和受騙

不過中國的知識分子本質上畢竟是優秀的。他們有旺盛的求知慾非番鬼佬所能及。洋人好動易發體育狂，華人好靜易發求知熱。據說有千萬人口的紐約市，英文日報不過數家。而人口不及該市百分之一的唐人街，中文日報却在十家以上。原因是來自禮義之邦的唐人，性好讀書。三考出身的知識分子便循序而讀其書；無錢趕考的，則進自修大學。個性嚴肅的則啃經典著作，毛澤東思想。瀟灑不羈的則讀點警匪格鬥和桃色故事。不過不管讀品之優劣，總歸是「開卷有益」。日積月累，知識增加了，眼界開闊了，大家都可做做報屁股理論家。茶餘酒後月旦點人物，評論點國事。

這種知識的累積，亦為知識分子所專有。非知識分子則因缺少累積工具，不易累積。累積不了自然就變成「愚夫愚婦」了。既然「愚」就要受騙。我國以前胼手胝足的「愚夫愚婦」往往就被「聰明的」讀書人、地主、和尚、道士一騙幾輩子，不得翻身。

嚴格說起來「知識」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騙人的。「知識」裏「真理」之多寡就以它騙人之多少，和騙人時間之久暫來決定。牛頓在他底「知識」裏找到了「萬有引力」，一下就騙人騙了兩百多年，現在已漸漸騙不了了。愛因斯坦一輩的物理學家也找到「宇宙守恒」這一真理，不幸碰到了我們庚款留美的楊振寧李政道，因而也就騙不了人了。

所以知識分子最會自騙，騙人，和受騙。有的大知識分子忽然在他底知識裏找到了「真理」，他不但赴湯蹈火以求其「真理」之實現，還要治病救人地來騙小知識分子。而小知識分子則因知識累積的程度不夠，往往亦心甘意願去受騙而不自覺。

孔老二和耶穌都是最大的騙子，他們能一騙兩千年而不被人揭穿。康有為梁啟超則是兩個小騙子，也能騙人數十年。一代天才的胡適之毛澤東年輕時都被他們騙得耳目昏眩。梁啟超在自騙、騙人之外雖然也經常受騙，但是梁氏畢竟是聰明人，清醒得快，他說「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就是他「昨日受騙了而胡思亂想，一夜之間，知識又累積若干，所以「今日」的梁啟超就要對「昨日」的梁騙子「挑戰」了。

一般凡夫俗子，反應不能如梁氏之快，但大致說來「今日之我與十年前之我挑戰」，則是很正常很普通的。所以知識分子本質上雖有賢愚之別，反應上有快慢之異，而他們對外來事物之侵襲而引起思想上之自我挑戰則是彼此一致的。這種思想上的自我挑戰，換言之便是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的判斷能力。而這一判斷能力且隨時與他底知識累積相配合而不斷開展。因而一個知識分子日益開展的判斷能力如不被他別有企圖的私心所淹沒，則其判斷能力便不會被其所隸屬的階級成份所局限而喪失其獨立性。有獨立性的判斷能力是最公正客觀的。共產黨最歡喜說「人民眼睛是雪亮的」！雪亮者何？就是人民有其獨立，公正而客觀的判斷能力。因而一般顛倒是非，不分黑白的政治宣傳和黨八股是不容易騙人的。

林肯說得好，「你可以騙全體人民於一時，騙部分人民於永遠，但你不能永遠欺騙全體人民。」事

實上林肯這位中產階級的總統這一番話也就說給一般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聽的。任何政治宣傳和說教不管你搞的思想是孔老二、馬老大、列老二、孫老二、蔣老二或毛老大或是他們徒子徒孫的簽證註疏，搞久了，縱是最淺薄的知識分子也會要客觀地、公正地、獨立的判斷一下。是非黑白人民會有雪亮眼睛來辨認的。如果一個統治者，自以為控制了所有教育和宣傳工具，他便可變非為是，變黑為白來對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民填鴨子，那就愚不可及了。

「雪夜關門讀禁書」是知識分子最大的樂趣。試問當今大陸自毛主席而下的領導人，哪一個不是讀「禁書」長大的？一個「分子」如有了「知識」，他底知識就會不斷地累積。他底知識有了累積，你還要強迫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來繼續騙他，那就很難了。毛主席很欣賞魯迅先生的話：「你如不讀書，人家會騙你。」換言之，你如讀了書，人家就騙不了你了。

所以知識分子最難搞的地方就是「寧我騙人，毋人騙我」。你如騙不了他，那他就要和你搞「輪流坐庄」，事情就麻煩了。所以我國歷代統治者的知識分子政策都圍繞着兩個問題在打轉。第一，知識分子非有不可！劉邦知道，他的「天下」雖然是馬上得來，却不能馬上治之。毛澤東也知道「中國這個知識分子吃得開，不是說過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財富嗎？的確是。你哪一樣都缺不了他。」（見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所以知識分子不但要有，還要加意培養。第二，有了知識分子，要怎樣保證他們不鬧事，並規規矩矩的做「人主」的奴才。

在這兩大問題上，我國歷朝的明君賢相真不知傷過多少腦筋。為學習「兩條腿走路」和「古為今用

「不妨把老祖宗的知識分子政策也拿來解剖一下，看今日有無借鑑之處。」

秦始皇和英特利硬崔

秦始皇對付知識分子的辦法最乾脆。他底天下是馬上得之，幹部治之。「民以吏爲師」就是幹部訓練幹部。「吏」（幹部）之外，不許讀書。已讀過書的不許再讀書。藏書要燒盡，「挾書」要殺頭。那些書已讀到無可救藥程度的高知，則一概活埋。

毛澤東吹牛說他「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秦始皇算什麼？」毛主席說，「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見毛主席「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這句話該打屁股。一個共產黨的主席想不到却上了一個保皇黨宣傳的當。

你真以爲秦始皇所「坑」的全是「儒」嗎？「坑儒」之言是後世儒黨宣傳部在自己臉上貼金，把當時被活埋的全部受難者都說成「本黨先烈」。秦制「諸子百家，各立博士」。本來是蔡元培作風兼容並包的。孰知這位大獨裁者忽然翻臉不認人，一下把這批博士爺全部給「坑」掉了。

盧騷說「暴君之前，人人平等」（Before a despot all are equal）你以爲他只坑「儒」而不坑「法」不坑「老」（漢以前無「道家」之名），那豈怪孔家店伙計們吹牛說在反霸權戰綫上他們是「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呢！」事實上，秦始皇當時所坑的是秦帝國全部「高知」。零星殺的不算，集體活埋的就有四百六十個之多。以當時中國人口約合今日五十分之一來計算，則今日的毛主席要一舉活埋

兩萬三千個高知才能和秦始皇比個高下。毛公如真有嬴政的殘忍或魄力，那今日大陸上還有什麼「人民政協」嗎？不要說沈雁冰、華羅庚等早就要見上帝，章士釗、郭沫若也早就死於非命了。

毛主席還是寬厚的膽小的。他所吹牛的「四萬六千個儒」不過是四萬六千隻蒼蠅而已。文革以前，毛氏對「包下來」的「英特萊克區」（知識分子）還算是禮賢下士的。

秦始皇之誅滅秦帝國內的全部「英特里梗崔」也是他自取滅亡之道的主因。嬴政在歷史上算老幾？他底偉大不在他「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底偉大處是他是個偉大的工程師。他製造了一部萬噸的「國家機器」，並能純熟操縱之。他的缺點是他忽略了使這部機器轉動的能源供應，和技工調配。沒有能源沒有技工，他這部大機器就成爲淮海戰役中國民黨的坦克，完全失效了。

出將入相五十餘年的宋朝大知識分子文彥博對他的主子說，「陛下非與百姓共治天下也；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換言之，士大夫是陛下機器裏的燃料，是幫助陛下操縱機器的技工，沒有士大夫，縱是秦始皇也搞不下去。真的，秦始皇把整個英特里梗崔毀滅了，到他兒子時代，「共治」無人。可憐的二世就被一兩個「指鹿爲馬」的宦官弄垮了。

漢武帝的三原則

漢朝的統治者比秦王朝的主人高明些。他們能穩坐江山四百年，奠定了漢民族在東亞獨尊的基礎。

漢皇朝的偉大是他承繼了秦朝這部大機器，而同時也解決了能源和技工的問題。劉邦是明君，蕭曹

是賢相，他們知道秦始皇這部大機器是萬能的。漢承秦制之初，劉邦盡廢秦法，但終高祖之世挾書之禁未解，讀書藏書還是要殺頭的。劉邦也痛恨高知，他甚至混賬到拿博士公的方帽子來解小便。

可是到文景以後，天下承平，情形就不同了。漢武帝知道運用他這部大機器就非重用高知不可。但他也知道知識分子不好搞，統治他們之道還是由他們自己作繭自縛。這樣才由公孫弘董仲舒等搞出一套「罷黜百家，獨崇儒術」來。儒術不夠，再找出個桑弘羊來「重農抑商」，根據知識分子的通性，把漢帝國的英特里梗崔管制得服服貼貼，心甘意願地做人主的奴才。

要言之，漢武帝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制訂，共有三大原則。第一，限制人數。英特里梗崔人數不能超過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中央的「五經博士」總共不到五十人。這一原則，歷代相沿到民國三十八年還是如此。

第二，限制出路。知識分子只能入朝爲宦，在鄉爲紳。爲宦的可以食祿萬鍾，顯親揚名。爲紳的自有貧下中農奉養。好歹你人數無多，農民是養得起你的。子孫讀不起書了，那你就下放，插隊落戶，做士農工商四級社會裏的二等公民。這兩個「正途出身」你不搞，却要求利於市，那就別怪黨和政府對不起你了。做生意的人就要做「四民之末」，不許穿絲綢，不許買車駕，在社會上也不能抬頭，有錢啥用場？你說你是資本家，賺錢本身就是目的，管啥衣絲乘車？但你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政府自有反「托辣斯」法，凡是你可搞獨佔和壟斷的商品——什麼鹽呀，鐵呀，燒酒呀早都國家化了。囤積漲價俱干法令，重商主義還搞得了？搞不了重商主義，還能進一步做資本家嗎？生爲知識分子，知識累積了，侵

略性要發洩，還是「正途」出身的好！

第三，限制思想。不過漢武帝的「限制思想」可比蔣總裁、毛主席大方多了。他搞的是「獨崇儒術」。崇也者，有名有利之謂也。你要名要利則不妨游太學，拜名師，尊素王。如果你不重名利，爲學問而學問，你儘可搞你自己的。在「獨崇儒術」政策之下，不用說漢家四百年的「思想」學說被儒黨的「文革派」（今文家）控制了，但是他們的控制並沒有妨害漢族文明的發展。搞儒家「修正主義」的馬融、鄭玄、和名震古今的唯物主義大師王充不都是東漢帝國的高知嗎？那時「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司徒王允就明目張膽要反「劉徹思想」主張屠殺高知。他說「武帝不殺馬遷，使謗書流行天下」。事實上漢武帝的偉大就是他雖然限制思想，但絕不扼殺文化。像《史記》這一部千古奇書就是在這一位「略輸文采」的皇帝治下寫出的。試問有同樣性質的書今日能在台灣或大陸出版嗎？固然司馬遷會受宮刑，那是他搞政治搞出來的。在他被割掉之後，發憤著書之時，他是未受到特務騷擾的。

大漢帝國是有高度的學術自由的。那些正途出身的達官顯宦，搞孔老二搞膩了，也可以搞點其他性質的業餘研究；正途而出不了身的老員外老夫子哥兒公子們，飯有得喫，時間有的是，也可搞點子所不語的消遣，搞精了，也行行出狀元，諸子百家因而都有了傳人。漪歎盛哉！十五世紀前的漢族文化，允爲世界之冠，又豈是偶然得來的？

唐太宗是很科學的

那賺得知識分子盡白頭的唐太宗，本是最自私的。但是他底辦法却最合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行爲科學的原則。

漢武帝的那一套未盡善，到東漢末年就搞不下去了，統治者改用「九品中正」法。文革以後，大陸上的高等教育改革，便是採用九品中正法。六朝時的流弊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中共則是「上品無地富，下品無工農」。

「品」的辦法是最難公正的，因爲它沒有尺度，很難搞出個制度來。沒有「制度」，則要靠「人事」，靠「人事」則給人以「鑽營」的機會。搞鑽營則名利市場就變成貨幣市場。在貨幣市場中，劣幣總是驅逐良幣。在名利市場中，則壞人就要擠掉好人。不然，你就得有個公平合理，自由競爭的制度。唐太宗在這方面的貢獻便是革除六朝時留下來的「壞人擠掉好人」的保舉制而代之以不講人事關係的，公平合理的考試制度。他這一制度是符合漢武帝的原則，他對知識分子的通性有遇到的照顧。

唐代的「明經」和「進士」，在明清兩代，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成爲「八股取士」。

「八股」這一名詞在今日簡直是萬惡之源。其實作「八股文」却是一種最科學的智力測驗（IQ Test）。八股文是最合乎邏輯的東西。一個應試的士子如對最基本的國家教科書未熟讀，自己的思路又無條理，那他底八股文最多只能做四五股。不是「大比」不當，就是「小比」不清，下筆千言，離題萬里，起承轉合無法貫串，斯之謂「不通」。不通的知識分子，不用說治國平天下辦不到，做個公社的幹部也很難。

各位看倌，您讀了在下這一篇王娘裹脚，你就知道在科舉時代不才連個小秀才也混不到。同樣地，您去看看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乃至貼在牆上的「大字報」，你就知道他們的「黨七股」作家，最多也只能考個秀才。他們如果想像朱屠戶的女婿范進來「發」一下，中個舉，是做不到的。如此說來，則引人「拼命向上爬」的共產黨的變相科舉制，實遠不如滿清大皇帝的「八股取士」，我們該也替「八股文」喊喊冤，翻翻案了罷？「八股文」不是壞東西，「黨七股」才誤人子弟呢！

總之唐太宗這一發明，不但在中國千年未廢，它還於十七世紀傳到西歐，搬到北美，現在還在沿用。吃盡科舉苦頭的洪秀全，一旦做了天王，也開科取士，還點了個女狀元。不會作八股文的孫中山，也很嚮往科舉，並列為他的「五權憲法」中的五權之一。老實說，在國民黨執政的數十年中，唯一可以差強人意的政教設施，還是它底各級考試制度。試看今日蜚聲國際的中國高知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何炳棣、喬冠華、錢學森等等哪一個不是在國民黨治下一舉成名的。再者近千年來我國歷朝的名儒碩彥，有幾個不是「科甲出身」？只有毛主席微時專好鬥鷄走狗，調皮搗蛋，攷試不及格，所以最痛恨攷試。他要摒棄相當科學的唐代的科舉制，而回頭搞六朝的「九品中正」的保舉制，在制度上說（這兒筆者強調「制度」二字）就是開倒車了！

考試制度的優點，是它符合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同時也確能替統治者——在漢武帝的三個原則之下——發掘一批「共治」的人才。如此則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也就不必相互扣帽子，耍賴皮，搞「三青團作風」或「文革派」的奪權。「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大家來個魯迅先生所說「費耶

潑萊」(fair play)、上而射，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天下就太平了。

「伊立特」何以形成？

可是鬥志昂揚，寫大字報的血性知青，讀拙文至此，可能就大不以為然。他們可能說，今世何世，你還在搞那一套知識分子自私自利的問題。知識分子應作階級的戰士，何能自我特殊化？

其實知識分子問題的關鍵便在此。如果知識分子的總數永遠只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則知識分子便永遠是個特殊階級，物以稀為貴，理固然也。全世界任何社會中的特殊階級（「伊立特」elite）都是該社會中「少數的」有錢有勢或有智的分子所構成。這種少數的特殊分子，社會如允許它存在，它就必然要構成一個上層特權階級。我國的知識分子所構成的這個階級已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在社會學家看來，不論是個體行為結合成集體行為、或集體行為概括了個體行為，這一「伊立特」之出現都是必然的。個體心理之善惡是無關宏旨的。如果知識分子總數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甚或八十以上，則原始性的農業社會（像我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就不能負荷這樣大的「英特里梗崔」。事實任何原始性的農業社會裏——如古代的中國、日本、帝俄，中古歐洲，和今日在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各國——知識分子都不會超過總人口百分之二十。知識分子人數比率之增加是隨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和都市化的經濟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因而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是和城市小資產階級（petty bour geoisie）分不開的。一切「上層建築」也是兩者所共有。所以在工業革命後的西方社會裏，「知識分子」不構成一種

特殊的社會問題。字彙裏也沒有「英特里梗崔」這個名詞。

在俄國和中國可就不同了。中俄兩國知識分子，在全人口比率上之激劇上升，不是社會經濟發展「逐漸形成」的，而是兩國政府和共產黨着意普及教育的結果，工商業和都市化的經濟發展却遠遠地落在它後面。知識分子和社會經濟的上昇因而脫了節。

在俄國因而就產生了一個沒有都市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却有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與之俱來的一切「上層建築」的英特里梗崔。在相同的情況之下，中國也產生了基本上是都市小資產階級，但却缺少都市小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基礎的中國知識階級來。這個中國知識階級不但顯示出它牢不可破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那與之俱來一切都市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也表露無疑！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思想」上，這一點他就一直未搞通。文革後期，毛氏對來訪的外賓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裏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

何以如此呢？毛氏解釋說，「因為解放十幾年來，文化教育界修正主義把持了，所以資產階級的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所以搞文化大革命，鬥走資當權派，只是「任務」而不是「目的」。文革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的問題。」（見毛主席：「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

這一點，顯然是他把「毛澤東思想」未搞通，而錯怪了好人。毛公不知道在人類歷史演進的現階段

，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就是都市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與辦學的人無關。同時，共產黨本身——由於列寧以後都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一系列高級黨人下意識的推動——早已接受無數都市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建築」而不自覺。毛氏本身也做了無數的「余實爲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的矛盾來，變成他自己「思想」上的不解之結。

要有個駕駛執照

國共是非談之一

共產黨的舊包袱

「口號」這個東西通常只是「反對黨」才能利用的武器。因為反對黨無政權無責任，可以叫出任何動聽而不負責任的口號來。

「執政黨」按理是不能也不應喊口號的。它有政權有責任。它要對國民「拿出東西來！」它要有政策、有步驟、有計劃地對國民繳出它甜言蜜語所保證的東西！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也就是屬於這一類。不管老周天不假年，他這一保證，至少對千百萬只享有「低工資」收入的勞苦大眾可發生點望梅止渴的作用。

「階級鬥爭」是個什麼東西呢？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武器。它也是一「無產階級」防止「資產階級」復辟的武器。但是共產黨現在已是執政黨了。「階級鬥爭」這個抽象觀念的武器已經完全具體化，成爲一個空前龐大兇狠的國家機器。有此一機在手，何事不可爲？

可是近二十年來，毛氏爲清除劉少奇這個修正主義者，已不惜把這部機器砸爛。中國古代的小氣鬼，每每「投鼠忌器」。氣魄大的毛主席則不惜「鼠器同毀」。但文革後這部機器剛剛修復，他底夫人却又爲清除鄧小平這個「不知改悔者」，又要投器而求鼠！

中共的當權領袖們，爲什麼不好好利用這個萬能的具體武器，而偏要利用那摸不着頭尾的抽象武器呢？是他們無知？不知道國家機器是無產階級最厲害的武器？還是他們無能，土包子操縱不了這部大機器？

其實說穿了什麼都不是！既不是無知，也不是無能。是他們舊知識分子的包袱在作邪。

讀者諸君，你們真以爲中國共產黨主席夫婦和中國國民黨總裁父子有什麼不同嘛？的確，他們不同之點甚多。但是他們也是同一時期同一個中國社會孵育出來的同一類的舊知識分子，背上也背有同一類的舊包袱。最明顯的就是這蔣毛二家，皆沒有一「守法」的習慣，儘管這個「法」是他兩家自己製造的！

據說蔣總統在大陸時代喜歡孔祥熙的程度，遠甚於他歡喜宋子文的程度。是委座厚連襟而薄舅爺耶？非也。只因爲宋子文是個現代銀行家，每次委座下條子要錢，宋部長總歡喜問：「從哪個戶頭上撥款？」孔庸老呢？他是山西錢莊票號出身。替老闆管錢，管啥「預算」、「戶頭」等洋花樣。要錢有錢就是了。

毛主席的英雄氣慨豈在蔣總統之下！他豈但是要錢有錢，他想啥幹啥，管他娘什麼繁文縟節的法律條文或法定程序。

但縱使是我國古代的皇帝也並不如此啊！漢文帝有一次乘馬車過「中渭橋」，忽然有一個老百姓從橋下鑽出來。「乘輿馬驚」，幾幾乎把皇帝從車裏甩下橋去。這位仁兄自然被衛士抓起來，送到地方法院按律治罪。法官判決「罰金」，犯人破了個小財。皇帝聽了大怒，下詔法院重判。法官張釋之覆奏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幾乎為車禍喪生的萬歲爺想想也就算了，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法啊！

老實說，近五十年來，我們中國的「法」，哪一條不是他蔣毛二公造的。可是蔣毛二公對他二人自己所造的「法」也沒有遵守的習慣。他二人都不遵守，那末一國之內，正如張廷尉所說的：「民安所措其手足？」

什麼是「法」？

通俗地說來，「法」就是這部萬能的「國家機器」的「駕駛須知」。要開動這部大機器，便要絲毫不苟的執行這「須知」上的各項各款。不嚴格執行，則機器不能開動；開動了也故障滋多，不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就國民黨來說，該黨這部大機器未完工，就被共產黨趕出了大陸。

共產黨這部大機器是工畢出廠了，但是駕駛員，不看「須知」，違章駕駛，如今已重修兩次，仍未能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就拿劉少奇來說罷。劉修正縱有一萬個不對，但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前有黨紀，後有國法。在一

個自動化的機器裏，可以冠冕堂皇地，律之以紀，繩之以法。那才像是個一等民族，堂堂大國的樣子。何可枉顧「法」「紀」，使一個合法的國家元首，黨副主席，就綁票而去，失蹤了事？

再看「鄧不改悔先生」罷。他如右傾翻案，罪惡昭彰。亦可公佈其劣跡於天下。如果證據確鑿，殺之何妨。惡可躲躲藏藏，吞吞吐吐，持廟廟之重器作「刦機」之惡行？

或曰，劉鄧初無真正罪行，諒難公開繩之以法。是說亦書生之見，不知政治之奧秘，與夫法家之一「術」「術」。尼克遜總統雖為鷄鳴狗盜之雄，然水門挖洞，偷竊未遂。此等小事，便足陷身法網，幾入囹圄。

試問尼克遜之政敵究有多大神通？天大了不起不過是參議院多拉幾張票，以十數票之差，一代梟雄的尼克遜便只有掛冠遜位，鍛羽而去。

劉鄧二公掌權數十年。違法亂紀之事，何止千百倍於水門掘洞。而毛公可掌握的多數票又何止千百張。罷免、彈劾；撤職、查辦，理應易如反掌。而中國共產黨不此之圖，偏要搗毀神器，挖掉祖墳，燒燬太廟，所為何來？

無他，只是「人民政府」這部大機器自從出廠以後，始終就未照章駕駛過。自動化部門，也從未試過車。自動化時代，不能沒有點自動裝飾而已。所以一旦老鼠竄入神器，貓兒要捉老鼠，還管他躲在那裏，投鼠不忌器，因而鼠器兩毀！

換言之中國共產黨執政快三十年了。但是該黨搞來搞去還是毛主席長，劉主席短的「人格統治」。

Personality rule)。始終未搞出個法制的系統來。哪個政客不奪權？一旦政客奪起權來，無規矩繩墨可循，大家胡搞一通，最後就厚着臉皮耍賴了。

孫中山說得好：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之事就是政治。政治上軌道，它就是爲衆人服務的牛馬。不上軌道，那它就是一頭老虎。漢末的曹丞相騎上去就下不來；毛主席騎上去也照樣下不來。蔣總統是「勞碌命」，騎上去拼老命死而後已。中國近代第一任終身大總統袁世凱也是騎上去下不來，活活氣死！

帝制乎？共和乎？

事實上袁大總統在「崩逝」之前，對他自己那份「機器說明書」上許多「文明字眼」也和毛主席一樣，「不大相信！」可憐這位陳伯達所罵的「竊國大盜」又沒有自己的「袁世凱思想」可以相信。他只好花了三萬光洋一年，禮聘了一位美國專家古得納教授（Frank J. Goodnow）來一問休戚。

古氏略加研究，便向大總統上了兩份「備忘錄」。這位洋顧問說中國民智未開，這些文明字眼只是點綴而已。事實上他底僱主的政府，仍是個「寡頭政治」（autocracy）。但是「寡頭政治」亦有好壞二種。好的叫「承繼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壞的叫「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

區別何在呢？顧問說前者在當權的「寡頭」龍馭上賓之後，自有小「寡頭」按法定程序，和平接班

。如此政權轉移，裨植不驚，天下太平。而後者，則是總統「崩逝」之後，沒有法定接班人，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和平接班。無法可循，則衆多有實力的小寡頭們就要互扣帽子，大打出手，那就要天下大亂！

古氏說前者便是中古時期的英格蘭。後者則是二十世紀的拉丁美洲。不幸的袁大總統的寡頭政府，則屬於拉丁美洲的那一類型。如果中國想搞真正的民主憲政，就應捨棄當前的拉丁美洲制，而改取中世紀的盎格魯、薩克森的政治制度，循序而進。

他主張把那些厚着臉皮自稱民選的八百羅漢的上下兩院的國會廢除，而代之以由大寡頭親自圈選的一院制的人民政協。同時大小寡頭之間的和平禪遞，亦應由國家明文規定，雖非親生骨肉，亦應世襲罔替。

古番鬼這一「捫摩」，可說是正中早有一「小寡頭」之志的袁克定的下懷。對那夙負宰相之才的楊度自然更是夫子之言。他二人一裏一外。古老頭的英文大作便被譯成「帝制乎？共和乎？」的才子之作，成爲「籌安會」的理論根據。袁大總統也就開始訂製龍袍了。

袁府這幕笑劇已經過去六十年了。被他們搞得身敗名裂，無辜的洋鬼子，現在也墓木已拱。但那洋老頭子當時所提的問題，今日是否已經不存在了呢？

我們祖國的政制，今日在臺灣是父死子繼；在大陸先則夫唱婦隨，江青垮後是「你辦事，我放心」，這種政治制度算是「帝制乎？共和乎？」「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歟？」抑爲「非承繼的寡頭政治歟？」

國共兩黨，管我們衆人之事管了數十年，好意思就這樣對我們老百姓繳卷嗎？

政治上的「彼得」定律

古得納教授的寡頭政治論事實上還是個片面的看法，着重點偏於大寡頭死後的問題而忽略他生前的問題。

生前的問題是什麼呢？那就是大寡頭在「死」之前還要「老」。以及由壯及老的諸種劇烈的生理上、心理上和生活方式上的變化。那些都要直接影響到他一人治下的國計民生。

袁子才在他底「隨園詩話」上警告詩人說「人老莫作詩」，作詩要放屁！何以故呢？因為詩人作詩要有「烟絲披里純」。柔情千縷的風花雪月和鐵馬冰河的豪氣萬丈的靈感只有青年人或年輕人最豐富。垂垂老矣，氣血衰竭，柔情豪氣也就逐年退減。無柔情豪氣哪有烟絲披里純？無烟絲披里純而硬要扭着鼻子擠一點出來，那就只有一點下氣通了。

人爲萬物之靈，但人總歸還是個物。他要和萬物一樣的新陳代謝。領袖雖爲萬人之靈，它到底還是人和其他人等一樣地生老病死。

一個領導發展中國家的永不退休的獨裁領袖，縱由常理推測，吾人亦可想像他底工作是愈老愈繁。相反的他底主觀的生理條件，吸收能力，學習能力，創造能力等等却老而愈減。換言之，那就是他底客觀的工作負擔和他底主觀的領導才能，隨時日之推移，而加速地雙重脫節！

再者，對一個血氣衰竭，年躋耄耋的老祖父來說，他底正常的生活，應該是選擇一個天日晴和，花

木扶疏的溫泉勝地，弄孫摸狗，頤養餘年。相反的，正因騎虎難下，被逼得宵衣旰食，日理萬機，對他老人家也實在太殘酷了。在那種殘酷條件之下生活的孤單的老頭子，四周無一人對他說真話，你要他明察如舊，心理正常，那就緣木求魚了。以這樣衰朽的老人作萬乘之主，事事以他一言為斷，而欲黨國不受其累，豈可得乎？

社會學上有條「彼得定律」(Peter's Law)說工商管理 and 社會行政人才，逐年考績，按級遞昇。各人直昇至其能力最不合格之一級為止。何也？因為在一個健康的發展中的工作制度下，勝任愉快，必然昇遷。在其不能再昇之時，各員亦即停留於其不能勝任愉快之級。

這一定律照樣也可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一位領袖人物，槩槩大材，他自然脫穎而出，權力日增，由小領袖而中領袖而高級領袖而最高領袖。若騎虎難下，休而不退，其結果必然到不領不袖而後已。

朋友，這就是我們國共兩黨的通病。

上下貴賤皆從法

當然，蔣毛二公——不管他二老如何指鼻子互罵「匪」「偽」——都是我們民族史上極偉大的民族英雄。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貢獻。他們之所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者，即是他二人搞了幾十年，始終沒有把他們兩個貴黨搞出個制度來。他二人都歡喜和尚打傘，便宜行事。

他二老從未否認，我們也不必諱言，他們是兩個權力過大的「大獨裁者！」

一次毛氏對基辛格說他很快就要見上帝了。伶俐乖巧的基辛格順便拍了個極得體的馬屁說，主席先生您不能見上帝，因為您和上帝搞在一起，那未免權力太大了。毛公莞爾。認為亨利孺子可教。

歡喜指着自己的鼻子說「你們追隨我革命」的蔣總裁何嘗客氣過，說他不喜獨裁。蔣總統是「儒家」。他壓根兒搞的是「作之君，作之師」。

作君作師也無妨，你總得有個法律程序。總司令桌子一拍，立法院長胡老頭漢民便瑯瑯入獄，這算什麼呢？

少帥做了綁匪，法院判徒刑十年，委員長把他「管教」四十年。如此則國家刑法，一屁不如？

諸葛丞相也歡喜殺人，但是人家說他「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他假惺惺地掉幾滴眼淚便把馬謖的頭砍了，馬謖的幽靈還要叫丞相萬歲呢！

經驗豐富的政論家，讀拙文至此，恐怕要廢卷歎息曰甚矣！子之迂也！在這一個舉世滔滔的社會裏，天下大亂，人人「打傘」，你如要他兩位老人家不打傘，那不被淋得如落湯之鷄嗎？彼豈好打傘哉？彼不得已也。

事實上，問題就在這裏！蔣毛二公如自幼就是文質彬彬，守法重禮的好學生佳子弟，他們哪有今日？正因為他二人，氣吞日月，毀禮犯法，才能搞革命打天下。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窮小子如我輩者，怎能作一黨之魁，一國之主？這本來是個打天下的英雄的惡性循環。

但是天下既定，人心厭亂，時代已進入偃武修文之時，你如還要搞「和尚打傘」就不對了！「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這句話，還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人心思治，在大亂之後，口胃實在很小。高祖天下初定，五十年代貧中上農的希望，據人民日報的報導，也不過是：

三分自留地，

幾隻老母雞，

一對好夫妻，

兩個小把戲！

朋友，這種全國老百姓，久亂思治的一點點可憐巴巴的心理狀態有何不好？當然這種心理，太落伍了，缺乏革命火氣。可是如今天下已定，人民基本上也欣然同意了共產黨那一套。你有部萬能的國家大機器。你要搞「公有制」、「國有制」乃至「球有制」，儘可立下規章，擬定進度表，立下個駕駛執照，開動機器，循序而進。不此之圖，而偏要恢復草莽時代的三年一小鬥，五年一大鬥，千年鬥不夠，還要鬥它一萬年。這句話就是地地道道的放屁了！

向麻將客學習

國共是非談之二

接班人和接班制

現在蔣毛二公的時代已迅速地過去了。中國今後再沒有第三人能依樣畫二公之葫蘆。

須知蔣毛二公的豐功偉績是多少萬噸苦難中國人民的血和淚灌溉出來的！沒那樣的肥料，就開不出那樣的花！可是中國洒鮮血，流熱淚的苦難日子畢竟過去了。今後再沒有任何理由，還要以同樣的肥料，來另外栽培出一兩個不必要的大葫蘆來。因而二公所留下的這兩個爛攤子，就不是任何「接班人」或有既得利益的「接班團」，可以一成不變而「接」得下去的。讀者們等着瞧吧，將來完成接班的，將不是任何「接班人」，而是個「接班制」。

一個「國家」不論它如何「封建」「落後」，總得有個制度。動不動就把一些「罪犯」，扣頂帽子，拖出來遊一趟街，然後來他個失蹤了事，這種辦法總歸了不了事的。

阿Q不服氣，對尼姑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正是如此。阿Q倒霉，就因為阿Q是阿Q，不

是和尙。近五十年來的中國政壇上，只有蔣毛二公是兩個大和尙。只有他二人可以「打傘」，別人便打不得！

君不見台灣嘴尖胆大的顏明聖不是又入獄了？他試圖顛覆政府，干犯國法，他底膿胞律師在罪證確鑿之下，無法抵賴，所以他二度坐牢。

以罪大惡極的顏明聖比諸當年罪輕惡小的鄧演達又如何呢？鄧氏被綁架之後，還未找到律師就被當年已下野的國府蔣主席的衛士王世和一槍畢命。

以鄧比顏，則台灣當局今日對這位「顏犯」一審再審，真是小題大做，多此一舉。把他交給王世和，不是草木不驚，問題解決？

這是台灣今日當權的小蔣先生，比三十年代在大陸當權的老蔣先生更民主，更偉大嗎？非也！時移而勢異者也。

老實說，今日台灣如果還有個拿盒子砲的王世和，顏明聖早就溜到東京去搞他的「東方瑞士」去了。他之所以敢在台北大搖大擺地去坐牢，就是他知道中國進步了，國民黨也進步了，進步到大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的程度。

甘地、尼赫魯二公當年還不是干犯了無數條國法和緊急條例，吃了無數個膿胞律師的虧。二人坐牢又何只兩次！現在那個紡棉花的瘦鬼，還不是東方聖雄。尼赫魯還不是印度的尼盛頓！

我們台灣的顏赫魯今日之所以坐牢甘如飴者，就是因為他知道英雄和時勢的關係，是中外古今一樣

的！

大陸會有例外嗎？且看文化革命初期，紅衛兵小將何等英武，堂堂三軍參謀總長的羅瑞卿和位尊權重的京兆尹彭真，還不是要揪出來就揪出來。扣帽子、遊街、罰跪。皇皇六部尚書還不是在江夫人團圓的杏眼之前，「不許坐，靠邊站」。

「虎不知百獸之畏己，以為畏孤也！」這句話是不真實的。老虎是聰明的。他知道是百獸畏己，不是怕一條騷狐狸！這是根據「客觀規律」發展的「客觀存在」！但是，老虎歸山了，客觀不存在，規律就要變動。扣帽子、遊街、罰跪等老把戲，就可一而不可再了。

朋友，稍安毋躁！等到他們扣帽子、靠邊站那一套法寶失靈了，解決不了問題了，他們就要搞個制度了。

制度是繭，政客是蠶。蠶又為什麼要作繭自縛呢，無他，你如想死，那就不要作繭。你如想化為飛蛾，傳宗接班，你就非如此不可啊！

近代政治學上所謂「制衡」、「分權」等等，試問哪個有野心的政客歡喜那一套？彼其好制衡分權哉，彼不得已也！

當然，制度是有好壞之分。不過壞制度雖不如好制度，壞制度畢竟比無制度好。搞制度就離不開有客觀尊嚴的法律。是之謂「法制」。法律也是一樣，壞法律雖不如好法律，但却遠甚於無法律！

搞法制，當然要檢好的搞。取法乎上，總歸是好的。但是問題的根本却是「什麼叫做好的？」「哪

樣才算好的？」

王法和階級法

今日世界上的法制與中國有相當關係者，至少可分三大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法制」；蘇修的現行法制；毛澤東思想範疇裏的法制。

中國大陸上的理論家們，提起蘇修，當然嗤之以鼻，不屑一談。提到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東西，自然更是詛咒辱罵。「封建」「腐朽」「剝削」一連串出籠。總歸那些都是剝削階級的王八蛋搞出的王八蛋東西。

這些都不假。但是奇怪的却是他們在毛澤東思想範疇之內，並沒有搞出什麼有系統的新東西。相反的，他們兩報一刊所終日吹捧的却是我國封建時代的「法家」。法家的開山祖師爺申、韓、商、李等等經他們一美化，幾幾乎一個個都變成了聖人烈士！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古代法家對法制在東方發展的貢獻。但是誅心而論，申不害、韓非、商鞅、李斯、蘇秦、張儀者流原來也是一窠王八蛋。他們當時所搞的「法、權、勢」那一套，還談不到「替統治階級服務」！他們服務的對象只是個「統治者」！是替「統治者」想鬼主意對人民作更有效的奴役！他們自己私下不可告人的目的則是「游說人君，以取富貴」！他們不代表老幾！試問那個搞到「妻不下織，嫂不為炊」的爛小子蘇秦是替哪個階級服務的？

無可置疑的，中國秦漢以後的「法」是對地主階級有利的。但是，我們不可本末倒置。那些法律并不是地主階級主動地爭取出來的，相反的那是「人君」所搞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副產品。地主階級的法權是果，不是因。假如大皇帝要搞「重商抑農」的「重商主義」，那末地主階級豈不照樣遭殃了嗎？

所以中國傳統的「儒、法、道」三家所合資經營的法制，基本上是「王法」。是富有四海的統治者的「牧民」之法。是自上而下的。是蔣總統毛主席「頒佈」的。不是甚麼人民或甚麼階級，為維護「本階級權利」制法自衛的。

西方的法制便不一樣了。

西洋之法，早在希臘時代即有其階級性。有名的「羅馬法」，便是早期羅馬公民（當時的統治階級）自私自利的法律。雖然羅馬後期的統治者亦曾有化「階級之法」為「統治者之法」的意圖，不幸羅馬帝國（和我們中國比）只是個短命鬼，變法未成，齋志以歿。在大黑暗時代，他們沒有強有力的統治者。到中古後期那些與地主階級的教堂分治的小封建主對新興的「中產階級」就無法控制了（他們本錢太小，出不了像我國漢代的桑弘羊）。政權因而逐漸自教堂與諸侯之手，轉移到「中產階級」之手。立法權也就被他們搶去，以迄于今！

所以今日西方資本主義集團內的法制（不管是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都是中產階級的東西。中產階級利用他們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上以限制封建主和教堂的徵稅徵夫（*corvee labor*）；下以剝削無錢有力的勞苦工農大眾；中以協調中產階級內部各種社會力量的利害衝突。這樣，那他們對上下兩階級可

以不民主，爲保護本階級利益，他們搞「上門下壓」。這和我們「中間階級」的老祖宗搞「上拍下壓」（注意，今日中共各級「幹部」就不如此了嗎？）的辦法是有原則性的差異的。

但是他們對他們本階級之內的成員（個體或「法人」）則既不可「鬥」，又不可「壓」。因爲大家同屬於一個階級，利害基本相同，地位力量也平起平坐，張三不敢欺侮李四，爲互助合作，共禦階級外侮，大家發財，那就非搞出一套大家都可接受的章程不可了。

這章程就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法制」的基礎。法律既定，欲其有效，則法律必須有其客觀的絕對性，神聖不可侵犯。在西方資產階級「翻身」之後，「憶苦思甜」，他們絕對不敢破爛他們所制度的法，因爲那個「絕對性」是他們以千噸血淚向封建主和教堂爭來的。在封建主和教主餘威猶在，時思「罔顧法紀」，「和尚打傘」之時，中產階級則誓以血肉加以維護，要上下貴賤按法行事。

中國古代的法家，不也是高唱「上下貴賤皆從法」嗎？所以中西之法，雖原則互異，而辦法相同。以同一種絕對性的制度，一個是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另一個則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罷了。

不過，維護統治者的法制可以不必搞民主。因爲統治者搞的是「寡頭政治」，是獨資經營的。維護統治階級的法制，則非搞「民主」不可。因一個階級專政，照例是一國三公的多頭政治。是合伙交易。大家都是老闆，誰能忍受哪個雜種獨裁。

既然不許獨裁，那就只好搞個章程（憲法）出來大家按照「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巴厘滿議事規則」（*parliamentary procedure*）來「選舉」，來「投票表決」，「服從多數」

。爲防制當選者搞鬼，再搞個「三權分立」。「制」他一下「衡」(check and balance)。既制其衡矣，又怕「多數」(majority)倚仗人多勢大，無限制欺侮「少數」(minority)。你要討老婆，但你屬於「少數」，那「多數」的王老五要投票不許你討老婆。你爲相信觀音菩薩而吃素，而目無觀音的「多數」却投票不許你吃素！

丟那馬！老子討老婆吃素，還要「服從多數」嗎？不服從「多數統治」(majority rule)，我要爲討老婆吃素等「天賦人權」、「基本人權」(inalienable right)「社會權利」(civil rights)而鬥爭。「不自由、毋寧死！」

這本是一系列中產階級內部的實際問題，爲「正確處理（中產階級）人民內部的矛盾」，在衆多好漢（後來好婆也加入）吵得喉嚨嘶啞，打得鼻青眼腫之後，總算把它們訂入法律，制度化一下。「上下貴賤皆從法」，大家按規矩來。不按規矩來，則玉皇大帝就要送煞神下凡變拿破崙，希特勒來收拾你，結果天倒大家滅！

資產階級仁兄豈好制度哉？彼不得已也！

所以「憲法」、「選舉」、「天賦人權」等等名詞，在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制」的範疇之內，都不是「文明字眼」。相反的，那都是爲解決實際問題的老粗之談。

可憐我們的毛主席，在做「子弟」時代，被一些不通的鄉愿「誤」得太慘了。他把那不信不達，而雅則有餘的嚴幾道的「天賦人權」譯文未搞通，認爲還是「人權」好些（見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

的講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和辛亥革命時期，武昌的「共進會」因為不了解孫中山「平均地權」一口號的涵義，而把它改成「平均人權」一樣的可笑。

毛先生是最瞧不起學「文科」的。他說：「最脫離實際的是文科。無論學歷史的也好，學經濟學的也好，都太脫離實際，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見毛主席「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的談話」一九六四年八月廿九日）這真是夫子自道。也是他老人家，幼年時期所受半殖民地時代，誤盡人家和自己子弟的歐美留學生所搞的教育的痛定思痛之言。

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度裏，歐美歸國留學生所搞的必然脫離實際。雖然不一定永遠脫離實際。須知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科學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無一項不是出于「實踐知識」，也無一項是「脫離實際」的。

再者，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原是社會主義之母。不知其母，焉知其子？毛氏的錯誤是他以偏概全，誤把他心目中的變了樣的「歷史學」和「經濟學」當成「歷史學」和「經濟學」的全部。

未窺其母，妄評其子，就很難正確了。毛公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讀書筆記裏更縮小「國家的形式」為「軍隊、監獄、捉人、殺人等等」（讀該書「筆記」第五十六節。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他又說：「比如學法律的，如果不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的情況，法律是學不好的。不可能有甚麼法律工廠，要以社會為工廠。」（「接見尼泊爾代表團談話」同上）這就把「法律學」（Jurisprudence

）縮小到「犯罪學」(Criminology)的小天地裏面去了。老實說一整部「唐律疏義」，重點便也是犯罪學，是中國法家的正統。那是封建和半封建時代的法學，距資本主義的法學還差好一大段，與社會主義的法學，那就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縱使專談犯罪學，毛公亦不知道那裏也有中西之別。

中國傳統的「刑法」基本上是「王法」的一部分，重在「懲人」。懲人之法從嚴，那是必然的。打着「仁義」招牌的儒家，也是主張「治亂國，用重典」的！我國古代的「酷吏」，所搞的「嚴刑峻法」都是自上而下的「懲人之法」。他們可以據小罪（甚或莫須有的罪）而「殺一儆百」地爲統治者服務。

西方的刑法則是階級之法的一部分，在封建社會的末期，中產階級對封建主和教堂爭取立法權，爭取的目的重在「衛己」。衛己之法從寬也是必然的。他們要把抗稅抗伏等「罪」，大罪化小，小罪化無。執法者無確鑿證據，不能故入人罪。縱使殺人越貨，證據確鑿，疑犯亦有其充份辯護之權。既獲罪矣，犯人只可量刑服獄，不可胡亂讓人打其不該打之屁股來「懲一儆百」！

君不見今日之紐約乎？盜匪如毛，垃圾滿街，吏不能治。何也？法輕而刑緩者也。設有毛主席焉，巡幸東來。與老番約法二章，殺人者死，揚灰於市者棄市。則不崇朝而紐約大治矣！毛主席能治而番鬼不能治者，何也？毛公有「王法」，斯非鬼法之所能儕其萬一者也！

要看打死不服輸的鄧小平老闆。傳聞鄧公還在叫嚷要甚麼「黨內民主」，甚麼「辯護權利」。這位不知改悔的老頑固，就是不知道他犯的既非黨紀亦非人民刑法，而是「犯了王法」！犯王法就用不着甚

麼資產階級的文明字眼「民主」，或「辯護」了！

朋友，我們如對現代法理學沒有點粗枝大葉的了解，而認為「到社會中去了解犯罪情況」就是學法律的「不二法門」，那我們學來學去就學點法家的「王法」算了。這樣，那我們連資本主義也不如了，還談甚麼社會主義！

當然，資產階級的法權現在也搞不下去了。大焉者國計民生，小焉者街頭殺人。他們都已搞到毫無辦法的程度。

但這却怪不得「民主」和「法制」。因為「民主、法制」只是一種制度；一種社會武器。任何「制度」都有其兩面性。忽其所長，偏愛所短都要出毛病。法制過當，其結果很可能變成孔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民主自由不加限制搞到同性結婚的程度，那就豈但無恥而已哉！

向麻將客學習

但是「民主、法制」畢竟還是如資產階級政治學家所吹噓的「較好的制度」(better system)。當封建社會行將就木之時，資產階級掌握比較好的制度一舉而絞殺之。當資本主義日薄西山之時，無產階級為何不能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呢？

或曰民主法制固佳，無奈國人無此傳統何？斯亦失敗主義者似是而非之悲觀論也。事實上民主法制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并不陌生，更不是舶來品！不信，且舉我們的國技麻將為例：

今有四位華人——識與不識無關緊要——閒來無事，商定搓麻將消遣。四人坐下先談定打多大「牌底」（五十元？一百元？）。再議定多少「翻」「滿貫」。採用何種「花色」？每種「幾翻」？「門前清」、「不求人」、「姐妹花」、「老少鋪」各一翻；「清龍」、「雙龍抱珠」、「全帶么」三翻；「清一色」、「十三不靠」滿貫……還有唯物主義的「原子百搭」和唯心主義的「心理百搭」等等之使用規則也得一一講妥。總之不論唯心唯物，大家得搞出個「共同綱領」來。這是他們底「不成文憲法」。

憲法既頒，則不論蔣宋孔陳四先生或毛劉周林四太太都得絕對遵守。未經法定程序，斷不能擅改此神聖不可侵犯的根本大法。

如是則大家再言明打多少「圈」——八圈衛生麻將？十六圈不衛生麻將，或四十八圈自殺麻將？一經言明則贏者不可中途捲款逃走；輸者亦不可堅持自殺。設欲改衛生為自殺，亦得依議會規則，法律程序。「多數」不可侵犯「少數」的天賦人權而強迫其參加集體跳樓。

有此根本大法，則擲骰拈風，選定主席。主席坐庄，捲袖摸牌，大家就搞起政治來了。四人堂哉皇哉依法而行固不用說。到生死交關之際，則大家只好「勾心鬥角」、「恐嚇詐騙」、「縱橫裨闖」、「幸災樂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拉一派，打一派」、「挖牆脚」、「搬石頭」、「撒沙」……總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各為自私自利不惜「心黑皮厚，卑鄙齷齪」。凡最下流的政客小人所運用的最沒良心，最混賬的手段都可施展出來，毫無顧忌！

坐庄的主席當然要用盡一切正當的和卑鄙的方法以圖連選連任做終身領袖。他底三位候補，當然也

就採取聯合戰綫，以一切可能的明槍暗箭逼他早日下野。

老實說我們麻將桌上這四位先生或太太真是人世間最下流卑鄙自私自利的政客。上帝在上，閻王在下，如談起道德來，他們真是生應不得好死；死應下油鍋上刀山！

可是他們四位之中誰最心狠手辣，最會投機倒把，誰就最能風雲得意，睥睨一切。四方城中，威風八面，好不羨煞人也麼哥！那些棄甲曳兵，斷股折肢的戰俘，也個個心服口服，俯首稱臣，無半點怨言者，何也？麻將桌上自有其民主法制之規矩在焉！生道殺人，雖小人何傷？

反之，如庄家下了庄，心有不服，拂袖而去，走入臥室，把幾個呼呼大睡的紅衛兵小將喚醒，來個大鬧天宮，把麻將桌打翻，趕走賭友，再找幾個下女、車伕陪老子重打一桌，那這麻將就不成其爲麻將了。

以前有個軍閥打麻將坐庄，「單叫一條」。對門打下「一餅」，庄家開牌了。衆人問這是什麼花色？多少翻？將軍說這叫「小鳥吃餅」滿貫！到第二牌，另一人也開「小鳥吃餅」而庄家不許開。衆人再問故，將軍說：「小鳥吃一個餅已經吃飽了，毋須再吃！」將軍因而「霸庄」。

蔣毛二公，幼年聽說都是麻將桌上的高手。可是他兩位老人家晚年所打的麻將，却是兩桌小鳥吃餅的麻將。小鳥吃餅，那就談不到什麼民主和法制了！

孔老二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國民黨內衮衮諸公，哪一個不是自殺麻將的高手？諸公如能化「小道」爲大道，那才配吹吹反攻大陸之牛皮！

共產黨內的高級首長和愛人們，也都會搓幾圈麻將。如果毛主席的愛人能實現她夫君古為今用的教導，把資產階級的自殺麻將，搓成無產階級的赤腳麻將，則聖母臨朝，又有什麼不好呢？

總之，蔣毛二公「小鳥吃餅」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中國近代史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國共兩黨裏有野心的接班人，也應該到了想想新花樣的時候了。新知識沒有，學學土辦法搓搓麻將也是好的！

打麻將的條件

當然，打麻將亦有打麻將的條件。蔣毛二公之所以小鳥吃餅者，實在是在他二人的時代，中國還沒有打政治麻將的條件！

主觀的條件是創造時代的英雄們自己的政治見識和修養。我們不喜歡老美。但是縱是毛澤東蔣介石對老美傑出的祖宗——華盛頓以下的那一羣開國者——也極為欽佩。他們是一羣有「現代」知識的中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但是他們的見識、胸襟、修養和學問是超凡脫俗的。今日強大的美帝實在是享他們的福。他們的開國領袖，是具有其主觀的條件！

中國當代的民族英雄們，老實說，都具有「封建性」的下意識和草莽氣味的社會行爲。他們是一家無餽食之儲，而一擲百萬」的賭客，又沒有「現代」開明政治家的懷抱。孫中山先生之外，也絕少有學術氣味，都是專好強不知以為知，自尊自大的半饜醋。風雲得意之後，妻也美我，妾也美我，客也美我

。結果對鏡自窺，真自歎好不少年英俊！這是我們所缺的主觀條件。

客觀的條件則是社會文化和經濟基礎。你如要蔣毛二公的小鳥不吃餅，你也得要他們底「麻將搭子」有好的「牌品」。不幸的是數十年來兩公都未找到好搭子。他們底上下家和對門都是些偷牌、賴胡、打假牌、做暗記的爛賭徒。

西哲曰：「制度者，智慧與機會交配所生之寵兒也。」若想搞民主法制，則蔣毛二公縱有此「智慧」，亦無此「機會」。

打麻將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要四位牌友「民主平等」。如果在財政部裏找幾位科長陪孔庸老打麻將，這麻將就不是普通的輸贏了。第二，這四位牌友一定要有「健康的個人主義」，個體之間要特立獨行，自有判斷力。如果上家是老伴，下家是馬弁，這位老太爺的家庭麻將也就無輸贏可言。

蔣中正毛澤東這兩位老太爺晚年所打的就是這種麻將！他兩位縱想摸點真麻將，馬弁和老伴也不是麻將搭子。這壞就壞在我國傳統知識分子（所謂「士大夫」）「上拍、下壓、中搗鬼」的亡國奴劣根性！

民國初年的黎副總統元洪有位師爺叫饒漢祥，他底四六駢文是冠絕一時的。為副總統擬起文告來，他總說「元洪位備儲貳」。提到饒氏自己則說「漢祥法人」！當時的才子們因而為他做副對聯說：「黎元洪篡克定位，饒漢祥是巴黎人！」饒大師爺因為現代知識有限，小脚放大，為天下笑！但是朋友，你如把台灣為總統「崩逝」而呼天搶地的師爺們點點名，你就知道他們為「大行總統」所撰的駢文實在遠

不如饒漢祥，而他們底現代頭腦比那位「巴黎人」實在也高明不了多少。你要總統蔣公和這批師爺們搞民主法制嗎？

故總統曹公仲珊曾慷慨解囊，以五千元一張票的高價向當年北京的八百羅漢購取選票。今日台灣的小鬼只要多拿點車馬費就足夠足夠了。民主法制云乎哉！

武人就有例外嗎？上次大陸七大軍區司令員調動的命令一下，毛主席問許世友將軍，有無意見。將軍對曰：「主席指到哪裏，我打到哪裏！」好一個許世友！他哪裏是一個現代國家的軍人？他只是一頭德國獵犬。

筆者寫這小故事，斷無小視許將軍之意。因為許氏實是我國傳統將軍中頗具「武德」的標準人物。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兩千年我國標準的英雄型像如關、張、趙、馬、黃就是許世友這種人物。國軍裏的張靈甫、邱清泉也是這種人物。他們也是劉先主，蔣總統，毛主席所寵愛的武將。如果半封建的社會經濟不變，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的價值觀念不變，則許世友將軍就是最值得歌頌的人物，小子敢貶一詞？但是如以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來月旦時賢，那可議之點就講不盡了。

總之，撼山易，丟包袱難！國共兩黨是大同小異的。有文官若彼，有武將若此，我們怎能怪我們偉大的總統和主席獨裁專制呢？

中國傳統既然如此，那末嗚呼哀哉，我們就只有讓大小寡頭繼續寡下去。

斯又不然！蓋天下初無不喜獨裁之領袖。於此有實踐知識而又能理論化之的番鬼學者孟德斯鳩，盧

梭，韋寧（Max Weber）等人不均沉痛言之：「焉有掌權者不濫用其權？」「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我國古代政治家爲要管束那幾乎有絕對權力的皇帝，因而把萬歲爺只放在權力金字塔中的第三位。大皇帝之上還有「天、地」，還有替天地暗中行道的祖先。如果大皇帝暴虐荒淫，一旦地震如雷，隕石如雨，縱是萬歲爺也嚇得屁滾尿流，趕快下詔「罪己」，對天稱臣，向祖宗懺悔。可是地震隕石嚇不了毛主席和蔣總統。因而洋人想出個「分權」的辦法來。他們搞「三權分立」，孫中山先生認爲不夠，再搞個「五權分立」。權既分則寡頭就寡不起來了。且看二次大戰時的羅邱二公，試問他二人本質上比我們的蔣毛二公開明？非也！其所以有權而不能濫用者，形勢使然也。形勢比人強。既有此形勢，則其人雖強于齊天大聖亦不能在麻將枱上出術。

一個國家要實施民主法制，它底社會一定要有孕育這一制度的「形勢」，和構成這一形勢的基本「條件」。「客觀條件」是「因」，「民主法制」是「果」。孫中山先生「訓政」理論的錯誤，是他倒因爲果。「憲政」豈是「訓」出來的？搞「作之君，作之師」的儒家和法家最會「訓」人。我國近代史上最善於「訓」人的領袖莫過蔣毛二公。由訓政到憲政做作最出色的則是慈禧太后，她老人家早於七十年前就要「下詔立憲」。蔣毛二公的憲法和「下詔立憲」的憲法有什麼區別？

老實說，我國近代的憲政流產實在怪不得一個老太婆和三個老頭子（袁、蔣、毛）。他們在本質上比英國的亨利八世和法國的路易十四要民主開明得多。我們流產的原因是國家無此形勢社會無此條件。這是施行民主法制的最重要的客觀因素。客觀條件一旦形成，則統治者要食詐胡婁永遠做庄，亦不可得

了。

小鳥吃餅的時代永不再來！

國共是非談之三

「專業」和現代化

「知識」是現代化和工業化社會成員的必要條件。雖然還不是充份條件。充份條件還要包括「專業知識」。

甚麼是「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就是在一個小範圍的知識圈子裏鑽牛角。

抗戰期間的西南聯大，有一次大家在跑空襲警報之時，劉文典問沈從文爲啥要跑警報？從文無以爲對，只好反問一句：「劉先生爲甚麼也跑警報？」

「我嗎？」劉瘋子把尾巴一翹說：「我是在替中國莊子跑警報呀！」

「精通莊子」這就是專業知識，就要逃警報。啥專業也沒有的學人，就不應該逃警報。炸死算了！我們中國最近派出來訪問友邦的專家學者們，如談起科技，其精專的程度往往令舉場咋舌。但是談

到行爲科學方面，則有警報就大可不必逃了。

性好鑽牛角尖的洋學者往往問辱訪的專家，「先生專修 (specialty) 爲何？」

答曰：「在下的研究範圍是『古代中國』。」

其實「古代中國」除梁漱溟先生一流的大學者之外，其他學人是不能「研究」的。因爲它在社會科學上不構成一個「專業」的題目。大而話之，囫圇吞棗，大家海濶天空的吹吹則可。做專題研究則不可。因爲做專題的基本方式是胡適所說的「拿繡花針」。

要改造毛主席的錦繡江山，事實上和縫製洪憲皇帝底錦綉龍袍並無二致。雖然穿着是皇帝，裁剪則靠大匠，但是基本的龍鳳繡徽還是無數「拿繡花針」的繡工，一針一綫繡出來的。如果粗針大綫，那就只能縫縫我們小民的棉袍，如何能做出人主的龍袍。

研究自然科學的「基本功」便是「拿繡花針」。如今火星上面的海盜自兩億二千一百萬英哩拍回的錦繡照片，就是由繡花針，一針一綫地繡出的。繡錯了一針一綫，慢說照片無有，海盜也早就滅頂了。

研究「物」的自然科學尚且如此，那末研究「人」的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或行爲科學就可以例外了嗎？可以例外嗎？

毛主席之所以在討論知識分子問題上瞎扯淡，就因爲他老人家本身還是個「五四遺老」。是梁漱溟一流的大而話之的先工業化時期的舊知識分子。對已發展甚或發展中的社會科學，一無所知。他不但把原有的極高明的社會科學家，一個個都搞到有警報不必跑的程度，他還要把所有文法科大學一律停辦。

這一荒誕的想法，就是所謂「個人獨裁的流毒了」！

以上所說還只是「教授」「專家」一流的「專業」。事實上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現代」社會裏各行各業，無一而非專業。試看現代工廠裏或自由職業界的技工——電器工、泥水匠、水管匠、X光攝製員、打字員、護士、汽車修理、飛機護理、拖拉機修護、社會調查員、所得稅徵收員……無一而非「專業」。這一類的專業技工，通常都是中學畢業生再加上「專科」的訓練，有時還要有三五年的「實踐知識」，始能領取執照，掛牌營業。現在再就這一專業，看看我們的下一代！

且看下一代！

下一代的知識分子是何等樣人呢？

在大陸上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蒯大司令和聶老佛爺所率領下放的一千二百萬知青。這些青年普遍都具有高中乃至大學的程度。貼大字報、做新詩、寫情書個個都是好手。優秀的「小魯迅」、「小愛因斯坦」更比比皆是。他們如果生在他們底父母的時代——先工業時代——不用說個個都是「先生、女士」的接班人。他們如後生三十年——工業化或高度工業化時代——那也可做個「普通工人」，因為他們連修理抽水馬桶的本事也沒有，還不能做起碼的「技術工人」(skilled worker)。可是他們不幸地却生在這個時代(工業化中期)，弄得高不成低不就。

把他們下放農村去「教」貧下中農搞現代化，他們實在沒甚麼可「教」的。要他去「學習」，他也

實在無啥可學。對那早有人滿之患的農村來說，這一千二百萬唧唧喳喳的小麻雀，實在是個受不了的大樂贅。而對下放青年本身來說，如果「插隊落戶」永不「上調」，那就等於古代的民間美女，被選入深宮永巷。宮牆萬仞，紅顏白髮，永不翻身。

要知道這一千二百萬小鬼實是中華民族的最大的財富。在任何已發展社會中，他們不經任何訓練，便是一千二百萬產業工人的大軍。如果施以三個月訓練，他們就可立刻變為一千二百萬熟練的技工。（中國人的I·Q·之高是舉世無雙的！）雙手萬能，他們保定從修理馬桶到送火箭上天都能勝任愉快！

再加四年大學，那就不知道要出多少小專家。十年之後更不知道要出多少李政道、楊振寧、錢學森、陳省三、何炳棣、王安和夏志清來。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哪一個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的、王八主義的——能承擔得起這樣嚴重的損失？解決這樣迫不及待的問題，甚麼辦法比工業化現代化更直接了當？四個現代化嗎？四十個四百個還嫌不夠呢！

不此之圖，反要把學校一股腦關掉，大家再「綱舉目張」無止境地「鬥」下去，會「鬥」出鬼來嗎？

時變而口號不變者，臭！

當然，辦學校如辦出個新「伊立特」（elite 優選分子）來，那倒不如不辦。筆者前已詳論之。馬老師也清楚的交代過，「伊立特」這個「上層建築」，是特種社會經濟的產物。解決之道不在唯心的洗

腦，而在唯物的經濟。社會主義的經濟起飛了。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變成「知識分子」了，還有什麼「伊立特」呢？

共產黨人是信奉法家的。法家就說過：「時變而法不變者，亂！」

同樣的：「時變而口號不變者，臭！」

三十年前，共產黨在打倒國民黨之時，階級對立，旗幟鮮明，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口號一出，對國民黨來說，真是被擊中要害，落荒而走。這口號在那時真是香撲撲的！可是三十年後，時移勢異，共產黨要解放台灣，已經又回到國民黨的民族主義的道路上去，與階級鬥爭無關了。若說今日中共的黨內鬥爭，仍是什麼階級鬥爭，這口號同香豆腐一樣，有點臭烘烘的了。

事實上他們共產黨內毛大媽要奪卓大嫂丈夫的權，他二位半斤八兩，別人還管得了？哪個貓兒不叫春？哪個政客不奪權？奪權就奪好了，何必翻出一些過了時的臭烘烘的舊口號來忸怩作態？

毛主席有名言：「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一個執政的政黨（包括國民黨在內）絕不能在十六萬萬雪亮的眼睛之前「瞎說一通」！

中國的國共二黨都是以製造口號起家的。響亮的口號一叫，真是無堅不摧，無敵不尅！滿清大皇帝，北洋軍閥，迺至國民黨本身都是被幾個口號叫垮了的。抗戰之後，共產黨叫出響亮的「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居然把當時南京數千名「飢餓」的大學生叫進行政院職員食堂，把行政院內「飢餓」的中下級職員的晚餐一掃而空！這口號，何等有力！

列寧說：「宣傳與煽動不同！」宣傳是理智的。要聽者心平氣和，就主義、政策、真理作一個抉擇。煽動是感情的。要聽眾各就所需，怒脈奔脹，立刻赴湯蹈火。真理、主義、百年大計，管他娘！對一個革命黨來說，對羣眾的教育，自然是二者兼而有之最好。

中共第一代的領袖們如毛如周，都是搞青年運動起家的，列寧的好學生。他們所搞的都是具有高度原始性，兩義具備的響噹噹的口號。周氏臨死之前所泡製的「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就是屬於這一類。它對當今海內外愛國的下一代有無限的魔力！

第二代就不然了。像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事實上只是一些「革命的紈袴子」。在經驗、學歷和見識上，遠不能和第一代比。只是在先主德威之下，希望黨內同志，黨外人民「念先帝之遺德而報之於陛下！」他們妄想做第二代的領袖，但他們不了解第二代的時代特徵和需要，徒徒抱着些陳腔濫調和一些臭烘烘的口號打滾。

可是時已變，且看兩個政權。

解剖「東方瑞士」

且看今日台灣！

今日台灣的政治社會的基本性質是什麼呢？它就是老番鬼古得納所說的中世紀末期的英格蘭！其政權是操在一個封建氣味十分濃厚的，享有既得利益的寡頭政治集團的手裏，這集團所搞的基本上是一個「

恩惠專政」(benevolent despotism)。

須知從政治學的理論來講，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自始至終不能構成一個「政黨」(political party)因為它既不代表任何社會階級也不代表任何社會團體。祇是一羣有理想和無理想的職業革命家、政客、軍人所組織的一個「幫會」(gang)。它底為善或作惡端視乎其領導者的善惡和賢愚而定。這一團體的政治行為和中世紀的英國皇室是大同小異的！

入主台灣之後，這一封建氣味十分濃厚的既得利益統治集團，痛定思痛，認真地振作一番。起死回生，搞了個小康之局。和工業化初期的英國一樣，這小康之局的真正受惠者，則是由地主階級都市化的「中產階級」！

在各種有利的情況之下（如韓戰、越戰、美援、外資、賤價勞力等等）中產階級經濟起飛了。文化教育隨之起飛。經濟起飛產生了一個迅速發展以動產和不動產為權力基礎的強大的「中產階級」；文化教育起飛也迅速產生了一個不甘雌伏的「知識階級」。和早期英國一樣，「中產階級」和「知識階級」合二為一，它就由「潛龍勿用」到「見龍在田」，漸漸地「飛龍在天」就要羨慕「九五之尊」的寶座了！

前已言之，這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的鬥爭方式，和我們傳統的「士大夫」的鬥爭方式，是決然不同的。士大夫的方式是：「上拍、下壓、中搗鬼。」他們的是：「上鬥、下壓、中妥協！」

上鬥者何？在早期英國，鬥皇家；在現在台灣則鬥國民黨。國民黨說，不必鬥了，你們「青年才俊

，不妨入黨」有官大家做！我們官僚也可以搞搞外貿，加入你們企業集團，有財大家發！

國民黨這一呼籲，真是恩高德厚，最實際最爲中產階級所歡迎。君不見，在國民黨政治監獄內坐通牢底，後經「減刑」的「出獄人」還不是在「台灣政論」上呼籲擁護蔣主席大家合作到底嗎？他們之中的「青年才俊」應徵作官的更是所在多有。大英皇室當年轉變爲資本家的更不可勝數。國民黨職業官僚，搖身一變，成爲大腹賈的也屢見不鮮。反對毛澤東的「一分爲二」，蔣經國搞「合二爲一」是絕對應該的。

但是國民黨政權如逐漸昇華成中產階級政權，那它就要搞真正的中產階級的政治。打不偷牌，不賴胡的真麻將。一切「文明字眼」都得付諸實施。人家老子死了要報遺產稅，蔣院長的封翁崩逝，也得照報如儀。你要保持特殊化，有財大家發，有官我獨做，那這一政治鬥爭就沒個止境了。

大英帝國有先例可循，那些搞政治的地主富商一個個被砍得人頭亂滾，英國早期下院的議長簡直沒一個善終的。但是大勢所趨，最後還不是女皇作花瓶而後已！這還是老牌盎克魯·薩克森的政治多少有紳士之風，大家禮讓一番。否則「我殺賊兮賊殺我，頭顱一樣滾瓜紅。」那就不是個了局了。

所以七十年代的台灣已具備「民主法制」的一切條件。國民黨這場麻將將一步一趨地爲勢所「迫」，而悲慘地「弄假成真」了！

國民黨當然是個百足之虫，不到黃河心不死，有政權有槍桿就還要抓人殺人。它抓過雷震。雷震何人？他代表一批愛國有心而「思想有毒」的百無一用的「書生」。一朝捉將官裏去，連那自由民主的聖

人的胡適還不是閉起鳥嘴，屁也不敢放一個。這種嘴尖皮厚的「讀書人」是可憐虫，他們造不起反的。

顏明聖就不同了。牢是他自己要坐的。不坐則民主鬥士的資歷就不夠光輝。和尚不坐關就不能入涅槃。黃信介、康寧祥、張宏俊、按律早該坐牢了。國民黨沒有關他們。第一是因為他們是誠心地不想打倒國民黨，他們只是要求「合作」而已。第二也是關不勝關啊！他們已經不是個體，他們是人格化了的新興中產階級，鬥起來他們是前仆後繼的，從何關起？

鑽進國民黨內做官的「青年才俊」就是另一種人了嗎？在海外統戰打得繃繃響的魏鏞、丘宏達兩先生就是國民黨的特工了嗎？非也，他們黨內做官，黨外坐牢，是殊途而同歸，一個銅元的兩面。最後的目的都是要和小蔣先生輪流坐庄，共同反共，搞一個民主憲政的「東方瑞士」！

中國共產黨革命革了五十多年，終日叫囂要打倒資產階級，打倒「走資派」。其實他貴黨所打倒的只是些封建殘餘的地主階級；吃洋人殘羹剩肴的洋奴大班；和革命幫會的國民黨；以及無產階級革命老同志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他們底見識還看不到什麼叫做資產階級；他們也從未碰到一個「走資派」。

須知「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洋名「波爾喬亞」是個有羣衆，有見識，有組織，有朝氣，有理論基礎，有殉道精神的社會階級。孔宋二位郎舅不能構成一個「資產階級」；掌握「南三、北四」七大銀行的「江浙財團」也不能構成一個「資產階級」。因為張公權、陳光甫這些先生們只會搞魯迅先生所說的「大錢換小錢」。他們既無理論，亦無羣衆，更無階級。

真正夠得上稱爲中國的資產階級或走資派的是六十年代在臺灣起飛的土財主和洋學生。他們已形成了一個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合流的一個新興的中產階級！對內，他們對國民黨「取而代之」只是時間問題。對外，他們看天安門上的英雄亦有「當如此也」的心胸。

不要小視這一批毛猴子。他們和當年的胡適之毛潤之先生一樣是一種時代潮流中的「弄潮兒」。他們有理論，有羣衆，有組織，有朝氣，也有殉道精神。真能和共產黨唱一兩齣對台戲的不是那一堆理論殭屍的國父遺教，或走路蔬菜的文化復興陣營裏的冬烘學究，而是這個六十年代以後在臺灣成熟的中產階級。他們包括台灣企業界的全部實力派，和海內外全部台籍高知（包括兩訪大陸三訪大陸的周總理座上客），和無數非台籍的高知和知青！

這個「見龍在田」的新階級是中國史上無前例的新東西。成份相當優秀，幹勁亦相當可佩。那些在海外，八股以外無長物的中共統戰分子，和他們相比，真是望風披靡，不堪一擊。他們「走資派」的理論和作風，更不是一「四人幫」的江夫人王副主席幾位臭婆娘爛娃娃放潑放賴可以嚇唬得倒的。這一個新興的力量實在是今日中國「統一問題」的最大障礙。不了解他們的底蘊，在理論上不能把他們駁倒，則「爲統一而統一」的狹義的民族主義就不容易說得過去了。

但是台灣這個新生力量，先天也是很薄弱的。他們「東方瑞士」這個基本理論便很脆弱，因爲台灣畢竟不是瑞士。瑞士原是中古封建時代封君蛻變出來的一個小獨立國，有獨立國的傳統，沒一個大瑞士要吃她，此其一也。瑞士的經濟是西歐經濟系統中健康的一環，瑞士佬照例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

之憂而憂。此其二。

台灣本是中國的一省，是新豐折臂翁的一隻斷臂，斷臂理應再植，接不上也很難就變成孫悟空的毫毛，化作一臂翁，此其一。台灣的經濟原是日走下坡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邊緣。華爾街咳嗽，羅斯福路傷風，紐約中風，台北翹辮子。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本身已在動搖，況偷生於其臥榻之側的殖民經濟乎？此其二。以故，建於這種脆弱的基礎上的「東方瑞士主義」的前途，也就不待著龜了。

不過「東方瑞士主義」的前途和「東方瑞士主義者」的前途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丟開政治的複雜性不談，即專就時間着想，「東方瑞士」如能安享三五十年的清福，這對「東方瑞士主義者」也就足夠了。兒孫自有兒孫福，身後之事，那就管不得許多了。

再看大陸：

大陸上的下一輩是否也有一種新生的力量呢？豈但有，而且太光輝燦爛了！它也和台灣一樣是「史無前例的」。

社會主義的兩黨制

中國古代的「文、景」、「貞觀、開元」迺至滿清的「康、雍、乾」諸朝所做到的也不過如孟子所說的「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而已。那個社會仍然是「大人」管束「小人」的社會。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百姓仍然被看成「蚩蚩者氓」或「愚夫愚婦」。

現在可不同了！經過毛主席率領下的共產黨二十多年努力的結果，不但民主改良派孟軻的理想實現了，他們掃盲運動也萬分成功。文革期間林彪把毛澤東那本小紅書印了四億多本！人手一冊，大陸上今日至少也有四億人口，可以讀「大狗叫，小狗跳」了。

《人民日報》的發行量據說超過兩千萬份。每份擁有十個讀者，則大陸上已有兩億人口可讀《人民日報》！那份水準相當高的《參考消息》聽說發行量已超過八百萬份。五人共讀一份，則《參考消息》就擁有四千萬讀者！

讀過《參考消息》的朋友大概都同意，能讀《參考消息》的人，在本港也就可以讀《明報月刊》一類的刊物。能夠讀《明報月刊》的讀者諸君和在港，咱們不吹牛也可算個不大不小的「知識分子」或「英特里梗崔」（intelligentsia）罷！

換言之，不管我們把「知識分子」這個「詞」的定義如何地下，則中國大陸上的高層知識分子的人數至少也在四千萬以上。若把「讀書識字」的人統統算在內則中國已有半數人口屬於廣義的「知識分子」之內！「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朋友，我國歷史上的哪個聖主明君有過中國共產黨這樣驚人的成就？

但是能夠讀《參考消息》的知識分子就想讀更多的「消息」以資「參考」，這是咱們「知識分子」的「通性」（也可說是「通病」），筆者前已詳論之。你對我們的「通病」不對症下藥，只許看點官方指定讀物，那我們就要「雪夜關門讀禁書」。禁書絕跡，則聽點謠言也是好的。蘇修的「英特里梗崔」

不也是有此通病說官方指定的《真理報》無「消息」！《消息報》無「真理」！

再者，能「讀」就能「寫」；能「寫」則要「創作」。讀者和筆者，都讀過中學的，回想我母校當年的壁報作家（今名曰「大字報作家」），那批「小魯迅」們的新詩、舊詞、劇本、小說……是何等才氣縱橫！一旦搬上學校舞台，在周恩來等一流演員扮演之下，多少多情女觀眾為之淚濕羅巾！

你要這些小魯迅、小曹禺、小伍豪……把江婆娘那幾齣非牛非馬的「樣版戲」看在眼內！你要他們把「兩報一刊」之言，信以為真？老實說，談談馬列、毛想，他們的「大字報」才比官方的八股高明多了呢！試看那最近流出的所謂「李一哲的大字報」和「下鄉知識青年」佟英茹（見二九八期《紅旗》）所寫的那種擲地有聲的青年作品，是「學習與批評」上革命冬烘們能夠寫出的嗎？

就以戲曲創作而言吧，中國傳統的好戲如元曲原都是真正勞苦人民創造出來的。等到它流行天下而舉國和之的時候，無聊而下流的士大夫便加以強姦，等到它變成陽春白雪，脫離羣衆，就如鄧小平所說「賣不出票了」而壽終正寢。

以皮簧為基礎的京戲也是如此。本來它是人民的戲曲，一個中學生打死一條蛇，做把土胡琴，他在宿舍裏就「楊延輝」起來了。四大名旦一出，混賬的士大夫齊如山，田漢者流，又開始強姦了。強姦未遂，又出了個倒霉的江娘娘，帶了一大堆革命的官娥、彩女，呼嘯上台，把大小提琴，交響樂，五絃譜，天鵝池，貝多芬，一股腦搬上人民音樂之台。打死一條蛇，再也唱不出來了。人民也就無戲可看了。看戲變成「打差」，江導演如來本港混飯吃，恐怕連水也沒得喝了。

「一個床上睡不到兩樣人！」江娘娘那位同床客的幾首歪詩爛詞，也就算了吧？

從中國文學流變史上看，「毛主席詩詞」算個甚麼東西呢？那是現代文學上的豬八戒。唐三藏把他的寶貝保鏢取個好名字叫「八戒」，結果這位豬大爺却酒色財氣八戒全犯。文學革命時期，胡適之要搞文學的「八不主義」，結果搞出個出色的「我的學生毛澤東」，他搞起文學創作來，却「八不」全有！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搬出了蘇聯老大哥的「洋框框」，教訓我們的作家說文學創作是個「爲誰服務的問題」；「是個原則的問題！」試問毛公自己的「卜算子」、「菩薩蠻」等八有文學，究竟是爲誰服務呢？對工農兵大眾來說算盤和卜卦是否對人民服務有同等價值？菩薩原來是個蠻子嗎？

事實上毛主席的文學欣賞，和我們戲曲欣賞頗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們老腐敗欣賞戲曲，還沒有進步到丟掉楊延輝和蘇三的程度。毛公的文學欣賞也還沒進步到丟掉李後主陸放翁所習用的舊框框！

但是他老人家的便壺裏可以裝茅台，却不許我們打死蛇唱四郎，不許田漢周信芳舊瓶裝新酒，那就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

可是毛主席這個老頑固領導老落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個以下一代知青爲棟樑的金光燦爛的新時代。這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不是「先生」「女士」的候補，他們是真正的「羣衆」。他們之間，有反對江夫人的李一哲，也有反對鄧老闆的佟英茹。海外「愛國華僑」最好杞人憂天，怕權力之爭會把剛剛抬起頭來的祖國又打入十八層地獄。其實這種憂慮是絕對多餘的。

須知鄧老闆所代表的老幹部都已年逾古稀，肥肉都不敢多吃，還有什麼作爲？就算江娘娘不被打倒

，她亦多愁善病，再潑也潑不了幾年（注意：西太后垂簾四十八年，是從廿六歲開始的）。在老一輩子西歸之後，他們底下的一代或再底下的一代的李一哲、佟英茄、又會變成殺氣騰騰的毛澤東乎？

前文已言之，打小鳥吃餅的麻將要有小鳥吃餅的時代。時移勢易，小鳥就不能吃餅了。

台灣如能再拖三十年，則小蔣先生早已隨老蔣先生而去，孝文兄有恒產有祖業當已早在美國定居了。剩下的魏鏞、丘宏達能專顏明聖、黃信介的政嗎？大家都是資產階級的青年才俊，到時彼此不相上下，那就只有拈風、摸牌，坐庄，下庄就要看運氣看本事了。

大陸上數以千萬計的下一代知青，和魏、丘、顏、黃就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動物了嗎？有之，則是前者已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社會主義這一制度。而後者雖然國父遺教不離口，事實上則篤信二民主義罷了。等到聶元梓，佟英茄等專不了蒯大富、李一哲的政之後又怎辦呢？扣帽子？軍管？鬥、批、走？恐怕都要行不通了。行不通，則拈風，摸牌，憑本事輪流坐庄！

政治理論家讀拙作至此，或將撚鬚搖頭，歎曰子亦善吹者矣。民主政治為「自由國家」所專有。共產國家亦可行兩黨民主制，實前所未聞也。

殊不知毛大帥不早有「一分為二」之訓示。彼亦明言「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如一黨專政，黨內兩派按黨章和平競爭，輪流坐庄，有何不可？

或曰胡大博士不早就主張把 KMT 一分為二，而足下以為迂者，何也？

答曰，其問題在「政黨」二字也。上有執生殺大權之寡頭，下無億萬持票之選民，則 KMT 非真正

之政黨也。君不聞乎，老美開國之時，憲法初頒，固亦大陸黨之一黨專政也。迨桀苻生，漢密頓兩雄不能並立，從者各祖其魁，擲骰、拈風、輪流坐庄，則兩黨之制於焉奠立。華公盛頓者半文盲也。何嘗有意「一分爲二」，所以然者，社會與時勢使然也。不察時勢，不明社會力量之分合，而謬爲兩黨制而製兩黨。則書生之見矣。

所以國共兩黨要搞民主法制一定要等到蔣毛二公和他兩位老人家的時代一道過去。人民安居樂業，民智大開，梟雄無法展翅，實力派的社會力量的代表相持不下而希望和平共存，那就是搞民主法制的時候了。

資產階級一黨專政可搞民主法制；無產階級一黨專政——如今日中共——照樣可以搞民主法制。別人搞過的民主法制我們可以搞；別人未搞過的我們也照樣可以搞。

佛教、耶教、回教、馬克思主義，可以「中國化」，社會民主主義也照樣可以「中國化」！

事實上，中國統一的真正契機亦在此。大家皆按法行事，所爭者在法，則台灣同胞又何懼乎「統一」。等到大陸經濟也起飛了，台灣的殖民經濟碰到不景氣，則經濟距離亦縮短，則和平統一就更順理成章了。

要言之，現代化也者，專業化也，民主化也，而民主法制的具體條件是什麼？粗略言之，一日溫飽，二日知識。二者缺一不可。然前者易，而後者難也。中國歷史上「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的小康之局並不算少。但是要「讀書人」的人數超過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則前所未有。

蓋九年國教，六年國教，乃至三年國教，在一個農業經濟的社會裏，縱由政府強制執行，其受教育人數亦不可能超過全人口三分之一。這是一種經濟性的自我限制，非聖主明君可以強迫得了的。這就是中國三千年的教育史。

可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就不同了。今日台灣受有九年國教的國民很快就可能超過全島人口的一半。在大陸上基本國民教育的發展也是可驚的。從日常生活方面來說，台灣生活水準（雖然貧富之殊仍然很大）已漸儕於已發展國家；大陸同胞亦可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這是中華民族史上六千年之所未有，這也是國共兩黨休戰以後，三十年隔海競爭，勤勉努力的結果，是功不可沒的！

正因為如此，溫飽加知識，它二黨已替我們祖國鋪下了民主法制的康莊大道。客觀條件之因已具備，則民主法制之果就必然要隨之而來，這一發展，顯然不是蔣經國或華國鋒少數小集團可以左右得了的！

海外知識分子應張大鳥嘴！

筆者一下寫了這麼許多。讀閉書不憚煩的朋友們，認起真來，可能認為作者是個定命論者，以為一個國家社會的興衰自有客觀規律在，那是不隨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辯證唯物主義者的卓見，筆者何敢掠美？

當然客觀規律之說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說人定絕對不能勝天，那就成爲機械論了。事實上人爲之

不滅，往往却是一個文明停滯，甚或消滅的主因。我國近百年的動亂，屍積如山，血流成河，我們知識分子不爭氣，不能說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的毛病是我們這批只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不到的有知識的匹夫把我們的責任看得太輕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把「衆人之事」全盤付之於極少數好權好位，有野心無良心的「在位」的匹夫。而那些沒有「知識」的匹夫，則又認爲「做官」「從政」是我們這批「讀書人」的事，與他們無關。

這個違反現代化規律的「東方」傳統，真是害盡蒼生。在祖國我們吃盡了軍閥、黨閥、財閥、學閥……無限的苦頭。使我國現代化發展，無限度的稽延。

在海外這一傳統也是我們海外華人的大敵。他們有「錢」而無「勢」，往往爲住在國的統治階級逼得走投無路。老知識分子如此，華人子弟還是如此。以前紐約市有位專攻少數民族教育的杜天薊教授曾對該市少數民族學童的成績作一番比較研究。杜氏發現華裔學童在任何科目的成績都名列前茅，唯獨在社會行爲學科——如講演，政治辯論等——則遠在黑人及波多黎各兒童之下。她這一研究結論，據說和海外有教學經驗的學人們的觀察完全吻合！

撼山易，撼傳統難！我們五千年來「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包袱實在太重了。生在女皇陛下，美帝籬邊，在商言商，祖國事，管她娘，就更視爲當然了。縱有不能已於言者，則在雙方統戰旗鼓之下，有幾位作家不看國共兩黨的臉色下筆！

朋友，我們知識分子「上拍、下壓，中搗鬼」的傳統太卑鄙了，太可耻了。

當然在一個已發展的社會裏，知識分子——尤其是舊時代裏長大的「知老」——原不算老幾。卑鄙可耻一下算它是時代的悲哀也就罷了。但是我們底祖國畢竟還未發展到無分子不知識的程度，能夠對國家大事動動鳥嘴的還是少數！

須知將來的祖國必然是個知識分子為骨幹的現代化國家。當知識分子變成中國人民絕大多數的時候，上不治于人，下不治人，他們一定要能自治，要自治對國家大事就不能閉起鳥嘴。正因為我們閉鳥嘴的包袱太重了，矯枉過正，我們更應大張鳥嘴，嘖嘖不休才對。但是今日在臺灣和大陸，哪一位敢不看統治者臉色而亂張鳥嘴？

看官，我們既居住在洋大人管轄的地區，說洋話，寫中文，談談黃面孔的私事，洋警察不屑一管，我們就應充份利用這點點可悲的言論自由，說說窺斑之見，放放一得之屁！

毛主席說：「不許放屁，且看天地翻覆！」

但是我國民間，却是自古以來鼓勵放屁的。試舉「放屁詩」為證。詩曰：「滿牆都是屁，如何牆不倒？兩邊都有屁，所以撐住了！」

我國的民主之牆所以永遠建不起來者，無他，國共兩黨只許他們在牆之一面大放其屁。牆之另一面則不許他人對放，如此專橫則欲牆之不倒也，豈可得乎？

筆者之所以敢冒大不韙，在牆之背面，亦大放其屁者，區區之心，但欲與讀者諸君子，共撐危牆而

已耳！

原刊《明報月刊》，一九七七年三月號開始連載

鄧蔣兩公百年後

——海峽兩岸必須面對的變局

似乎那還是眼前的事——一九四五年秋季某日在報上忽然看到中共主席毛澤東應國府主席蔣中正之邀請，蒞臨重慶，會商抗日勝利後的國家百年大計。國共兩黨罷戰言和，共同建國，做個那時代的中國青年，所聽的還有比這更好的消息嗎？

我們逐日追看兩公的消息，不久就看到那闕「舉國和之」的《沁園春》了。筆者當時是在安徽省立的「安徽學院」當名小講師，並且附庸風雅和一些愛好舊詩詞的教授和學生，組織了一個「雲溪詩社」。我記得我們社裏會討論過這首詞，而對它的藝術評價並不高，因為那個時代，大家都會搞兩首，沒啥稀奇。因此只是覺得那是一首，「詩以人傳」的作品——什麼「風流人物、且看今朝」，和我們底老鄉朱洪武的《詠菊詩》：「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百花煞。要與秋風戰一場，滿身披上黃金甲！」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作爲一個教歷史的小講師，我倒對那「數風流人物」上面的三個字「俱往矣！」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老毛這個鄙秦皇、薄漢武的「風流人物」，不論要和老天怎樣地去

「共比高」，到頭來「樓塌了」，還不是要加入那「俱往矣」的行列？——不管他牛皮吹得多大。

果然，我們終於把毛老板這台戲看到底——從他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到「百萬雄師過大江」，到「洒洒臨江、橫槩賦詩」，到「御午門受百萬人朝賀，稱天可汗」，到尼克遜總統「大躬一鞠」——乖，那△沁園春▽上的牛皮，真不是白吹的。毛老板這齣戲，的確唱得有聲有色。誰知我們看戲觀衆、喝采未已，興緻方濃，而素車白馬，紐約市「中國長駐聯合國代表團」內，忽然擺起香案來，接待僑民弔喪——毛主席追隨秦皇漢武之後也「俱往矣」了！

毛主席是龍是蛇

毛澤東逝世之後，那時我們這批「愛國華僑」真憂心忡忡。因為毛老板會向他娘子說過，他死後「右派要當權」。可是死前安排接班，「大事問江青」的「上海幫」班底，則分明是個「極左」——與四川廣安話的「就走」，顯然是音同義不同。

不讓「就走」接班，却預測「右派當權」，這在「毛澤東思想」的「矛盾論」裏，對立、統一問題如何解決？

那時我們幾位好管閒事的「留美學人」，被弄得又上電台、又打電話——關心國事，忙得不亦樂乎。

記得一九七六年十月某日一個上午，老友伍承祖教授打電話來談國事。伍是位「地理教授」，根據

陰陽風水的推測，他擔心中國今後會有「女主當權」。我說在下面是搞歷史的，不諳「風水」，只管「排八字算命」，我認爲中共政權口口聲聲說的是「人民民主」、「社會主義」，而他們所搞的「上層建築」，却是百分之百的傳統帝王時代的「宮幃政治」——把宮幃中的女主：呂后、武后、西后的八字比比看，我倒擔心「江后」的八字沒有其他三人的好——江青沒有上述三位女主的歷史條件呢！我擔心人民政府內，可能會發生宮廷裏面的「苦撻打」（*Coup d'etat*）。誰知我們放下電話不到二十四小時，風水先生又打來緊急電話：「據說江青被抓起來了！」再過二十四小時，消息便完全證實了！

江娘娘錯在哪裏呢？錯在她「江上有青峯，全在迷霧中」。漢文底字太差，讀不懂《資治通鑑》，吃了虧——《柏楊版白話通鑑》早發行十五年，讓江娘娘讀熟了，她也不會坐牢了。

毛澤東先生「固一世之雄也」！誰知死後（正如江娘娘所哭鬧的話）「屍骨未寒」，老婆便被拉進牢裏去。一個牛皮吹得那樣大的「風流人物」，死且不能保妻子，躺在玻璃棺材裏，陳屍示衆，也夠丟人現眼的了。

毛主席錯在哪裏呢？錯在他當過小學國文老師，漢文底子不差，讀了些《資治通鑑》。他實行了一輩子「通鑑主義」，卻又自命爲「五四青年」，崇洋學時髦，不聽司馬光老師的話，而硬說那是什麼「馬列主義」。結果呢，他所鄙薄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在中國歷史上，相形之下，都不失爲「真龍」天子，而毛公死後，在歷史上卻只能算是一條「長蟲」——歷史上哪裏有過一個「開國之君」一旦龍馭上賓，太后就被人抓起來的呢？有之，那也就只有「且看今朝」了；這樣

，這位大行皇帝也就不配做「龍」了。

毛公逝世之後，海外詩人如余公英時等，均有感時詠吟之作。老友胡菊人先生辱書堅囑，也要我續貂一番，因不自藏拙，乃隨諸詩翁之後，寫了一首《悼毛主席》的歪詩。如今轉眼十年了。再抄出來現醜一番，也算是對毛澤東主席逝世十周年的紀念罷。拙詩如下：

沁園春 敬悼毛主席

牧豕韶山、潑水湘河、者箇村娃。隨電雷激盪、手攬日月，身翻奴主、血染中華！政倚工農、權出槍桿、豎子真能不信邪。風流甚、看天安門上、吐氣成霞！

無加，霸業堪誇。詎難護重陽霜後花。聽長樂宮畔、孤屍暗泣；凌煙閣裏、百鬼交嗟。江上曲終、青峯邃渺，老樹枯籐宿暮鴉。終不解，問水晶棺內，君是龍蛇？！

爐火之上的華國鋒

毛主席這齣戲閉幕了。可是連台好戲不斷，華老板接連粉墨登場。我們這批海外「史學工作者」，對這位「你辦事、我放心」的「幼主」也頗存厚望。切盼他在葉「太尉」等元老重臣輔佐之下，也能當個漢文帝，「親賢臣、遠小人」，搞他個三二十年的「文景之治」來，則民族幸甚矣。

誰知華老板這齣戲甚短，在「八三四一」部隊奉調離京之後，這位望之頗似人君的華主席，也就收鑼散場了，不免使觀眾洩氣。

華主席雖在政壇上曇花一現，他畢竟是中華五千年史上一位「後主」，何以倉惶辭廟呢？原來他也忽視了司馬老師資治的訓誨，而犯了一些宮廷政治的清規戒律。

身為「幼主」，他最重要的倚靠階級，應是元老重臣。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華主席如果也讀過《白話通鑑》，他正當的做法，應該是尊葉帥為「尚父」；視鄧老如「乾爹」。自己兢兢業業、旰食宵衣，使尚父乾爹認為孺子可教；然後周公輔成王，實至才能名歸——搞中國式的上層建築之宮廷政治，豈可做急色鬼？而國鋒不此之圖，他卻專靠個汪東興和「八三四一」。還要把全國歸心的鄧大人放入冰箱。「臣光」如在世，睹此，豈不把鬍子吹斷？

華某如看不懂《通鑑》，至少也該看看《三國演義》嘛——據說多爾袞當年就是看了《三國演義》，才能「入關破賊」的。

《三國》上不是有一段孫權向曹操稱臣，要擁戴曹操受禪做皇帝的故事嗎？聰明的曹操不幹，反說，「是兒（孫權）欲置我於爐火之上！」以曹操之才之威，坐上去還怕「火燒屁股」，你華國鋒何人？爾原受「先帝」之「托孤」，「保護我家屬」；如今「先帝」屍骨未寒，爾就搖身叛變，「取天下於寡婦孤兒之手」，馬上就要坐上連曹操都不敢坐的「金龍寶座」！

國鋒、國鋒，你屁股皮究有多厚，在爐火之上、不怕燒焦？！華主席終於被爐火燒了屁股，而住入解放军醫院，不是活該嗎？

鄧當上皇帝小康之局

現在言歸正傳，該談談鄧上皇了。

鄧小平在文革中，以劉鄧司令部的副司令員的身份而大難不死，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偶然」！既不死矣，則劫後「輪流坐莊」，由小平居首，那又是歷史上的一個「必然」——既統兵、又抓黨，他們貴黨陣營裏，毛周而後，實無第二人。

老鄧既能位尊九五，就可南面稱孤，但是老鄧不幹，卻揀個「太上皇」做做。這一點，我們搞歷史的閱人多矣，不得不對老鄧翹大姆指！

老鄧接下了老毛那個幾乎亡國滅種的爛攤子，數年之內，就把那些「罈罈罐罐」又排列整齊，搞得有聲有色。筆者隔洋看戲，曾大為叫好——許之為「小平中興」。為此老朋友之間，尤其是躲在台北看戲的老輩，曾對不才此「中興」之說，大吹鬍子，認爲我「把鄧小平捧得太高了」。其實「中興」不算過譽呢。數數我國歷史上從「光武中興」到「同治中興」，比比看就知道了。

就以老鄧能「退居二綫」、能屈能伸，立功立德，做個「溫莎王子」這一點，國共兩黨的「最高當局」中，就找不出第二人。君不見他兩個貴黨中的一些小黨棍，連個小書記、小委員、小國代、小立委，也互不相讓，打得頭破血流，遑論一國之主？

筆者去歲「三訪大陸」，看到鄧上皇的中國，頗「有點昇平氣象」。這句「過譽」之詞，又惹起一

些老朋友頭頂冒火，又作文、又做詩，明敷暗喻，大大的教訓了一番。其實我們書生談國事總該想道一點嘛。你要老鄧把老毛那個爛攤子，一下就搞出個花團錦簇的「大治」之局來，怎麼可能呢？不如閣下夢想，就要拆老鄧「務實派」的後台，再讓四人幫的餘孽捲土重來？

憑良心，老鄧能在短短數年之內，搞出個「小康」局面，就很難能可貴了。至少大陸上今日已沒有「生存問題」(problems of survival)的威脅，倒懸之局已解，「裁兵百萬」，看來已比台灣人還要安定些，也就不錯了。

接班只「動口」問題不大

當然今日也有人擔心，大陸能有此小康之局，小平隻手擎天之功也。小平一旦歸天，人亡政息，奈何？

這當然是個問題！它是我們祖宗遺傳下來的老毛病嘛。其賢明如康熙皇帝者，心愛的幼兒，也難免要做個「賽思黑」。所以鄧上皇所欽定的第一梯隊、第二梯隊，是否可以天如皇意，順序接下去——（秦始皇還要搞個萬世梯隊呢！）老鄧恐怕也還得去問問馬克思。

再者，縱使「接」得下去，那種「欽定」辦法也太落伍了。今世何世？還要繼續把人民當「阿斗」，搞堯舜之「禪讓」？

不過話說回頭。這原是我們的老辦法嘛。大陸要搞美國式，甚至台灣式的普選，恐怕還要有一段很

長的「訓政時期」呢。權宜一下、落伍一下，無傷也。只要不搞得人頭滾滾就好了。在這方面，事實上我們隔岸觀火的人，大致也可放心，因為爲接班而佔山頭、而打仗的「落伍」時代畢竟過去了。

且看看「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列寧死後，史達林、托洛斯基二派內戰終未打成。史達林謁見馬克思之後，只殺了個貝里亞。赫魯曉夫搞掉史氏欽定接班人馬林可夫的方式很「落伍」，但是沒有流血。布里茲涅夫暗搞反赫政變，方式更下流；但是那個俄國的赫魯曉夫還是壽終正寢，並且據說養老金相當優厚。

老布死了，如今又已接班兩次。大小老毛子並未拔手槍。

我們再回到北京看看。縱是老毛死得一團糟，也只把他潑辣罵街的老婆抓起了事。目前且把那些連任「司令員」和「政治局委員」們喊出來，到天安門歷史廣場排排隊、看看相。他們之中出一兩位阿奎諾娘子，縱或有之；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中國大「勢」之前，搞國民黨當年的什麼「非常國會」、「擴大會議」、「護黨救國」或共產黨式的「五七一計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時代畢竟不同了嘛。老百姓不再「愚不可及」，人心也不思亂嘛。

所以，朋友們！只要他們國、共兩黨、天縱英明的領袖們，稍有「君子之風」、「動口不動手」，則「接班」問題不大。君不見那位在「秦城」之內，吃得白白胖胖的江太后，據說她對老鄧的「開放政策」，也心服口服了。今日縱把「四人幫」放出來回頭接班，也不會對「現狀」有太大改變。老鄧說只要政策對頭，就不會有太大問題，這話大致可信。

「小平變法」的前途

鄧公百年後的接班問題雖不太嚴重，但是老鄧今天搞的這一套「政策」本身，能否永遠搞下去而不出毛病，倒是個天大的問題。

鄧小平今天在搞些啥子？！

朋友，我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從三千年中國歷史全局來看，鄧小平今天所搞的實在是繼商鞅、王莽、王安石之後的，中國歷史上的「第四次大變法」！——（康梁那夠資格陪襯）——說者或問，孫中山豈非「變法」乎哉？曰，非也。孫國父搞的是「革命」。「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

中國歷史上的三大「變法」，除「公孫鞅」之外，二「王」都徹底失敗了。商鞅本人雖被「車裂」（是被五部牛車，拉成五條肉塊），他底變法的效果，却是大大地成功了——秦人之能終於統一東亞大陸，推源究本，商鞅應居首功也。

老鄧這個老牌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眼看馬恩列史毛那一套「舊法」搞不下去了；他甘冒兩耳重聽之大險，來搞一套鄧小平之「新法」以代之。

什麼是鄧氏之「新法」呢？這「新法」便是冶亞當·斯密、里嘉圖、馬恩列史、凱恩斯等於一爐的華僑飯店的「炒雜燴」，見利忘義（忘了恩師老馬之義）的偉大的「機會主義」是也。

讀者知否？敝老師胡適之先生，終身所說教的那一套所謂的「實驗主義」，原來的老名字就叫「機會主義」。只因杜威等一批書酸子，嫌此名不雅，乃改成「實用主義」、「機具主義」、「經驗主義」和「實驗主義」來——也就是老鄧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機會主義」(opportunism)並非「投機取巧」。它亦意味着「因時制宜」、「見機而作」，多談問題、少說主義，不拘拘於死教條的一種哲學思想，和與這思想(胡適思想)相輔相成的一種政治經濟體制。老美立國二百一十年，靠的就是這個傳家之寶。老胡活了七十二歲，終身言必稱美國，宣傳的也是這一套。

可是老胡只是吹了一輩子，從未實行過一句。噫嘻乎！夫子嘆道之不行也，乘桴浮於海。想不到，東方紅，太陽昇之後，現在又出了個「我的學生」鄧小平，要大行胡適思想。躺在台北南港的胡老師，如地下有知，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如今小平以老胡之術，變老馬之法——變掉變不掉呢？「老胡之術」究有多少真理存乎其間，其一也；老毛胡搞了三十年，至今已積重難返，老鄧毅然挺身向前，其勁是否可以「格桐輪」，我人亦不知也。

所以今後歷史家要為鄧公「論定」，就不能只看他個人的生死榮辱，或二世、三世之是否爭氣。如鄧氏這樣的歷史人物，「蓋棺」奚可「論定」？！歷史家要看的是這個「第四次變法」的結果如何？

老鄧如「變法」有成，二〇五〇時率耀邦、紫陽自雲端下望；見中華大地足與老美爭輝，則鄧公本

人雖遭車裂，也何傷其偉大？如變法失敗，搞了二三十年，還是一窮二白、黨棍滿街，則鄧公百年後，由二世三世裝入水晶棺材，再塑八千兵馬俑相陪，也是徒然！

「小平新法」的本質

然則小平新法之成敗，究可蠡測一二否？曰，唯唯否否。

預測成敗，原是「星象家」之術。歷史家與歷史製造者，都不可胡說。蓋歷來替歷史算命之人，自孔聖人、秦「始」皇、經馬恩列到孫中山，無一不錯。唯一的一個「不幸言中」者，便是句句發金光的毛澤東。他預測他死後，「右派要當權」，才是分厘不爽！我輩無「偉大的舵手」之才，惡可信口開河？

不過，我國古代法家論政，總是「權」「勢」並列。吾人不能妄談鄧公百年後，掌舵者之權；然於「偉大舵手」舵下江河流水之「勢」，倒未始不可順流而瞻望之。

蓋近三百年來，人類社會生活幾經動亂，終於落實至今日美蘇之兩大模式。然則此兩大模式之利弊究在何處。簡言之，「美國模式」、「社會重於國家」(society stronger than state)之模式也。「蘇式」則「國家重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是也。

「社會重於國家」，則此「國家」之形式與運作，端視乎其社會發展之取向以決定之。十八九世紀之西歐與北美，由於生產之發展，帶動中產階級之興起。中產階級為搶奪政權，終能架空王室 (state)

，擯斥教會（church），而完成其以中產階級為政權基礎之英美模式。在此模式中，「國家」成爲「社會」之附庸。「社會」興隆則「國家」強盛；「社會」如由僵化而病入膏肓，則「國家」亦隨之毀滅。此模式發軔於古希臘。近世西歐封建制崩潰後，民族國家代之以起，社會重於國家乃變本加厲矣。

「國家重於社會」之模式則不然。處此模式中，則「社會」之變革，悉聽命於「國家」。「商鞅變法」時所搞的「強本抑末」；秦人統一六國之後的「廢封建」、「立郡縣」、「開阡陌」（亦即化公田爲私田的古代「土改」），均是由「國家」下令，強制執行之。漢武重農輕商，與夫「士農工商」階級之劃分，原也爲「國家」之「政策」，日久乃習慣成自然，變爲「社會」之「習俗」。「社會」形式之構成，實由一極權「國家」下令規範之、鑄造之、非自然演變之結果也——此點，馬克思、湯恩貝二大師，均因不通漢學而謬論之。

商鞅、嬴政之後而「千載猶行秦制度」，國共兩黨政權亦均「秦制度」之延續，並無基本上之變動。此亦我東方之政治傳統也。斯拉夫俄人臣服於蒙古帝國二百餘年（一二四〇—一四八〇），處於東方傳統之邊緣。十月革命之後以集權之中央政府，推行有效之現代化，遂成爲今日足與老美抗衡之「蘇俄模式」。

處此模式之中，則「社會」爲「國家」之尾閥。國家機器如完整有效，運用靈活，則社會蓬勃、人民安樂；反之如機件銹爛、操縱失靈，則社會百病叢生、民無噍類。

此一「國家機器」之操作者，在中國專制時代，則取決於一「家」；及其演變爲「蘇俄模式」則取

決於一「黨」。

孫文革命之初，頗醉心於英美模式。「同盟會」本身即一「三權分立」之革命政黨也。至辛亥之後，袁氏竊國，孫公始悟此一模式與我國政治傳統鑿枘不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之後，孫氏乃有「盲目服從黨魁」的權宜之計。至列寧統一蘇俄，十月革命大功告成，孫公乃大悟「今日中國之革命，若不以俄爲師，斷無成就。」（一九二四致蔣介石函）

孫既改採「蘇俄模式」，果然成效立見。身死未幾，即爲國民黨政權之「太祖高皇帝」矣。

國民黨「以黨治國」數十年，總理、總裁、主席均享有無上之權威，斯與「以家治國」究有何異？然治國以家，究有兩千餘年之經驗；而治國以黨，學之於三五年之間也。經驗不足，則毛頭小子縱橫捭闔、上下交征利，不旋踵便使機器鏽爛、黨徒異化，弄得萬民倒懸了。筆者近年序李宗仁之書，有關抗戰後，國民黨腐化之一段，曾說，「『一黨專政』不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專政而無能，才是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

由於專政無能，國民黨才把從倭寇手中奪回的錦綉河山，再讓給中共去專政一番。中共何物？孫國父戶口下之「二房」也。二房搞了三十年，其胡塗暴戾，有甚於老大。直至小平崛起，始悟「蘇俄模式」雖較近乎「漢家傳統」，然在現代化途中，落伍殊甚。吃一塹、長一智，鄧小平乃再走回頭路，學中山搞其黨內變法。「學台北」，「以美爲師」，以求速效，以解倒懸。然小平無法揚棄其腐爛已甚的「蘇俄模式」，仍搞其「四個堅持」；在所謂「特區」（希望將來包括港澳台灣），則搞其並無「中產階

級」存在之「走資」。前者似馬已非馬，後者稱驢不是驢。嗚呼！將伊於胡底？如今大陸之上，驢馬雜沓，滿朝文武手忙腳亂，是爲「小平變法」現階段之實質。吾人隔海觀之，尙不知老鄧的「實驗社會主義」(Pragmatic socialism)將這羣雜沓驢馬，趕向何處去，姑拭目耐性而待之。

「制度」從何來

筆者作上述觀察，並非對「小平變法」持悲觀態度。相反的，吾之態度甚爲樂觀。何也？

因小平繼老毛之後，老毛者，無法無天也。因此「小平變法」，不管變出個什麼「法」來，總比毛老大「和尚打傘」要強得多了。語云，「窮則變、變則通！」小平變法，是非變不可也。

因此鄧公今日之問題不在「變」，而在「通」。「變」之不停，日久必「通」——問題是哪年哪月，才能「通」，時間問題也。更切要者，「通」的時間，不可拖得太久，久拖而不「通」，是亦專政而無能，最好不打自招，退位讓賢。

然則「通」之定義爲何？「通」者，能搞出個合理可行的「制度」，爲往聖做綜合，爲百世開太平也。

我國漢朝的「文景之治」，其重要性不在圖一時之強，而在爲後世立一帝國制度也。

美國革命後，全國一團糟，「聯邦主義者」(Federalists)，閉門思過，搞了五年(一七八四—一七八九)，最後搞出個聯邦制度來。時至今日，縱我美籍華裔，亦蒙其惠。

但是一個「制度」，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禮記》作者曰，「文王周公、制禮作樂」，是牛皮匠之胡吹也。

「制度」者何？智慧與機運之產兒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今日老鄧有此「非變不可」之「機運」——僵化了的國家或社會如末季滿清，和今日蘇美，則往往欲「變」不能！蘇聯政府今日便無法改制；美國社會秩序，亦永無改善之望也。二者均已過份僵化矣。

鄧公今日亦有其現成的「智慧」可師，毋須搞空中樓閣，強不知以為知。蓋今日世界上之政治社會制度，已演變成非楊卽墨、非紅卽白、非蘇卽美之兩大主流，各有短長。老鄧別無他途可循，渠必須（着重「必須」二字）於兩大主流之間，截長補短，搞出個中間制度來。

老鄧如是個好學生，他可兼收二者之長，而凌駕之；老鄧如是個笨蛋，則並蓄二者之短而超過之——令人望而生畏者；則是兩個極端皆可能是最後結局。如前者是將來，則二十一世紀將為「中國世紀」也。如將來是後者，則中華民族萬劫不復，老鄧亦遺臭萬年矣。

簡言之，卽是小平變法，今日有「法」可「變」，雖經緯萬端而方向極其明朗——必在美蘇之間也。小平不能開倒車，再回頭學「蘇聯老大哥」，迷戀其「光輝的五十年代」（這點最令人擔心。共產黨人當局者迷，不知「六七十年代」是「五十年代」的必然後果）。

小平今日也不能只在經濟上專學老美。王莽、王安石之變法，便是專搞經濟、忽視政治，搞出毛病來。商鞅的成功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雙管齊下，同時解決！大陸今日的跡象是一致「向錢看」，認為

魏京生、王希哲、王炳章，抓起了事——這和台灣當年抓柏楊、李敖如出一轍。認為只要「經濟」起飛了，「政治」不是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

中國絕不可能全學美國，學到美國這樣色情、暴力、罪犯——個人主義氾濫亦不是好事。但是扶植人大、政協，使其漸次走向較民主的議會政治，減少甚或取銷「黨天下」，使「國家」和「社會」平衡一下，恐怕是必經之途。

吾人處八十年代之今日，在思想上當「洋奴」或「遺佬」，都成過去。今世西人以官吏作「公僕」固是進步；中國傳統的「爲民父母」、「作之君、作之師」的「牧民」思想，也不一定全是「封建殘餘」。美國社會今日之僵化，便僵在富而無教，公僕太多，君師太少；中國則反是。何以平衡之，那就看強而有力的政治家的「智慧」了。

總之，今後中國制度，總應在「國家」與「社會」平衡的大方向上發展才是。吾人今日已有此「機運」，今後是否有成，端視我們「偉大的舵手」和全國人民是否有此「智慧」了。

我爲全民族復興之智慧與能力而擔心；不爲鄧公百年後「接班問題」作杞憂也。

小蔣總統的歷史地位

在大陸上這個驚天動地的「變法維新」運動之中，台灣在這舞台上表演的是什麼個角色呢？

筆者十餘年前，嘗爲文以三十年來之台灣與十七八世紀之英國相比擬。台灣在日人統治之下凡五十

年，與大陸隔絕殊甚。國民黨一旦自大陸敗退，全師移台，變成寶島上之統治者，其情況頗似早期英國之貴族。然三十餘年與民休息、努力經建、恩惠專政之結果，終使經濟起飛，而中產階級乃隨之崛起。崛起之後乃向皇室爭權，皇室步步退讓，最後必被全部架空而後已。這也是個歷史上必然發生的客觀實在。不因元老派吹鬍子、瞪眼睛而中止也。

成長於台灣的「青年才俊」，事實上不特今日早已掌握寶島上之金融文化，足跡亦已遍佈全球。若輩如今不論寄身「黨內」、「黨外」或「台獨」，其中產階級之背景，與服膺「美國模式」之思想，與鄙薄「馬列史毛」之態度，則頗為一致。

此輩青年才俊，彌補大陸上「十年浩劫」之文教空白，中華民族中不世出之精英也。在民族史上必有其不磨之地位與影響。台灣國民黨中仍多的是抱殘守缺之輩，然相形之下，必被若輩全部淹沒而已。

在此一大「勢」發展之下，小蔣總統之作風，實有足多者。經國出身「高幹子弟」，本是上海灘上小花花公子；嗣又留學蘇聯、列名共黨，清算老父。回國後又在廼父親手訓練之下，搞國民黨派系政治，弄權攘位，終於父死子繼、位登大寶。

這一連串的複雜背景，老實說，均不足為經國病。把他和鄧小平乃至國共兩黨的高級派系領袖相比，又有什麼不同呢？不同者，他有個精心培植他的「好爸爸」而已。但是劉禪也有個了不起的老子，還加上個諸葛亮，結果還不是個「扶不起的阿斗」。——經國之步步上昇，亦自有他自己了不起的一套。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經國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勇氣突破他老子那個破框框，而另搞一套。表面

看來，蔣氏忠孝傳家，前朝聖訓，祖宗家法，半字不可易——經國似乎也是個「凡是派」。其實隔洋冷眼旁觀，其父子之間，却有「獨裁」與「民主」，「毀法」與「守法」之異。

比起那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毛澤東來，那「然諾重千金」、「禮賢下士」的蔣中正，還可算是個君子。但是蔣氏那副崇德、崇日而鄙英、輕美的個性，使他天生個獨裁的坯子。蔣公是位幹材，什麼事都可做，就是不能做個「民主政治家」——他血液裏，沒有「民主」細胞也。介石如脫下征衫，隱姓埋名來在「基層選舉」裏，競選桃園縣長，他那副臭烘烘的樣子，就保證他必敗無疑。大陸易手之前，知蔣人士就說他「獨裁無當、民主無量」。前者事實上是句褒辭——蔣某頗有人性，做得沒有老毛那麼「絕」，後者則是對他個性的寫實。

小蔣在這方面，比他老子好得太多了。這是他們父子個性不同；也有人說，那是時勢使然。但是像小蔣先生那樣的人，能夠順應時勢、潮流，那也就夠不平凡的了——他老頭子就做不到。

他們在「守法」（不管王法、民法）方面，也父不如子。老蔣「仗義」而輕「法」。一言九鼎，有「領袖人格」、「江湖義氣」——他這項威風凜凜的個性，便吃了共產黨周恩來等人的大虧。但是蔣公素不守法，縱是他自訂的「陛下之法」也沒有遵守的習慣。

這一點，小蔣則「現代化」多矣。經國比較守法。君不見，吾之小友李敖，動不動就罵他老子，罵他晚娘，經國皆能曲予優容。否則他就只能「繩之以法」。而李敖這小子是個好律師。你在法律上「繩」出個漏洞來，李某會東引「一條」、西引「一則」來加以反控，搞個 Jao Li V ROC。這樣，告

到法院去，則那些護憲大法官，一就不定能辯得過狗頭訟師李敖。免得爲李某打「知名度」，恕之了事。一方民主、一方強項，都受人恭維，各得其樂——李敖也就變成台灣民主、法治、學術自由的頭一號大招牌。小蔣總統也就變成中華三千年史上第一個守法而民主的最高執政者。這都是小蔣總統、打破歷史紀錄的地方。

敖之，敖之！你如住在「老蔣」、「老毛」、甚至「老鄧」的治下——從實招來，你敢？！

打內戰如打老婆

所以，台灣在小蔣總統治下，今日已頗具法治、民主之雛型，中國歷史所未有也。加以三百億美元外匯存底，寶島居民如知足，這都是值得自豪之事。凡事有客觀標準——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求全責備，雞蛋裏找骨頭，哪能十全呢？

台灣既有此「美國模式」民主法治的基礎，民心怕亂。小蔣總統一旦不諱，中國老百姓是善良的，甘棠之思，可能更會感人。民心不思亂，寶島自有出路、不會亂也。

台灣今後之走向兩黨制的議會政治，蓋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黨內外人士之是否有器度耳。台灣如真能搞出個「議會政府」來，繁榮、安定、人權、民主，大陸對鏡自照，亦非走此路無他途也。

大家既能在思想上、制度上一致矣。形式上的統一餘事也。用不着擔心水到而渠不成也。有人或擔心大陸或隨時對台動武。鄧胡諸公不一再作此威脅？

讀者知道嗎？「打內戰」亦如「打老婆」，既打就不能洩氣；洩氣了就不能再打。他們雙方已洩氣三十餘年了，老伴不能再打了，以後就動動口吧。讓我們公正的海外華人來評評，公婆哪個有理。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於北美

十載功勳才一半

——爲鄧小平半途結賬

我們學歷史的人，如就職業性的志趣來說，大致可分爲兩等。第一等史家，大多志在作「帝王師」。他們要告訴統治家、獨裁者，怎樣去治國平天下。這一類史家在今日海外的僑報上，仍隨時可見。

等而下之，另一種歷史家就只能說是做「帝王的賬房」。不時替統治家、獨裁者，結結賬。中國《二十四史》的作者們，大多屬於這一類。他們所結的賬，大體說來，都還不太離譜。

今日中國大陸上的鄧公小平，不用說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統治家——雖然他不是「帝王」，也還算不得是個「獨裁者」。鄧公在三起三落之後，而終有今日穩如泰山的局面，大致是從一九七八年末季開始的。他成爲中國真正的管家婆，如今已五年有奇。他很「會搞」——這五年搞得不錯。我們正希望他長命百歲，把中國好好搞一下，想不到他最近忽然替自己算算命，說他「只能再活五年」！

鄧公已幹了五年，再活五年，一共就可幹十年。前五年搞的不錯；後五年看樣子也不會太壞。這十年在中共統治的歷史上，也可算是個「小平中興」吧！今值「中興」半途，我們徽州朝奉們來替鄧老闆

半途結結賬，也算是適時而應該的事吧。

起死回生

歷史家對鄧大人的賬，大致可從幾方面去結：

第一，鄧小平之命是貴而苦；一個多災多難到公卿的「八字」。他接下的那個老毛留下的爛攤子，真令人不忍卒言。如今縱是最忠實的「凡是派」，恐怕也會相信，毛大主席如果多活十年，那中國如何得了?!幸好天可憐見，上帝按時「恩召」。可是在毛皇帝龍馭上賓之時，所謂「中國」，真是國不像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懸岩勒馬，扭轉這個頹勢的，實在是「鄧矮子」一臂之力。孟子說：「嫂溺而援之以手。」沒有小平這一手，共產黨這位嫂嫂，不淹死，恐怕也差不多了！

對中共政權的「起死回生」，小平之力也。（抓過毛婆娘的華主席，一名刑警而已。）

恢復共信

孔老夫子說過：「凡人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個國家可以無食、無兵，但不可無信。在毛澤東這個大獨裁者的死前二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全黨上下，真是鬼話連篇。全國都在睜着眼說瞎話——「毛澤東思想」的字典裏，可說沒有個「信」字了。上下相率而為偽。舉國無信，還成什麼個「國家」呢？「民族」呢？但是朋友！你能否認這個事實嗎?!

謝天謝地：老毛死了，老鄧上來。他竟然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內，把中國又搞出點自信來。小平雖矮、威信彌高。工農兵如今對他，顯然頗為相信；小平更是知識分子的靠山。海外華人對他也很信任。毛澤東那個「偉大的舵手」，是老婆封他的。如今老鄧倒真是個穩重的舵手。其人可信而舉國信之。鄧小平以身作則，一反共產黨多少年掩耳盜鈴、鬼話連篇的老傳統；實事求是，把個破爛的大陸，又恢復了一些共信。

民有共信，則懸的以赴，重振聲威，就不太難了。君不見幾年前灰頭土腦的「大陸同胞」，如今昂首濶步、談笑自若，居然超級大國之民焉。

這點共信之恢復，小平之功也。

勵精圖治

文革期間，老鄧為貪玩「橋牌」，幾乎把小命送掉。如今積習難除，橋牌照打——筆者便有兩位「又到浮梁買茶去」的僑友，最近就陪他抹過整晚的橋牌——但是穩坐「釣魚台」，小平指揮若定。全國在他羽扇綸巾之下，勵精圖治。大道消息，小道消息，都傳出一遍嘉音，顯出一番朝氣。內則汰去老弱殘兵，重用青年才俊；外則引進精密科技，內行領導外行。當年毛主席的「大躍進」，華主席的「洋躍進」是一去不復返矣。國家重建，總算摸上了康莊大道。

筆者近年不知輕重，被捲入「華埠政治」，貴為「兒童培護中心」副董事長」。乖乖！誰知道這

隻小蒼蠅，竟如此複雜、如此難搞。想想太平洋彼岸，那隻大老虎，被鄧小平搞得那樣服服貼貼，叫怎就怎。乖乖，鄧小平不是文王，也是周公，真聖明之主也。

毛澤東那個爛攤子，能有今日有條有理的局面，鄧武松之勇有以致之也。

收拾幫會

鄧小平是位才大心細、有膽有識而又老成持重的一位統治者和管家婆。他不像那魯莽絕裂的毛澤東；也不像那「一生惟謹慎」的周恩來。他也不像林彪、康生那樣搞陰謀詭計，搞小圈圈。所以他的爲人與才幹便一直爲毛澤東所賞識；毛並在赫魯曉夫於一九五九訪華時，對赫氏把「那個小矮子」，認真的捧了一番。爲此老赫還特地去找到「那矮子」，拉拉私人關係、走走後門，爲將來鋪路呢。（見赫魯曉夫《回憶錄》英文版二五三頁）。

毛澤東是個睚眦必報的人。正因爲老鄧不搞「小圈圈」，才刀下留情、饒他一條小命。鄧氏大難不死，常常自吹是「命大」。豈真小平命大哉？主席高抬貴手也。鄧氏爲此亦念念不忘活命之恩，而對毛頗有恩情。毛澤東晚年做了一萬件錯事，只一件做對了——他沒有殺鄧小平。

正因爲小平不搞小圈圈，他在軍中黨中都保持了一定的德望和威信。他沒有用太多私人，憑良心，胡耀邦和趙紫陽都還算是「量材器使」的結果。

史家說：「諸葛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鄧小平這點倒有點像孔明先生，秉公辦事，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你如真能大公無私，大家還是心服口服的。這個四千萬人的爛幫會，所謂「中國共產黨」，汰冗員、增新血是那麽容易的嗎？看看我們擁有十五位「中央委員」的「紐約兒童培護中心」，就可知道。但是，「真金不怕火」，你真能爲着黨國復興的需要，大刀而潤斧之，還是可以做得到的。正如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良能」，原是「人之初」的本性嘛。

鄧小平這次整黨，成績不錯。

黨能管槍

小平治軍，搞得更好！別看他矮矮的，站在吉普車上，向三軍「答禮」，那副「沐猴而冠」的樣子，倒是個地地道道的三軍統帥呢。

毛澤東當年口口聲聲地「黨管槍，槍不管黨」。那躲在莫斯科、有家歸不得的老同志，筆者小老鄉王明，便口口聲聲說毛在搞「軍事獨裁」。史家公平地說，老毛搞的是徹頭徹尾的槍桿出政權——自「遵義會議」之後，老毛一天也沒有放開過槍把子。全國由大槍桿子管；中南海「老同志」，則讓「八三四一」小槍桿子保衛着。這樣大小保衛，全國自然會服服貼貼。只有那低能下流不民主的雍正皇帝，才去搞什麼「血滴子」呢。

老鄧不能說不靠槍桿，沒有槍桿小平就一平也不平了。但小平之抓槍，沒有老毛從「三灣」開始那樣悠長的歷史。老毛是「法家」。他對十一大軍區司令員的統制是：「臨之以威、施之以恩、懷之以德

。」這才使他手下的張翼德、尉遲恭、劉玉璋……等感戴皇恩，「主席指到哪裏，我打到哪裏。」

「鄧矮」倒有點不同。他沒有如蔣若毛之「威」——矮巴巴地有啥可「威」的呢？他也未搞過「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的阿瞞之「恩」。他更沒有把阿斗向地下一摔，便讓趙子龍叩頭流血之「德」。

但是你看他——至少到目前為止——治軍的本領，似乎比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還要有把握些，憑的是啥門子本事呢？無他，那也就是他逃過十年浩劫的本事——其人比較正派。鄧氏之才，比不上袁、蔣、毛三公。而鄧氏之私心也沒他們三位那麼重。照我們近十來年不夠深入的觀察，鄧氏的個性，倒確是想把「國」先搞好。不像上述三公，先從「自己」開始，然後才由「黨」及「國」。

司馬溫公的話有時還是對的，「德過於才，是為君子。才過於德，是為小人。」在他們共產黨那批黨棍子之中，鄧小平可算個「君子」，至少算不得「小人」。「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他是一位「恩」「威」皆缺的小矮子，怎能把幾十位手握重兵的大老粗，管得服服貼貼，難道是靠他四川的麻婆豆腐嗎？

幹他這一行，鄧某不能不有套權術。但是他的「身教」却遠比「權術」重要。

一個當國者，如果真能「公忠體國」，再「會搞」（二字為鄧氏最新「語錄」）一點，大家自會信服的。

應付「黃牛約翰」

鄧公「會搞」的另一表現，是他和「黃牛約翰」爲着「香港問題」，正在大打其太極拳。「矮子」出手幾着，頗有套路，值得鼓掌。

我們讀外交史的人，大致都同意，近兩百年來的列強外交關係，尤其是搞殖民地外交，英國最高明，也最難纏。俄國次之。美國最笨，也最容易對付。（法國和戰前日本，只是一批王八蛋，不值一提。）唐寧街十號之耍殖民外交，真是指揮若定，緩急咸宜，進退有度，亦卑亦亢，不喜不怒，爲着「大英帝國之利益」，手法之高明，眼光之遠大，真令讀史者於半夜打翻茶杯，拍案叫好；把老婆吵醒，瞠目不知何事。

爲着急於收回香港，顧維鈞先生告我，他在戰時重慶，曾被蔣公大火光了一頓。如今蔣公墓木已拱，香港還不是「女皇陛下」的？！

中共那幾位山洞裏出來的外交官，比起顧公少川來，恐怕只能提提皮包吧！由他們出來應付天下第一難纏的「約翰黃牛」，隔着太平洋，我替他們捏把汗——「毛澤東思想」中字字發金光的三字經「不信邪」，我看是行不通的了。「邪」還是「信」一下的好。淮海殲滅戰在香港是打不得的。

筆者不學，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近年來在無數次學術討論會上，都認爲「中國統一問題」的焦點在香港。如果彈丸之地的香港都搞得一團糟，那還談什麼「統一台灣」呢？

「不信邪」的先生們，有些就是恃強好武，殊不知，武力是可解決很多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香港便是個例子。「約翰黃牛」既不聽話，鬥牛士又不能動武，如何是好呢？原來他搞的是「四兩

撥千斤」，你也用不着「千斤撥四兩」嘛！有人打人、無人打影。你來個「高探馬」，我還你個「海底針」。功夫是練出來的。鐵鏡公主說得好：「駙馬爺，有話好好說，您急什麼呢？」

對香港問題，鄧「駙馬」原先倒頗像「淺水龍困在沙灘」，急得連「艷陽天、春光好」，也無心遊賞，恨不得催卓琳夫人，到白金漢宮去盜她個「令箭」，好去「過關」。我爲他健康擔心。

可是近幾月來，我看鄧「駙馬」，氣沉丹田，心平氣和多了。老相識周南大使最近奉命赴港，老周打的是「高探馬」或是「海底針」，小道消息尙無報道；但是打他個「四兩撥千斤」的套路，總歸是正確的。拳高一着，整手整脚。進退得宜，不喜不怒的太極拳，原是我們的張三手發明的，爲什麼連條黃牛也制服不住呢？

搞國際政治的，要繳學費，要做功課。張鐵生「部長」是要靠邊站了。

近兩年來，鄧公很用功，功課做得不錯。能夠應付黃牛，則洛杉磯一個唱戲的，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你看四小名丑的郎奴·列根，還不是爬爬長城，看看秦俑，就乖乖地回國競選了。

死掉怎辦！？

千言萬語，話說回頭。老鄧過去這五年搞的很不錯；再過五年，成績可以預卜。

以前吳子玉大帥做五十大壽，康有爲去拍他馬屁，說吳：「百歲功勳才一半。」

「小平中興」據鄧氏自己估計，只能搞十年。我們今天來拍鄧老闆馬屁，也可說他是「十載功勳才

一半」。問題是「十載之半」的時間是太短了。白駒過隙，轉眼即逝。五年之後，老鄧萬一真的死掉怎麼辦？

鄧氏只搞五年，成績已見；再搞五年，則中國經濟建設、教育進步，將更有可觀。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其實正相反，樹木倒需要百年，樹人則十年足夠。「小平中興」十年之後，中國歷史上將是一番新人、新樹、新社會。到那時，鄧小平老而不死，又怎辦？鄧大人一身繫天下安危。一旦時代變了，社會變了，鄧公死與不死，都將會變成歷史上待決的難題！老毛就是個例子。

老而不死的問題

五年之後，鄧公如真不幸「短命」而死，接班人是否接得了，固是問題；而不死的問題又何在呢？

原來近百年來的「現代化運動」（注意：「現代化」只有「一個」，沒有「四個」。）也可簡稱為「革命」吧，是有其極明顯的「階段性」的。做一個循「階段」發展的運動領導人，在近代史上，只有孫中山一人，他底學識、眼光、魄力和人格，能使他接連領導兩個「階段」——反專制的「辛亥革命」，和反軍閥的「北伐統一戰爭」。他志氣未盡，而個人功德圓滿，血食千年。

其後蔣、毛二公，則只能「領導」半個或一個「階段」。蔣承孫公餘蔭，完成北伐，領導抗戰，固然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而毛在「解放」之初，打倒了「反動派」，搬掉了「三座大山」，又何嘗不是全民歸心，一世之雄呢？！

可惜而可嘆的則是，現代化運動的向前發展，也有其一定速度的；古老中國，十年一變。其學、其識、其才、其德，只能在現代化運動中，領導一個或半個「階段」的人，則往往只能全始而不能全終——也就是以「革命領袖」始，以「革命對象」終。

時代最無情。他們一成不變，墨守陳規，終於被時代遺棄了。

蔣公出身早，得志早，在大陸上被遺棄也早，所以躲到台灣後，還有二十餘年「退思補過」的機會，在歷史上把「蓋棺之論」，向回扳一扳。毛公出身晚，得志晚，被時代遺棄也晚。死成個「昏君」、「暴君」，又臭又反動。試問廿世紀的革命領袖們，哪一個死的比毛澤東更反動、更臭？

蔣、毛二公皆人傑也；民族英雄也。所以如此下場者，無他，時代前進而自身一成不變者也。

走「回頭路」

現在再就歷史事實，爲小平鄧公的賬，來預結他五年。

小平在繼毛時代中最大的歷史任務是收拾毛的爛攤子。共產黨人本不懂啥叫哲學，却最歡喜談哲學。鄧氏的「收拾爛攤子哲學」叫做「實踐檢驗真理」。換言之，就是在實踐之中，以前凡老毛所作所爲，有實用價值者則保存之，無實用價值者則狗屁之。

五年以來讀歷史的人已不難看出，在鄧派眼光中，五七以前的「毛澤東思想」無一而非有實用價值者；五七以後，毛家夫婦之言行，則無一而非狗屁也。所以大家口口聲聲「中國浪費了二十年」。今日

當務之急，便是恢復五十年代的「光輝盛世」。

至於科技發展，經濟援助，如今「蘇聯老大哥」雖已開翻，洋基小二哥亦可全盤頂替（這着「險棋」老鄧有魄力，走得好！）總之一切恢復五七以前狀態，從頭來過，自然大吉大利——這就是「小平中興」的總算盤。我希望我的觀察，沒有大錯。

可是歷史上的事真就如此簡單嗎？歷史會回頭嗎？光緒可以變成康熙嗎？「中國共產黨」這個把四千多萬好蛋、壞蛋煮於一鍋的、世界上最大的「瑪非亞」、真是如他們所說的「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嗎？二十年浪費，單在「大躍進」期中，便餓死農民上千萬；十年浩劫，幾十萬混蛋，整死整傷幾百萬好人，真只是一人之過嗎？當年也會貴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對這筆「血債」——包括他自己兒子的血就毫無責任嗎？若說小平當年「無能為力」，但是為什麼「無能為力」呢？他不是痛定思痛之時，也應該好好的想想嗎？！

「當局者迷」

翻翻中共統治三十五年來的流水賬，我看中共的問題是「當局者迷」四個字。

鄧小平在十六七歲，便開始對「共產主義」迷信起來。任何人的頭腦對某種特定「信仰」，迷信了六十年，他這塊頭腦就會變成那「信仰」的「化石」。其他思想和制度，對這塊化石是「針插不進、水滲不透」的——這現象對一個有原則有個性的「老革命」尤其顯著。喝過花都洋水的鄧小平如此；只會

吃湖南辣醬的毛澤東就更是如此了。等而下之的胡耀邦、趙紫陽、華國鋒……和千千万萬有良心有骨頭的「黨員」，也是如此。事情弄好了，那是「黨」的「政策」「正確」。事情弄歪了總歸就怪「人」、怪「幫」、怪「派」——不怪老毛，就怪林四。

他們就想不到要怪黨，或怪怪這個「黨」的本身制度；和「黨的領導」這個逐漸被時代淘汰了的觀念。其所以然者，第一只怪「人」，不怪制度，是我們的國貨，老傳統。共產黨人最喜歡談舶來哲學，其實滿肚皮中國垃圾。第二他們縱想換換花樣，但是六十年自我閉關，肚皮裏也沒有太多洋學可放。除掉馬恩列史——那套西洋正統文化中的旁門——他們所知也實在有限。

老毛焚書坑儒，焚、坑得太徹底了。黔首「以吏爲師」（還不夠資格搞「以法爲教」！）搞了三十年，搞成這種局面來，夫復何言！

「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其實當今中共政府的毛病（其實也是世界共產政權的通病），西方傳統的「政治學ABC」中早有交代。那就是「無限制權力」（unchecked power）或「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的毛病。西方的大學先修班的學生都知道的常識：「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對這點共產黨的領袖們是「絕對」不相信的。不幸的是，我們毛大主席晚年的行爲，便是這條真理最佳的實例。

不特此也！

試問中國共產黨中只出一個「毛澤東」嗎？非也。共產黨中上上下下，正不知出了幾千百個「大小毛澤東」。大毛壓小毛、小毛怕大毛，三十年相沿成風。做烏龜的永遠是「人民」。其實大毛小毛皆我兄弟姐妹也，何以一旦入黨做官便糟糕若此。無他，制度使然也。「只緣身在此山中」，老鄧顯然就未想透這一點。事情弄糟了，罪在「政策」；「政策」好了，又說錯在沒有「落實」。是耶？非耶？

所以隔海遙觀，「鄧小平中興」，似乎一直在「治標」上兜圈子。至於如何「治本」，則顯然不在「政治局常委」們的智力與能力範圍之內。在電視上看到鄧公的痰盂，就不禁懷念起毛主席，而打個寒噤。但願蔣毛二公晚年與時代脫節的歷史悲劇不會重演。

秃子的結論

我們今日所謂「華僑」，實在是「洪楊時代」的秃子——他可在「長毛」、「短毛」兩邊跑。看過大陸再看看台灣，倒頗有所感。台灣近年的「地方選舉」和「增額立委選舉」，乖乖，真嚇壞人。再看我的小友李敖。這小子終日在罵「混帳國民黨」。罵得名滿全島，稿費如潮，施施然「總統候選人」焉！

「敖之呀！」一次我告訴李敖，「你是國民黨民主樹窗內的模特兒啊！」但是李敖不以爲然，他認定那是他不怕死的結果。

敖之，小麻雀也。就把你「陳文成一下」，看你怎樣？小蔣先生不聞不問者，非不能也，大可不必

也。不理你，你小子能撒出丈二長的湯？！

有此經濟和教育的基礎，再加點「退讓政策」，就不怕你李敖那套「罵人的自由」了。十八世紀的英國，早已如此。台灣今日可趕上兩百年前的英格蘭，而大陸上的政治現代化的水準，則還停滯在雷震時代的台灣。

老毛子在邊疆陳兵百萬，小平了無懼色，而對一個小工人魏京生，則畏之如虎，何哉？學歷史的人要「結賬」，就難免深思了。

等到鄧小平能不怕魏京生，亦如蔣經國之不怕李敖，則鄧公在歷史上便另有諡法了。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於北美洲

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鄧小平變法」

過去一個月在我們中國大陸上所發生的事變，其經過之可悲、政府處置之笨拙、軍警鎮壓之兇殘、中共事後遮羞之醜陋、對後世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上真是「史無前例」；在世界歷史上亦很難找到。

一言以蔽之，這整個事件的爆發，可說是「鄧小平變法」，走火入魔的結果——引他們中共老祖宗陳獨秀教授一句名言，就叫做「以君子始、以小人終」。小平變法之初，在「小平您好」的敬愛心情之下，真是全中國、全世界一片彩聲。筆者不學，所見有限，私下也肯定小平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可能在袁、蔣、毛之上。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小平有此機運，也有其眼光與魄力。

誰知年未經旬，如今「該死不死」，鄧小平竟變成全中國、全世界一致詛咒的暴君和屠夫，真是「若是當年身便死，此身真偽有誰知？」，我們搞歷史的，再也沒有想到，十年前的鄧小平，在十年後竟搞出這個下場！擲筆嗟嘆，夫復何言。

鄧小平這場北京大屠殺，據他自己政府的公佈，手執機關槍的解放軍死傷五千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老百姓，死傷兩千人！就算我們相信你們的鬼扯數字吧，這七千人中該產生多少終身殘廢的「鄧小平

兒子」？多少槍下冤魂的「李鵬的老子」？

小平，你面對幾千百個，終身坐輪椅之人，你向你兒子，如何交代？——叫他們做樸方的「會員」？死一兩萬（亦說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安定，換得了嗎？這種話希特勒、史太林、蔣介石、毛澤東所不敢言而鄧小平言之，我們能肯定鄧小平是個政治家嗎？十億人民能承認他是「家長」嗎？

李鵬，你的「戒嚴」，你的「鎮壓」，造出這許多冤魂、烈士。你製造了千萬個寡婦孤兒，你活着時就不想想五十年前的孤兒「小李鵬」的遭遇？和「小李鵬」可憐的青年寡婦的媽媽！？你將來死入地獄，何以面對看守地獄的李烈士，你老子的冤魂？

總之這場血債，今後二十年內是洗刷不清的，而八十四歲的鄧小平還能再活二十年嗎？以一個有「近代中國第一位政治家」機運的鄧小平，終於死在「國人皆曰可殺」的一片詛咒聲中，也太可惜了吧！老人政治的昏瞶胡塗，多麼可怕。

我爲鄧某可惜。

我爲中國命運一哭！

我爲中華民族史浩嘆！

國共對比，如出一轍

在上節拙文裏，我沒有提更殘暴的楊尚昆，因爲楊尚昆在歷史書裏的地位，只是京戲舞台上的一個

「三花臉」，就一筆帶過吧。

再談點根本問題：鄧小平變法爲何走火入魔呢？其情況便有點像當年「抗戰後」，國民黨所搞的「劫收」和「五子登科」！

國民黨和蔣中正先生對當年抗戰是有不世之功的——也是個「以君子始」吧。抗戰是太艱苦了。在臥薪嚐膽、堅苦卓絕的條件下，老K在重慶豢養了一大批餓鬼。抗戰一旦勝利，這批餓鬼在京滬平津的花花世界中，臨空而下。乖乖，來他個餓虎撲羊，五子登科——房子、車子、條子……無一不抓，管他鳥國脈民命和中華民族的前途。一場「劫收」下來，弄得天翻地覆，父老們啞口無言，青年大學生看不慣，便造反了——「想中央、念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三年前的「民族英雄」蔣委員長，不旋踵就變成「封建反動的總頭頭」、「第一號戰犯」的「蔣光頭」了。結果「以小人終」。

歷史就是這樣無情！我們當年亦嘗爲蔣某可惜。

今日的共產黨呢。歷史重演了！

中共執政三十年，被老毛鬥爭清算搞得一窮二白。在十億餓鬼中，卻豢養出幾十萬有生殺大權的大餓鬼、大色鬼。天可憐見，毛澤東這位大瘟神死了。鄧小平看出老毛那一套搞不下去了。算是老鄧有魄力，乃搞出個大膽的「開放政策」來。老鄧應該知道，當年給毛公關在鐵籠子內的原是一大羣「臥虎」；如今一旦把籠子「開放」，這一下「虎入羊羣」就天翻地覆了。「毛澤東幹部、兩袖清風；華國鋒幹部、無影無踪；鄧小平幹部、百萬富翁！」其然哉？豈不然哉！

「幹部」者，老虎也。苛政猛於虎，況餓虎乎？

鄧小平因而同蔣介石犯了同樣錯誤。他們都是把「餓虎」沒有作適當的管制，便放牠們入羊羣了。父老兄弟，吞聲之餘，不怕死的青年學生和工人就造反了。

蔣、鄧二公不同之處，是蔣只敢用水龍澆淋學生，或鬼鬼祟祟的在宿舍裏偷偷捉人；鄧某氣魄大，就用起機槍、坦克，殺人不眨眼了。蔣介石娘娘腔，殺一兩個學生工人，自己就發抖了。

鄧小平殺他數千人不吭氣，真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員！

最令我發笑的是天安門內那些牌子，把三百年前打入天安門的暴動農民，說成「李闖王的起義軍」。而現在呢？卻把幾千個靜坐在天安門外，要求對話的和平學生，說成「暴亂分子」，加以槍殺！

不顧世界輿論、不問歷史家如何下筆，中南海高官們，竟然有這公然睜着眼說瞎話的厚臉皮。真是醜陋不堪！

犯不着，也無此必要

中共政權這次與全民為敵，殺人如麻，最令親痛仇快、史家扼腕的，是「犯不着」三字，或「無此必要」四字。

這次事件，原可裨樞不驚、皆大歡喜，和平解決的。造成這血流成河，轟動世界的慘事，完全是由於三數位——尤其是李鵬——魯莽滅裂，愚蠢笨拙的結果。

學生們要求些什麼呢？他們要反貪污、反特權；要民主、要自由。爲此四項，政府不理他們，他們才絕食要求和政府當軸「對話」。他們底要求並不高嘛！有什麼了不起呢？何況他們背後既無「托派」，又無「國特」，更無「美帝間諜」，有什麼可怕的呢？

翻翻歷史、想想當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學潮，哪一次沒有中共「白區地下人員」或「民主同盟」從背後策劃鼓動呢？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明知其如此，還是不敢開槍。如今學生運動全屬自發，更沒有青年要打倒政府，或打倒共產黨，李鵬，你爲什麼一定要開槍？你說！

想想三四十年代學運中的「王丹」和「吾爾開希」們，現在很多不都是人民政府之內的部長級、大使級的高官了嗎？包括韓叙大使——我倒希望你們高官大使之中，爲着保持青年期的正義感、愛國心，摔掉今日的烏紗帽，爲目前的王丹和吾爾開希等青年愛國者，主持點公道。

韓叙大使，Your Excellency，當年的學運領袖，不要再昧着良心，睜眼說瞎話，好不好？（編按：韓叙駐美大使最近已被撤換。）

「反貪污」「反特權」本是政府要做的事嘛。現在孩子們助威吶喊，不是更可增加政府對付惡勢力的聲勢嗎，有何不好呢？「要民主」「要自由」，你們諸公不懂，孩子們也不太懂嘛，爲什麼就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電視像機之前，「公開對話」呢？這些可愛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青年，唧唧喳喳的小麻雀、小把戲，既無無聲手槍，更無機槍坦克，爲什麼就不能和他們嘻嘻哈哈聊聊呢？

「宰相肚內能撐船」嘛。李鵬如稍具宰輔之材（像你義父周總理那樣），對上面那些好殺成性的昏

贖殘暴的老頭子應細加勸慰，防止流血；對下面善良的孩子們，應買些糖果、可樂，在天安門廣場和他「匹克匿克」一番，有什麼了不起呢？——我相信周恩來如仍健在人世，他會帶他老婆一道去的，自家的孩子嘛！「羽扇綸巾談笑裏」，爲什麼一定要搞個「檣櫓灰飛煙滅」呢？

孩子們如真不聽話——事實上這批青年大學生，搞學運是極有分寸的；他們底度量 and 學養，還不是中南海內那幾位昏庸的老八路，所能望其項背呢！——等而下之，孩子真是無理，那就多派幾位醫師在一旁協助，讓他們餓兩天，餓瘦了，北京市民也沒勁了，他們媽媽會找他們回去的。

真不得已出下策，非動武不可了，那就學學蔣介石、戴笠，動用點水龍電棒，把他們驅散。

有五千年文化、十億人民的泱泱大國，怎能調動三十萬大軍，在自己首都的中心廣場，光天化日之下，全世界四十萬萬人民電視之前，血腥屠殺自己的青年子弟！？

我們在電視機前痛哭流涕之時，我們真不知道我們祖國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幾位「極少數」
「一小撮」的當權派，是「人」還是「野獸」？

犯不着嘛！無此必要嘛！

學生砸小平的原因

現在人已殺過了。「動亂」也鎮壓了。香港人也嚇壞了。台灣同胞也不敢附和統一了。海外華人的向心力也全部揮發了。痛定思痛，北京政府、中國共產黨、鄧小平、李鵬……又收穫些什麼呢？

最大的收穫，對李鵬來說，是在國人皆曰滾蛋聲中，保持了「相位」。另一收穫便是鄧上皇出了口烏氣。

秦始皇有一次發脾氣了，怒謂我家大使唐睢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大使說，未聽過。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如何如何。

這次鄧上皇也發了個大脾氣，弄得「伏屍千百，血洗北京。」

但是用機槍坦克對付青年學生，算個什麼呢？鄧大人，雖勝不武嘛。以此面誇諸上將，實是對「人民解放軍」的最大諷刺啊！

鄧大人付了這麼大的代價，出的是一口什麼樣的烏氣呢？

鄧大人氣的是「用人不當」——他所一手提拔的胡耀邦、趙紫陽，都不聽他的話。鄧公吹斷鬚子之後，就要來個「北京大屠殺」了。

讀者賢達，和全國同胞知道嗎？我們現代化之所以遲遲不能實現，癥結便在這裏了——我國當政者自秦始皇開始到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都是金口御言的，他們的話是「句句發金光」、「一句頂一萬句」的。他們的屬下，都只許說「是」，做 Yes Man。你不同意，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你要「強辯」，那你就是「一小撮」、「極少數」、「反革命」，那他就要「槍斃」你了。

一個獨裁者說話，如果只許人說「是」，不許人說「否」。如此劣幣驅逐良幣，說是者驅逐說否者；則是者便逐漸變成「狗」了；說否的「人」就逐漸被排擠了，變成「反革命」了。

趙紫陽聽說已被打成「反革命」，可能要受腐刑，下蠶室了。趙氏原是小平之佞臣也。兩月前，上皇還以玉璽相傳，何以不越月便失寵若此？無他，他在政府危難之時，上皇盛怒之下，說了些不中聽的「人話」而已。爲了說「人話」而「忤旨」，而「下廷尉」「下蠶室」的例子，一部《資治通鑑》還數得完嗎？說「人話」就下蠶室，則剩下的就只是些「逢君之惡」的說「狗話」之人了。所以近來《紐約時報》連日報導中國高階層中的「權力鬥爭」，這都是毛子們的一知半解之言。中國高階層之下（如蔣下、毛下、鄧下）的政治鬥爭，往往都是「人狗之爭」——原不是「狗」的人，在那裏折騰久了，也就逐漸變成狗了。在那種政治環境裏，可能有「能臣」——唯功名利祿是圖的蘇秦、張儀。狗窠裏是不能容忍有爲有守之人的。王安石論孟嘗君說：「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不正是這話嗎？

所以鄧小平本人就不了解，他口口聲聲的「現代化」，事實上只是經濟上的「發財致富」；在政治上從他自己開始，則是個百分之百的「封建殘餘」。子曰：「不患不知人，患不己知也。」鄧公就想不通，爲什麼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就上不去的道理——他不知道「鄧小平」並不只是中南海中一位老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上到下，正不知有幾千百個「鄧小平」。在中南海中大權獨攬的鄧小平可能公忠體國，大公無私，但是那些千千萬萬的「鄧小瓶」，可就要利用特權搞「官倒」了——這也是我個人四月間在南京，親眼看到青年學生砸爛無數個「小瓶」的道理。這些卑之無甚高論的道理，中南海內聽慣「狗話」的老朽昏庸的居民哪裏知道？他們嗜殺成性，以爲再殺二十萬學生，便可天下大治！悲夫小平！悲夫祖國！

「有權而無知」

筆者寫了這許多，可說對他們老八路的批評已夠厲害的了。但是我對鄧氏本人的人性，倒沒有太大的低估。

第一，他只是千千萬萬「小瓶」中的一個「大瓶」；這是極權政治中的制度問題。他不知道這個制度與現代化是背道而馳的。因此「鄧小平變法」與「王安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卻等而下之。王安石還有膽量說：「天命不足信，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三條王氏格言，鄧氏只做到最要考慮的第二條。在全世界都在辱罵詛咒聲中，鄧氏還是悍然殺人，就誤把「人言不足畏」的教條僵化了。而法「毛澤東思想」之祖，就更不值一提了。因此他無法突破中共政權，迺至所有極權政治官僚大機器的框框。這種框框之突破是要經過長期社會經濟演變。我們為擺脫傳統宗法社會和農業經濟已奮鬥了一百多年，現在還在作慢性的演變。鄧小平和王安石一樣，是無法搞制度大躍進的。還是讓青年學生，配合時代科技慢慢來推動吧。在天安門廣場躺下的烈士們，你們的血沒有白流。

第二，鄧氏的知識和訓練也有他的限度。搞傳統政治不需要太多學問。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根據老世事老人情（文化傳統）便可馬虎應付。因此識字無多的村婦，根據傳統習慣來做皇太后、垂簾聽政，也可搞得有板有眼。可是搞「現代化」就不同了。現代化有其洋傳統，沒有現代知識，就要碰壁了。可是革命了一輩子而終於當國政的人，都是個性最强的，自以為是；強不知以為知。筆者

在另篇拙作裏批評蔣、毛、李（宗仁）三公說：「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足謀其政」，就註定他們失敗的下場了。現在看來，鄧公小平的歷史功業，也要概括在同一範疇之內了。

千家駒教授認為「無知而有權」（見千著《七十年的經驗》）是人民共和國內的政治病根。鄧小平殺人而自以為是，也只是「無知而有權」的另一個例子罷了。鐵鏡公主說得好，「不知者，不作罪，你要把海量放寬。」

鄧公有權而無智，我們寫歷史的人對他又如何下筆呢？

反革命都住在中南海

如今民主鬥士，死者死了。生者亦無法活下去——在極權政治之下，劃地可以為牢，他們抓人殺人，積四十年之經驗，「反革命分子」是躲不了的。「學聯」「工聯」的「頭頭」，必被全部誅鋤而後已。

但是「反革命分子」殺得完嗎？共產黨殺反革命殺了四十年，最後天安門廣場之上，一天便出現了一百萬。時代不同了，「新階段」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別人，正是「極少數」、「一小撮」，聚居於中南海皇宮之內的老頭子。所好的是不管人民醫藥如何進步，他們也活不到十年二十年了。

北京有位老教授告我：「秦始皇不死，陳勝、吳廣是起不來的。」

事實上，老毛如不死，這次天安門絕食，也是搞不起來的。更可逆料的是，再過十年，鄧公「龍馭上賓」之後，民主政治自會循序而來，天安門絕食，也就無此必要了。

有蔣中正父子之典例在，讀者不信就等着瞧瞧吧！

筆者是治比較史學的。熟讀中西典籍之餘，我曾盼望鄧公小平可以做「中國的華盛頓」，為苦難的中華民族開今後二百年之太平，因為翻遍中國近代史中的中國領袖們，只有鄧小平有此一機遇。

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時也。鄧子有其「時」而無其「才」。再加誤聽蘇張之徒，和雞鳴狗盜之士的讒言，始有如此「以小人終」的下場，夫復何言？

鄧小平和華盛頓

鄧小平和華盛頓有何相同之處呢？讀者如不憚煩，且聽老朽補綴數語。

整整兩百年前，華盛頓當國之初，美國政府也是一黨專政，貪污腐化，一場胡塗也。為快刀斬亂麻，為換取二十年和平安定，華公麾下的從龍之士，曾有黃袍加身、「勸進」之謀；希望華公作洪憲皇帝，登基為「美王喬治一世」。而華公畢竟是有歷史眼光的世界級政治家。他知道時代變了。美國革命已進入「新階段」。他要以「舊階段」的革命領袖，再來領導這個新階段。他知道稱王稱帝是做不得的，對勸進之臣的美意，堅絕以老病婉謝——其實華盛頓那時不過五十許人，樸方兄之儕輩也。

至於幹個「三權分立」的總統，華公就勉為其難了。可是做個「一黨專政」的總統，黨外雖無黨，黨內卻有派。華盛頓當政不暮年，他底大陸黨內就發生了趙紫陽、李鵬之爭——國務卿傑弗遜和財政部長漢密頓，為着國家經濟政策的方向問題，發生了你死我活的爭執。華公身居二人之上，私衷祖漢而抑

傑。傑弗遜乃憤而辭職，另組反對派，堅持自己政見，並監督政府內日益嚴重的貪污、腐化的行爲。

華盛頓對傑弗遜這一「反骨仔」竟以海量寬涵之，溫語撫慰之——至少沒有把這位早期的肱股打成反革命，逼他去向別國尋求政治庇護。自此華盛頓專政的一黨，就變成相互監督的「兩黨政治」以迄於今。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人類歷史上「民主政治」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貪污」、「腐化」、「特權」、「後門」、「紅包」……都不是大問題。根本問題是沒有制衡的「一黨專政」。沒有制衡，而有機槍坦克、數百萬大軍、四千萬黨員，那末「貪污」、「腐化」、「收紅包」、「玩女人」……好官我自爲之，那問題就嚴重了。

我要告訴小平：我公有數百萬軍隊，四千七百萬黨員，天是塌不下來了。但是他們也保護了「官倒爺」，和上上下下的大瓶、小瓶。官倒爺去不了，一黨專政之內的有效辦法，便是「七八年便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讓「紅衛兵小將」去「打倒牛鬼蛇神」了；「打倒劉鄧司令部」了；「打倒針插不進、水滲不透的北京市委」了。這樣一來鄧小平不就變成鄧澤西了；趙紫陽的兒子，不就變成趙樸方了。李鵬的夫人，不也就變成李葉羣了。

總之，鄧公小平有權而無智——他不懂經濟發展、市場經濟等等，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所在。其爲人也又剛愎自用；又被「狗頭軍師張」和蘇秦、張儀、基辛格……一類的縱橫家所誤導，乃有此結果。令人浩嘆。

回看華公盛頓當年史跡，吾人便知「無貪污腐化，就不會有兩黨制衡；微兩黨制衡，就阻止不了貪污腐化」。

告訴鄧大人，「三權分立」者，非「三個政府」也。「三權分立」者，「制衡」而已耳。斯大人所不知，始有「小人終」之後果也。

山雨已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馬克斯主義非不可信也。信馬克斯主義也要有相當學識。

馬氏之論，以「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之父。父死而子繼也。然馬公仙遊後的近百年史實，卻證明馬公把父子倒置。——非資本主義崩潰而生共產主義；史實證明為共產主義崩潰而生市場經濟之資本主義也。大陸之上諸多史家誤聽馬氏之言，竟以「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憶去冬海外哲人、史家曾有「夏威夷民主哲學會議」之盛舉。台海兩岸名流如嚴家其、龐樸、魏萼、熊玠諸子均與焉。筆者敬陪末座，曾力辯「辛亥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說之非。蓋「辛亥年間」（一九一二左右），中國並無「資產階級」，何來「民主革命」？

然衡諸近三十年來「中國資產階級」在台灣、新加坡、香港之迅速崛起；大陸於鄧小平變法開放之後之竭力猛進，吾知一個真正的「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會近在目前，我執簡史家將可及身而見之。然此一革命之方式為何？吾不敢謬論之也。

拙作以英語執筆曰，此一山雨欲來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如三百年前（一六八九）發生於英倫而未嘗流血之「光榮革命」乎？抑為兩百年前（一七八九），暴動於巴黎街頭之「法國大革命」乎？抑為同時期美洲資產階級擺脫英倫專制之「美國革命」乎？抑為一百年前（戊戌，一八九八）之「戊戌變法」乎。史家諱言將來，吾不敢妄論也。

孰知墨瀋未乾，此一「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竟以「法國大革命」形式而流血於「天安門廣場」之上！

此一革命正在開端，其歷史性質，豈中南海內封建反動、八十高齡的老貴族、老八路所能掌握耶？又豈是工程師李鵬所能體會耶！？

小把戲吾爾開希都知道他們「質素太差」，況翻爛中西典籍之老教書匠乎？停筆嗟嘆、良久不息。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

年會閉會之翌日，草於紐約市立大學亞洲學系。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六日號第一九六期

三訪大陸

離開祖國快四十年了。

記得一九四八年出國之時，祖國真是殘破不堪。政治吧，五子登科，貪污腐化，狐鼠橫行。社會呢，飢民遍野，瘡痍滿目，餓殍載道。生在那種環境裏，稍有血性的知青，也真是苦悶之極。那時他們能找出一綫自私的「解脫」之道，便是暫時麻木地脫離那個糜爛的現場，遠走高飛，出國留學去。就在這種環境和心情之下，筆者這個當時的「知青」，便僥倖地榜上有名，結了一筆平價外匯，溜到美國來了。八月十九日在紐約「下車伊始」，便看到一個磅秤。用了一個銅元，稱出我那六呎之軀，才整整一百一十二英磅（五〇、八〇二公斤），這便是我從祖國帶來底最大的本錢了。

抵美後未及一年，大陸便天翻地覆地「解放」了。作爲一個留美學生，面對這一「改朝換代」的局面，「立刻束裝歸國」呢？還是「稍待些時再說」呢？抉擇之間是很難自主的。一個學「資本主義歷史學」的青年，在一個「實行共產主義的祖國」是否派得上用場呢？爲此我需要一段時間來作點「誠實的自我檢討」和「冷靜的客觀分析」。這一檢討、這一分析，再加上五十年代中，不可抗拒底客觀環境的

演變，竟拖長至二十五年之久。在這二十五年之中，我對祖國和親人的懷念，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個人如果還是個「人」的話，那他二十五年中所流出的眼淚，總是應該以飯碗來量算的吧。

初訪祖國的觀感

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之後，我與久無信息的弟弟取得了聯繫，才知道八十老娘，還「活」在人間。我便向駐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寫了封懇切的信，希望能回國「探母」。批准了，我就於七二年底，自紐約經歐洲、越中東，從緬甸仰光，直飛上海。當那「法航」機師廣播「飛臨中國上空」時，我臨窗俯瞰，情難自持，乃躲入洗手間，擦去整條整條的熱淚。這不是我昂藏六呎、翻作「兒女子態」；這實是那時久別歸來的遊子，每個人的感受——我是屬於所謂第一批回國探親的「華裔留美學人」。

返國之前，我曾在美國參加過「保釣」、「民運」和「反越戰」，對祖國的期許，可能是太高了點。回國之初，沿途所見所聞——尤其是那大小都市和鐵路沿綫，破爛的情況與二十五年前，「五子登科」的年代，並沒有太大的差別，而一般人民之愁眉苦臉，則尤有過之。但是到處大小牆壁，都寫滿了「不稱霸」的標語。足跡踏遍全球的歸來遊子，不免心中暗想：「破爛落後到如此程度，向誰稱霸呢？」而隨處可見的「五百羅漢」式的毛澤東大塑像，看了尤其令人反胃。這是我初入國門的粗淺印象——頗為失望的粗淺印象。

但是我個人畢竟是政府的「政策」中，規定要接受「熱情招待」的「愛國華僑」或「美籍華人」。

到處都蒙祖國上下，熱情地招待着。就在這「熱情」之中，我也領略出熱情背後的陰沉氣氛，足以令人窒息至死的陰沉氣氛。整個的祖國，事實上是「陰霾密佈」的。在這種泰山壓頂、陰霾四佈的大氣籠罩之下的小個體，如何適應？如何生存？我也是不難體會的——這個很自然發生的體會過程，在現代社會學上，原叫做「宏觀法則」嘛。

我在安徽蕪湖和母親、弟妹住了三個星期，沒有單獨出過街。原先最愛我的姑媽，不敢來看我；和我同年紀的五叔的女兒，遵父命前來探視，但是和他們同住一城底我的弟妹居然不認識她，把她錯當成「階級敵人」給拒絕了。想看看兒時伙伴，或大中學「同班同學」，或上上慘死父親的孤墳，當然也就做不到了。

可是，我畢竟是受熱情招待的「貴賓」，在各地我被招待去看了三次《紅色娘子軍》。最後一次在北京，那是名演員杜近芳主演的。我坐在前排，真不忍對杜演員直視：我為這個天才橫溢，拿着個盒子砲的「青衣」，感到酸楚。

特殊階層的形成

最使我嘆息不止的，則是在首都人民體育館內去看過一場精彩絕倫的、「武漢雜技團」的表演。場裏擠得滿坑滿谷、水洩不通，可是場中正面，由欄杆圍起來的百十個「頭等」座位，卻只有三兩個青年男女坐在那兒。而在這圈圈內，一些身穿白制服，服侍他（她）們喝茶水、果汁、糖果、香烟的服務生

，倒有好幾位。我從我的「二等座」，問問我的鄰座觀眾，這些空着的座位，為何沒人坐？所得到的答覆是：「那是招待首長們的座位。」顯然首長們，早把土雜技看膩了，不來了，座位就空着了——使個人頭擠擠的偌大的「人民體育館」，看來像個掉了門牙的大嘴！無產階級祖國之內的「階級」是多麼鮮明啊！

叩別老母返美時，我的感想是複雜的，因為媽也曾為我介紹了一位來訪的「街坊主席」徐大媽。徐大媽在解放前，曾是帶着三個孩子拾荒討飯的乞丐。解放後翻身了。小兒子進了專科學校。兩個大兒子則在非洲修鐵路。國內工資照發，由徐大媽代領。兩個媳婦的工資也歸她管。她現在富富泰泰，衣履整潔，被「黨」派為「街坊主席」。

徐大媽告訴我：「我寫信告訴兩個在非洲的兒子說：毛主席叫你們二人在什麼地方『死』，你們就在什麼地方『死』！……」她和我談了個把小時，也抽完了我底整包的「中華牌」。

聽了徐大媽的故事我深為感動。我自己是在個落後底農村長大的。知道像徐大媽這類的貧農是上千上萬的。如果千千萬萬的貧苦農民，都有徐大媽「翻身」的經驗，則革命過程中，一切人等，所受的一切苦難，都是值得的。

作為一個現代史學工作者，我也知道「徐大媽式」的「翻身」解決不了落後農村的「根本問題」；但是它卻給予「共產革命」以應有的「意義」和「力量」。問題是「徐大媽」的隊伍，究有多大——就這樣我告訴了我的老婆孩子，告訴了我底美國朋友、學生和聽眾，有關我第一次訪問大陸的觀感。拿了

不少講演費；也吃了不少頓飯。

「傷痕」 彙彙 · 二訪大陸

在海外作一個窮教書匠，返國訪問的機會是不多的。正因回國次數太少，你才看出國內的變化之大。

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八一，由紐約市立大學派我去中國作「交換教授」。這時毛澤東已死去五年了。由餘震而產生的「凡是派」，也已不存在。我一跨入國門，首覺精神輕鬆的，是那「五百羅漢」不見了。走遍全國，一共只看兩尊哼哈二將。一座在北大，另一座在鄭州（在火車上看到的）。兩尊大佛如今已不是崇拜的偶像了——他站在那兒卻變成人們開玩笑的對象了。

「你看毛主席站在那裏幹嗎？」一位北大學生頑皮地問我。

「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嘛，」我說。

「才不是呢，」他笑着說；「他右手在向人招呼；左手拿了頂帽子，藏在背後。」四圍他底同學，哄然而笑。

「任牧童打破龍碑帽……」我默唸《桃花扇》上的一折好戲……想想爲時不過數年嘛！毛主席如何「虎落平陽」至此。我爲毛潤之先生感到悲哀。

一次我問一位中國教授對毛主席的看法。

「跟秦始皇一樣嘛，」他說，「你們歷史家，要爭辯一千年，也不能解決！」他又說，「至少毛底反面成就是了不起的。沒有他晚年胡搞一泡，鄧小平今天能搞『開放』嗎？鄧要放，恐怕黨也不放；黨要放，恐怕軍也不放，老同志更不放……甚至工人階級也不會放。」

據這位窮教書的話，老毛實在把所有的人，都「整」慘了，所以今天大家才一致要求開放——才知道開放的重要，誰也反對不了。這樣，老鄧才成了大英雄。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言之有理！」我向他翹翹姆指。

「你看！」他又得意地說，「蘇聯到現到在也『放』不了，還『僵』在那裏……」據他的看法，中國之不「僵」，毛主席「胡搞」之功也。

我二次訪問大陸，在十二所大學之內，前前後後教了數十班「美國史」，越時六閱月，掉了十五磅，相當辛苦，也相當快樂。按中國傳統，你教過誰的書，誰就得稱你「老師」，做你的「學生」。六個月中，大陸上有幾千個青年稱我「老師」；受寵若驚，他們也就變成我的最寵愛的「學生」了。那時他們來訪問我是沒晝沒夜的；我想看他們也是不分晝夜的。青年人的「口述史料」是最可靠的，他們不像黨棍官僚之裝模作樣。

我這幾千個「學生」，才是了解「人民中國」的第一手資料；我的「萬卷書、萬里路」。他們對我所說的是不厭其詳、直言無隱的。

在此同時，我所到之處，以前的老「老師」、老同學、老親、老友，乃至大批至今不識字，當年却

同穿開襠褲的老玩伴，都大批「出土」了。九年前「陰霾四佈」的氣氛，被喧嘩的談笑聲吹散了。

在這些老中青、上中下底嘻嘻哈哈（當然也有嘖嘖咕咕的）談笑聲裡，三十多年來，神秘不堪底「鏡花緣」裏的「共產中國」，全部揭幕了。雖然，大家所談的仍多偏於「傷痕」方面的。

涕淚交流說文革

中國民族性，本是最阿Q的；分明是生死邊緣、間不容髮的生機，例如跳樓、投井、剃鴛鴦頭、跪着看死屍、吃紅衛兵的「痰」、挖祖墳、臥玻璃……大家回憶起來，似乎都樂趣無窮。

當然也有身受其苦，說起來涕淚交流的。

一次我約一位老鄉親在北京飯店吃早餐，他第一次告訴我，我的堂弟德惠（我在「大排行」中是「老大」，德惠是「老三」），在鄉下當農民，在「三年大災害」中，全家餓死的詳情。我聞言，眼淚一滾便掉入稀飯裏去了。但是我抑住感情，還是把眼淚和稀飯，再吞回肚子裏去。

六個月當中，幾百萬言的「口述史料」，祇圍繞着一個主題，可概括為毛澤東治下的「傷痕」，大家樂天知命、無可奈何，但總以一吐為快——毛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搞出了史所未有的「暴政」來。人證物證俱在，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但是「傷痕」以外，「向前看」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看數千青年、數百故老，都說不出遠景來，話說多了，「文革」又出現了——「文革」的故事是說不完的，大家繞着他老人家兜圈。

「文革」這個好題目之外，大家——尤其是高知——所談不完的，則是經濟建設上的一些幼稚無知、荒唐絕頂的笑話。其笨笨大者莫如「寶鋼合約」的簽訂。一位深知內情、以正式的「大道消息」告訴我，我方無知受騙的經過，這故事是驚心動魄的。他說來好笑，我聽之嘆息。

試想十億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勒緊褲帶，擠出點血汗金錢，讓政府搞建設，而政府因為無知受騙，一虧便是幾個「庚子賠款」，怎不令人氣惱——這也顯示出「以外行領導內行」底所謂「毛澤東思想」，嚴重的後遺症。這也顯示出日本民族性之狹小與無恥。美國大企業界，是不會作如此無恥之行的。

「爲何不把合約撕掉，重行來過呢？」我問了一句十分外行的話。

「撕合約，按國際法要賠償對方百分之四十的損失！」他說。

「那怎麼辦呢」我問。

「只好硬着頭皮幹下去，希望損失不會到百分之四十！」

「那也是幾十億啊！」我說，「學費太貴了！」

「誰說不是?!」他嘆口長氣，我們相對黯然。

百萬投資且回籠

這次返國，曾有位富商朋友，想投資一百萬美元，幫助祖國建設，托我這位「回國講學」的「教授」，代爲做點「調查研究」，以便他「經濟報國」一下。朋友既然如此愛國，我也得加一個「秀才人情

」，來爲此事「調查研究」一番。寫篇博士論文。

從紐約、香港到北京、上海，我這個「研究助理」會認真地搜集材料，寫起「論文」來。一百萬美元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是一筆鉅款；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更是天文數字。但是經過各種管道課查，我發現一百萬美元，在偉大的祖國工商界，漏水的救火龍頭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珠——中國雖窮，但是浪費起來可「潤氣」呢！至少比我這百萬富翁的朋友，要潤氣幾十萬倍呢！

「我的朋友」百萬鉅款，得來不易，加以他生意也有週期，一時也週轉不靈，頭寸甚緊。把他這杯水拿來，倒入祖國漏水的龍頭，對祖國建設無補，對我說來，慷他人之慨，無補於實際，不但於心不忍，在道德上也是對不起朋友。論文繳上去，知道朋友臨時的困境，我也就沒有強人之所難了。百萬使者，雷聲大、雨點小；終成烏龍，非單行車道也。

六個月很快地過去了。在去國之前，我住在上海的錦江飯店，在一個風雨如晦的清晨，我覺得事有奇突，出旅舍的前門一看，對面牆上，赫然貼着「打倒鄧小平」的幾個大字。店內工作人員，見我這位「外國人」也見到了，頗感慌張而尷尬，因爲，這兒是「外國人住的」禁區，能在這裏貼「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則貼報人的身份可知也。所以工作同志們，在一些認得中國字的「外國人」面前，緊張得要死。

「搞改革，總歸有人要反對嘛，」我笑着告訴那位臉紅的同志，別弄得那麼緊張。「我是個「黑五類」，」我又笑一笑說，「我就反對土改，要打倒毛澤東、周恩來，打得倒嗎？」

「唐教授歡喜開玩笑，」他也苦笑一笑，但氣氛輕鬆多了。

我想還是老朋友的話有道理：「要不是老毛把所有的人，都整得那麼慘，鄧小平要開放，開放得了嗎……黨要放……老同志也不肯放……」

這位貼大字報的，分明就是不肯「放」的一位「老同志」啊！
反對得了嗎？

這便是我二訪大陸時，最後的一件扣人心絃的小插曲。

見微知者·三訪大陸

我第三次訪問大陸，是今年八月底的事，只訪了兩個禮拜。

這次是北京「政協全國委員會」，特別邀請參加「林則徐誕辰二百周年紀念會」去的。這時正值學校開學，是搞行政工作的最忙的時候，本已婉謝了，後來因為校中年輕的文學院院長願為我挑大樑，才又答應去的。事實上在中國搞學術研究，還是以「官邀」為宜，私人訪問有許多珍貴史料是見不到的。

我們此次應約同去的「歷史家」，美國方面有鄧嗣禹、何炳棣和我；加拿大有陳志讓；澳洲有王廣武——此外還有來自香港和歐洲的。因為他們未同行南下，也就未記下名字了。

在北京政協禮堂參加了紀念會，隨即在政協副秘書長孫軼青先生，和林文忠五世孫凌青大使（原駐聯合國）夫婦和林子東伉儷，嚮導之下一行八九人飛往福州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的故鄉，參

加林氏銅像揭幕典禮。禮畢又蒙政府招待去泉州和廈門訪問。並在廈門海邊用望遠鏡眺望，台灣那邊所說的「最前綫」：大擔、二擔和金門島。一九七〇年我也曾應台灣國府之約，去金門參觀，用望遠鏡遙看廈門。今又反其方向而觀之。真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從南北兩邊互望，我這位已無中華國籍的失根「華人」，真感慨萬千！

其實，這次返國參加這個隆重的學術會議，對我們這批所謂「海外學人」來說，學術倒是次要的。在這加緊「四化」——（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革命化）——建設底中興階段，回國看看建設成果，倒是我們主要的目的。我想這或許也是北京當軸，邀請我們主要的動機之一。

人民政府是否藉此而搞其「統戰」，那是他政府的事。吃人飯的人，是否「嘴軟」，那是吃飯的人，個人人格的問題。雙方各行其是可也。其實所謂「海外學人」底周遊列國、酬酢往還、大話連篇，哪一次是他自掏腰包的呢？如此，則頓頓飯都得軟嘴而食之，那還得了？！

我底第三次回國，為時不過兩週，從北京遠去華南，也未免大倉促了點，若說對當前中國有深入了解，那就不知輕重了。不過社會學上也有所謂「微觀法則」——凡事也可見微知著、從小看大、一葉知秋。

兩星期的旅行之中，我確實有着兩種感覺。第一是國內有點「昇平氣象」。這一氣象縱是國民政府黃金時代的「三十年代」也未嘗有過的人民安居樂業、不再唉聲嘆氣的現象。第二是一種政府裏有效率的「內行領導」的現象，政府中人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活」。顧頤和胡來，似乎是大幅減低了。

我七二年回國那種「陰霾四佈」的氣氛，不用說，完全沒有了。我八一年回國把「眼淚滴到稀飯裏」的「傷痕」也忘懷了。「鎮反」、「反右」、「躍進」、「四清」、「文革」、及「四人幫」、「凡是派」……都成了古代史。

傷痕的眼淚不必再流了。你的堂弟餓死了！鄧小平的兒子還不是打斷了脊骨。你向誰去報仇呢？冤死者已死了；作惡的人也死了——死後在陰曹裏上刀山、下油鍋。活的人還是跟老鄧一起搞，想想活的辦法吧。朋友！我們中國人多善良啊！善良成一羣樂天知命的阿Q。老鄧搞得不錯，大家就跟老鄧走。老鄧今日在國內的聲望好高啊！

向「錢」看下的昇平氣象

現在多數中國佬都有點美國佬氣味。商人、工農，爲着改善生活，大家一致向「錢」看。「錢」原是物資的「人大代表」。「向錢看」才不矯情、才不裝模作樣，才肯拚命。當今美國佬、日本佬、港台佬……乃至所有發展國家的「發展佬」，誰不如此？有什麼不對？

「向錢看」時，發而不中節，就要出「偏差」、出「紕漏」——像香港和美國的色情、暴力和販毒走私——但是你有個「集團」的政府，掌握了「統治機器」，是幹嗎用的呢？這「機器」只能讓老毛用來「修理」（恕我用個台灣名詞）好人？壞人也照樣可以「修理、修理」嘛！

美國的「黃色」、「暴力」、「吸毒」……等等搞得收不了場，就是它底「統治機器」修理不了壞

人的結果。「徒法不足以自行」，何況它底「英美法系」，在刑法方面，也已麻痺了，不中用了。

不信嗎？朋友，請到敵紐約來乘乘地鐵，「衣錦夜行」一番，然後活着回去，你就知道了。

我的朋友說：「俄國僵了！」

你能相信，「美國沒有僵！」

他哥兒倆，一個搞「集權專制」；一個搞「民主法制」，都「僵」了一大半。咱們中國處於「二僵之間」來摸索出路，應該搞出個「一不僵」，才是英雄；專摸人家屁股，算不得好漢！

我有一位對中國經濟建設專持悲觀態度的老朋友，他說中國經建，是「非變不可、小變無用、大變必亂、既亂必收、一收必死！」

我說，「約翰呀，我替你再加八個字：『死了也變、變久必通』！」

其實中國經建早已被毛澤東搞死了，鄧小平來收屍，便是在「死了也變、變久必通」的程序上，摸索前進。不但終有「通」之一日；現時已頗見「通」之微光了。

當前的「昇平氣象」中更可喜的一點，是大陸上的高知。他們倒真是向「前」看，而沒有向「錢」看。

海內外的中國高知，原是同一種動物。他們知道「搞錢」是一種「專業」。你如果已有一種專業（如搞歷史），再想兼個「搞錢專業」，就必然兩敗俱傷、一無是處。筆者本人就是想發財想了一輩子，可是却始終發不了財。年紀一大把，才思想搞通、悟出真理來——在算盤與筆桿之間，只能任擇其一。

享齊人之福，想一箭雙雕，是絕不可能的。想不到這個偉大的專利發明，在大陸全國向「錢」看的風氣中，竟有千千萬萬的「先知先覺」，安貧樂道，不為所動。不過他們比海外的同文幸運，不向「錢」看，而他們底仰事俯畜，生老病死諸問題，却由老鄧一肩挑過，可以安心工作；海外的假洋鬼子，自己充名士不打算盤，唱戲的列根，恕不負責也。

看看大陸上同文，向「前」看的樂觀態度，吾知吾族，下一世紀之必然站在世界學術之第一綫也。

「外行領導內行」不復見

兩週的「微觀」，我也相信，這個政府幹事甚為「內行」。「外行領導內行」的怪現象，似乎已被消滅了。

在微雨中、紅傘下，蹣跚慢步的福建省項南省長，乖乖！一看就是個「一言堂」——他是碩果僅存了。項氏在接見我們時與何炳棣談的很多，與鄧嗣禹和我則較少。但是在丁丁東東的建設聲中，在那個碩大的林則徐銅像之前，我倒覺得這位總督大人，頗有點像林則徐。他真能做個「若為國家生死以」的林文忠公，則「一言堂」，又何傷哉？！

我們的國共兩黨，七八十年來，利牙利齒，真是罵盡了滿清官吏的顛頂。可是我們學歷史的把百年人物從頭數，國共兩黨的高幹，有幾個比得上遜清末季曾、左、李、胡等「中興名臣」呢？美國朝野有許多事弄脫了軌的緣因，就是他們的「一言堂」太少了，沒人負責。我們又何必專守住那頂「民主」爛

頭巾，把「一言堂」罵得一無是處。綜合衆多大道、小道消息來臧否一下，項南在福建却是一個極得物望，知道他自己在幹什麼的第一等省長。

在廈門，我看到那位精明強幹底「上海寧波幫」的中年「特區市長」（已忘其名）。他底市區，大致比「新加坡共和國」「還是大一點」（他的話）。他那精打細算的本領，美國佬猶太想偷他一個銅元，恐怕是難乎其難了。在這位精明的上海佬身上，我看到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繳學費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李光耀能做到的事，我們這位廈門市長，沒有理由做不到。我爲中國在國際貿易學院畢業而感到慶幸。

似已踩出新路來

政府中人，最令我刮目相看的，則是上海機場「國際值勤室」的兩位後生。我和八十高齡的鄧嗣禹老教授，於八月十一日，在北京擠上那亂糟糟的「民航」。鄧老被誤劃入「吸煙艙」中座。他對煙有過敏症，年高小便也過時不候。鄧老爲此座位惶惶不能終日。我是他唯一的同路人，更爲他發慌。但全機滿載，無一空隙，如何是好？在上海機場「國際值勤室」我找到了那兩位二十二三歲的小把戲。他二人在「問題旅客」包圍圈中，真是手忙腳亂。但是他們終於紀錄了我「反映」去的問題，也解決了問題——鄧老被換入頭等艙，咳嗽小便問題同時解決。老鄧簡直高興得跳起來，並大呼「萬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世界馳名的「推、拖」作風，被這兩位二十來歲小伙計一下驅散了。老幹部們

一個個被飛到美國去「考察」一番，當他們在紐約地道車裏，發現自己並非星宿下凡時，回去「一刀切」過，也就無怨無尤了。在有效率的現代中國，老同志該靠邊站了。

路是人踩出來的——中國似乎已踩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來；雖然問題還是成筐成簍的。

講了大陸上一些好人好事（恕我又用台灣的名詞了），朋友們讀拙文，可能又要罵我吃人飯嘴軟了。可是我們這次在大陸，與何炳棣學長同吃同住兩星期。頓頓吃人家飯，何兄脾氣大，却頓頓要訓人。有一次他把一位小女服務生，訓得眼淚汪汪，不知犯了什麼法。我連忙跟着她跑進廚房去，安慰她一番，打個圓場，她才未哭出聲來。吃人飯嘴軟云乎哉？！

「惑」在哪裏？

——簡論中共政權四十年

今年十月是中共政權建立的四十週年。在中國傳統中的偉大朝代裏——如兩漢唐宋和明清——最初的四十年照例都有個大治或小康之局。國泰民安，以臻於鼎盛。可是我們歷史上最最近的這個紅色朝廷，成立也已四十年了。我們當代史家，如試一回首，真感心痛難忍。我們及身所見的這四十年裏，豈祇國不泰、民不安？從五十年代開始，由「人民政府」自己所發動的什麼三反五反、鎮反肅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到今日的天安門鎮暴殺人……把苛政猛於虎延長了四十年；冤死百姓數千萬。全國人民一窮二白，在極權暴政統治下，呻吟嗟嘆，道路以目。真是國史所未有，世界史所少見！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中共政權年四十而「惑」未止，其故安在哉？要把這個「惑」的問題搬出來詳談一番，那祇有寫部「廿七史」的大書，才能略窺梗概。筆者欲以數千言之短篇來探其原委，真是談何容易。然我輩生當其時，禍福身受。四十年而大「惑」不解，每個成熟的華裔男女，難免都有骨鯁在喉之粗見，試一吐之，也或可就正於同胞。

似是而非的立國理論

就四十餘年來管窺所得，愚深覺中共政權之基本大惑，實肇因於「似是而非的立國理論」。中共之立國理論爲其所篤信不疑的所謂有「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爲使馬列主義符合中國的特殊條件，乃演繹出「毛澤東思想」。因此中共近四十年來的經國治民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爲依歸；它也是十億人民的禍福之源。但是「毛澤東思想」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射人先射馬，我們應該摸清他的底子。

「毛澤東思想」這個名辭，是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前後，劉少奇一手吹捧出來，原曰「毛澤東主義」。毛氏自知其底子無啥「主義」之可言，乃婉卻「主義」一詞，改爲「思想」。「七大」通過的新黨章乃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列，成爲「中國」共產黨的新聖經，毛氏乃變成黨內半人半神的新耶穌。

劉氏當初搞「毛澤東個人崇拜」（少奇自己的話），目的祇是一種「黨內鬥爭」的工具，以其統一意志、集中力量，來對付七嘴八舌的王明等國際派；甚至強迫有見識、有力量的周恩來也閉起烏嘴——所以終毛公之世，祇有他本人可以出有理論性的「選集」；毛之外，也祇有劉少奇才以發表點有指導性的論文如《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和《論黨內鬥爭》等數篇而已。

毛澤東既然包辦了有四千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論，那末「毛選」中究有些什麼高論呢？對我們熟讀毛選、細窺毛行的中國近代史專業人員來說，《毛澤東思想》蓋可分爲三部門：一、詮釋馬列學說和唯物論的純學理著作；二、權一時之宜的有實用效驗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言論；

三、言教之外，一位開創新時代的「導師」級人物所應有的「身教」——例如胡適。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除掉了「言教」之外，便是他開創新時代，和確立「新道德」的「身教」。

且看毛公「純理論」的著作，有些什麼呢？他老人家活了八十多歲，一共祇寫過三篇談學理的著作。第一篇叫《辯證唯物主義論》（曾發表於一九四〇年的《民主》雜誌上。）這是一篇很膚淺的抄書之作。毛氏自知這種作品，在學術界，上不得檯盤，就沒有收入他底《選集》了。另外兩篇便是毛選第一卷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這兩篇毛氏頗為自豪的所謂「二論」，實在是毛澤東教授於抗戰初期，在延安「抗日大學」和「馬列學院」中授課的講稿。他用的教科書，顯然是艾思奇著的《大眾哲學》（一九三四《申報》讀書生活副刊初版，其後一共發行了三十二版），和艾譯《新哲學大綱》（一九三六年初版，三七年再版），尤其是後者。

《新哲學大綱》的老底子是俄文《蘇維埃百科全書》（似乎是第廿一版）的理論篇。這理論篇諸多理論如「否定之否定」等，其作者都是署有真實姓名的。不幸這些俄國作家後來均被斯大林所囚殺，上述百科全書乃被封禁（今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哥大哈佛等校圖書館，還可以找得到）。

但是該書在三十年代初期有日文譯本。艾思奇當時在日本留學，乃把這理論篇由日譯轉漢譯發行，就是這本《新哲學大綱》了。「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書禁鬆動，左翼書籍大量流入延安，它也就變成毛教授的教科書了。

艾思奇那時才二十來歲，是一位文筆流暢、思想新穎、才氣縱橫的小魯迅。他底通俗作品，在我們那時追趕時髦的左傾青少年羣中，真風靡一時。筆者不學在高中二三年級時即熟讀艾著；對「新哲學」竟能倒背如流。嗣後考入大學，接觸到毛著三論，也就不以為異。蓋覺毛姓「教授」，抄襲艾著「教科書」，原是天經地義的。敝沙坪壩大學內若斯之名教授，亦舉手可指，有什麼稀罕呢？可是後來於五十年代初期在海外讀大陸發行的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那就大驚失色了。——這種整段整段的抄自教科書的「講義」，怎能鵲巢鳩佔，剽竊發表為自己的「著作」呢？此事如發生在學術界，豈不騰笑四方，打爛飯碗？！

再者，「大盜劫人」，原可「不傷事主」嘛。毛公白話文甚為「清通」（他底老師胡適對他的評語），原可改頭換面一番嘛。何必生吞活剝呢？例如艾譯取自日譯，把許多有日本味的詞彙（如「感性」），都加以保留。毛抄艾譯時，抄者對原意不清，不敢以他底「清通」的白話文來剔除「日味」，乃一仍其舊，這也是毛選的美中不足罷。

更可駭異的則是，解放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革命之作的大量再版三版的發行，唯獨這解放前銷行至三十二版的《大眾哲學》和一版再版的艾著《新哲學大綱》，卻在市面絕跡，其故安在哉？

尤其可悲的，則是無知的國民黨特務們，把艾思奇趕到延安之後，他也祇好對自己的門人毛氏，俯首稱臣。解放後，艾思奇竟也追隨於郭沫若輩之後，做了「毛主席的小學生」，寫了些「學習《矛盾論》輔導報告」、「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一類的文章。「打掉牙齒和血吞」是何種滋味？

這位以五十六歲的中年便抑鬱而逝的艾思奇教授，泉下有知當能道其三昧。讀者不信，去問問他的遺孀遺孤，或也可略探艾子生前的心境。

吾友吾敵夏志清教授曰：「毛澤東本來沒有什麼『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別人『研究』出來的。」觀乎郭沫若、艾思奇諸「小學生」，研究毛澤東思想之過程，則夏氏之言，或亦有其部份之真理乎。

堅持這種思想，以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則欲朝政之不謬者幾希！

反動透頂的「不鬥行嗎？」

以上所述是毛公的純學理著作。有人或要問，政治思想原是衣鉢相傳。抄襲他人為自己宣揚，固有損私德，然與政治信仰，又何傷哉？

此語誠然。但問題在於抄襲之後，抄書者對這門學問，究竟有多大深度的了解，此一也。抄書抄出些自己「思想」之後，據此思想以打擊對手方（如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等），對對手方又有多少知己知彼的了解，此二也。以上兩點如祇形諸筆墨言語，動口不動手，亦無傷也。但如有軍閥官僚、獨裁黨魁，率百萬大軍、千萬黨徒，強不知以為知，硬性的來實行其主義和思想，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那就民無噍類矣。

今且看第一點。毛抄艾著之後，對唯物主義，辯證思想，究竟搞通了多少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一葉知秋，從他言論細處均可看出。文革之後，王若水先生靈感突發，想出了一篇《桌子的理論》來。

大意是說，造桌子的木材原是「物」，但是誰把這些「物」又拼成是個「桌子」呢？所以製造桌子的背後還有意志套於其間。

毛澤東驟聞此語，不禁茅塞頓開，大為讚許，認為若水有獨到之見。

天啦！這獨到之見，本是希臘哲學「唯心主義」的基本理論。他們認為宇宙之間，一切都是物，除掉物，便什麼都沒有（見毛著《實踐論》）。但是哪位仁兄把這些「物」整理得如此有條有理呢？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聖人認為把這些「物」搞得有條有理的是「天」，天有「天意」。已故的于斌主教說，不是天，是「上帝」，「上帝是最後之「因」」。古希臘的「唯心主義者」，則認為「物」之後，還有個「心」——「桌子」之後，還有個「意志」！

毛澤東這個「唯物主義者」，卻誇獎了王若水的唯心主義——毛公懂得些什麼唯物主義呢？——他連常識也沒有。搞抽象學理，毛澤東邊也未摸着，而他竟然是轉移時代的共產中國「偉大的導師」（這是毛氏自我肯定的頭銜），真是我們民族智慧的悲哀。

本來嘛，「自古帝王多無賴」，「劉（邦）項（羽）從來不讀書」。搞學問原是我輩書酸子的事，怎能厚責於毛澤東、鄧小平等英雄人物呢。但是英雄們如祇談點哲學文學，出版點御製詩詞，充充殼子、裝裝門面，則我輩書生，祇有捧場的份兒。可是你掌握了機槍坦克，實行起戈培爾主義，認為騙人騙久了，自己也可以相信起來，那我們就要筆之於書，揭揭底子了。因為以自己也不懂的牆上標語，來把億萬無辜老百姓，整得不見天日，家破人亡，那實在太殘酷、太無知了。

君不見，毛主席搞「階級矛盾」、「敵我矛盾」、「內部矛盾」乎？千萬顆人頭落地；夫妻相揭發，父子相告密，不都是他老人家抄書，抄了艾譯《矛盾論》結果乎？！

毛公名言：「有十億人民的大國，不鬥行嗎？」這就是「一言喪邦」的標準例句了。

「有十億人民的大國，爲什麼不鬥就不行呢？」我受盡苦難的十億親愛的同胞，和四千七百萬明智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現在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想了想了。我們「句句發金光」的偉大導師，抄書抄出了毛病，便是我們獨裁的執政黨四十年來的萬「惑」之源啊。

剛復自用的領導階層

再看看毛氏對他底國際敵人、階級敵人的文物制度又知道多少呢？近三百年來底現代化運動的基本要義，厥爲尊重「人權」。可嘆的是我們的毛主席，竟不知「人權」二字作何解。

一九六五年冬季文革初起時，毛氏曾有一段有關「人權」的講話。他說：

……「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祇能用西方的技術。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嗎？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見一九六九年八月大陸編印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頁六二四。）

上引《毛澤東思想萬歲》是大陸出版有關毛氏言行的內部資料，最有原始性的一部書。在毫無掩飾

的、真正的毛澤東語錄中，我們才能看到所謂《毛澤東思想》的眞面目。

「人權」者，原義爲「不可分割的個人權利」(inalienable civil rights)，自由平等、吃飯穿衣、討老婆、生孩子、信宗教……皆是也。嚴幾道大師爲求譯文之「信雅達」，乃翻之爲「天賦人權」。斯爲一般大學一年級，政治學教科書上，條析分明之常識，而毛主席竟忽略之，始有此無可原諒之錯誤。

最近鄧公小平接見某外國使節時，不也批評過英美政制的「三權分立」嗎？說三權分立是一種沒有效率的「三個政府」！

毛主席，鄧「班長」(小平自封)者，今日紅朝之「太祖」、「太宗」也。其對現代政治思想，隔閡若此，豈不令人驚嘆。

筆者點出上述兩端爲例，絕無意出毛鄧二公之「洋相」。蓋西方民主政治哲學之內涵，亦如馬克思學說之精義，對我輩東方人說來，全爲新奇之洋貨。毛鄧諸公日理萬機，哪有時間來談什麼「大學叢書」呢？或什麼「政治學ABC」呢？

可是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如果強不知以爲知，剛愎自用，搞他個不知己、不知彼的「敵我矛盾」，那就是昏君了。所以吃毛鄧二公那行飯的，都應學學唐太宗，搞個十八學士的智囊團；或者學學老美「人民總統」傑克遜，組織個廚房內閣，虛懷若谷，隨時諮詢一番，才不失爲明君賢相——當然蘇秦、張儀或基辛格者流，是不應該讓他們亂入廚房的。

老實說，中共開國領袖數十人，自己水平甚高，而又虛懷若谷之雅量的，祇有周恩來一人。不幸在

這個領導階層中，周公之外，多半都是無知而有權、剛復自用的草莽英雄。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卒使老周，長材莫展，和稀泥和了一輩子，豈國運也乎。

再者就以領袖人物的「身教」而言，能躬行之而不感愧作者，亦祇有周公等三二人而已。偉大導師晚年之好色、好權、殘酷、奸詐，無不達其巔峯，龍馭上賓之前，才深悟前非，而開始「羨慕周恩來」，然已悔之晚矣。

試觀近代世界各國興隆昌盛之史實，其開國領袖們之品德、學識，均是關鍵。二百年前老美開國時，人材之鼎盛，世豈有匹？！縱使向偏鋒發展的日本明治維新：其君明臣賢，亦極一時之盛。反觀我們紅朝開國之初，史家如秉筆直書，究有幾人風範能比得上「古大臣」，遑論今哲？這或許也是四十而惑未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兩個偏鋒一個極權

當然我們搞歷史的，對當朝領袖，也不應苛求。第一他們搞無產革命的，多半出身寒微，教育有限，而又身經百難，九死一生。啃馬列、讀杜威，通經致用，非若輩之長也。

第二，中國近代史原是一部自古代宗法社會，農業經濟，轉向全民政治、工業經濟的「轉移時代」的歷史。毛鄧二公，乃至華國鋒、楊尚昆如生於此「轉移時代」之前的「帝制時代」，他們都可作皇帝、作宰相而不失大體。因為積三千年之經驗，我國帝制規章，頗為完善。當政者，祇要顛預而按理出牌，

自然就可以「你辦事、我放心」了。

不幸的是他們都生在這個一日千變的「轉移時代」，老辦法行不通，沒有點新時代的知識，則國家大事，甚至家庭小事也就不大好辦了。更不幸的則是他們為尋找新制度，而走入馬列之途。馬列者何？曰，西方正統文明之偏鋒也。「偏鋒」是否可以打倒「正統」，吾人不知也。而況若輩之對偏鋒也並未能真正掌握，其情已為上述。

尤可嘆者則是由於篤信一西洋偏鋒，而對東方文明之正統，亦加以全盤否定。以孔孟學說為中心的東方文明，雖亦早已不合時宜，然究為三千年民族經驗之成果；全民文物制度、風俗習慣之所托。一旦加以全盤否定，則全國人民，便頓失安身立命之托。所以中共之膽大妄為實遠甚於五四時代之過激派。五四諸子祇是全盤否定自己的正統文明，卻全部肯定西方的文明正統——所謂「全盤西化」、所謂「科學民主」皆是也。而中共則一竿打翻兩條船，中西正統文明一併否定之。

中西正統文明既被全盤否定，剩下的便是百家俱廢、馬列獨崇了。馬列者，馬克思主義之哲學內涵；列寧主義之極權形式也。前段已言之，毛公對馬克斯主義之了解，竟幼稚到荒謬可笑的程度，所謂「畫虎不成」也。而更不幸卻是中共諸賢對列寧主義與其接班而來的斯大林主義之學習，卻後來居上，「青出於藍」。

「列寧主義」、「斯達林主義」又是些什麼東西呢？長話短說，二者是所謂「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中，「極權政治」(Totalitarianism)之最高形式也。它一旦傳入中華，毛主席接棒之後，

鶴鳳清於老鳳聲，《毛澤東思想》乃凌駕列斯二主義之上。毛公因此也成爲世界史上第一號大獨裁者。以毛公對中國十餘年的極權統治，下比希特勒、斯達林對德俄之獨裁，則希斯二魔祇配作袁紹父子，「豚犬而已」。

大陸上文化界一位倖存的「老運動員」——（這個名詞不需解釋吧）——告我說：「斯達林搞的祇是個『鐵幕』；毛澤東搞的則是個『鐵桶』！」從現代政治學學理上看，則俄德兩邦無非是兩個「警察國家」（police state）而已。君知否？一個沒有警察的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如毛公治下之中國者，才是「警察國家」之化境呢？這就是我們「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涵呢。也是毛公他老人家在人類統治學上空前的貢獻吧！

毛澤東是個聰明土包子

前已言之「毛澤東思想」之純學理部門，原是一部遮羞說謊書，不值一提。但是次一部門卻是一部有高度實用效驗，充份利用「黑貓白貓」哲學的經驗主義。毛選中有很多篇政治論文，如《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〇）、《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軍事論文，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和一些管制臭老九的論文如《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等等都是擲地有聲，有高度實用價值的活文件。它們摧枯拉朽之力，絕非當時他的對手方國民黨的一些冬烘理論家，滿口「文武周公」，所能抵制得了的。雖然毛的這些著

作也並無「原始性」(originality)——政治論文是出於原「第三國際」有關統戰的指示，主要內容是斯達林主義；軍事多半出諸紅軍大學校長劉伯承之手筆；文藝講話的藍本則取自蘇聯的布列漢諾夫(Georgy Valentinovich Plekhanov)，但是在這些方面毛氏畢竟能活學活用之。老實說，紅朝的天，便是毛氏這幾篇文章打下來的。這也就是今日鄧小平輩從龍之士，感恩戴德，口口聲聲，「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的內容所在。不過「打天下」的本事，終不能用之於「治天下」罷了。

可是話說回頭，毛澤東何以理論水平若是之低下，而實用水平又若是之高哉？無他，毛澤東是個聰明的土包子——拙於「洋」，而精於「土」也。因此毛澤東思想的背景除掉列寧、斯達林之外，他還有一羣土老師：申、韓、商鞅、秦始皇、李斯……皆是也。老實說，論極權之道，對異己恐嚇詐騙，對百姓劃地為牢；論「以愚黔首」；論「以吏(幹部、黨員)為師」；論馭民以「法」(王法、刑法)；主國政用「權」、用「勢」；論對付「臭老九」既「焚」且「坑」；則列寧、斯達林，那股掩耳盜鈴的娘娘腔，比起我國古代，光明正大，赤裸裸敢為的「法家」諸祖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呢！

毛澤東平生最服膺秦始皇。一再說「當年『焚』『坑』費商量」，什麼「千載猶行秦制度」。郭沫若罵秦的「十批不是好文章」。毛要替秦始皇平反，認為秦皇「略輸文采」，焚坑不夠徹底，因此他自己才大開殺戒，殺掉數千萬無辜，割掉所有臭老九的尾巴——終使列寧、斯達林、希特勒相形之下，都瞠乎後矣。

所以我們可以說，「毛澤東思想」者，雜揉「列寧主義」、「斯達林主義」、「法西斯主義」與中

國古「法家」於一爐而超越之也。

「法家」者何？中國正統文明邊緣之偏鋒也。毛澤東就是抓住了中西文明中的兩大偏鋒，打倒正統，製造出一個空前絕後的極權體制來——我國十億老百姓的禍福之源，應自此求之。

指列爲馬的政經失調

或者讀者們更要問：極權政治有如此強大之能力，幾乎無事不可爲。毛澤東搞「大躍進」時，便口聲聲自吹有「九千萬人上陣」！九千萬人上陣，何事不可爲乎？爲什麼搞了四十年，還是一窮二白，文盲兩億呢？這就牽涉到「現代化運動」中的「教育」與「經濟」兩大關鍵了。

二次大戰後之各國現代化運動的現實已充份證明，「政治極權」與「經濟發展」是絕對相尅的。政治愈集權，則竭澤而漁的國防工業可以一枝獨秀，而民生製造工業（civil manufacturing industry）就愈要滑波；相反的則是，國民經濟愈發達，則極權政治也就愈萎縮。

毛氏中國的現實則正是前者。經濟上不去，則教育即難普及。教育不普及，則經濟便永遠落後。雞與蛋或蛋與雞，無法分其先後也。

再者搞極權政治，亦「馬」「列」有別。馬克思博士認爲，歷史的前進，以「生產的社會關係」爲主導。簡言之，即勞資關係爲一切政治社會現象之基石。經濟發展是政治變化的原動力，「經」在「政」前也。

而列寧主義則反是。列寧主義是以「政治掛帥」為基本原理的。經濟之上下與社會之變遷，一切聽命於政治。簡言之，則「政」在「經」前也。我國歷史之發展，兩千年來照例也是政在經前的。此一傳統發軔於「法家」，後來搞「霸王道雜治」（漢宣帝告太子語），和搞「陽儒陰法」的歷朝君臣，也都相率奉為圭臬，未加變更。此即毛澤東所說的「千載猶行秦制度」也。筆者於另篇拙文「國家強於社會」中，曾詳析，茲不多贅。（編按：見本書另文）

依在下管見，近月「天安門大屠殺」，弄得一糟至此，即因中共「指列為馬」，「堅持」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和「政在經前」的中國法家老傳統相結合的必然後果。

中共搞了四十年的「政治掛帥」，鑄造了一個政在經前的黨天下，把國民經濟，搞得奄奄一息。毛死鄧繼之後，小平深知，經濟如不開放，則中共政權必死路一條。這本是鄧公卓識，戈爾巴喬夫，鄧之門人而已。但是在中蘇這兩個政治死卡住經濟的極權制度之下，政治如不率先開放，則經濟便無法跟進。可是政治如果也開放——「開放」一辭，在中南海居民的術語中，叫做「退」——政治如果「退」，在這些老貴族看來，那就要動搖紅色政權的國本、黨本，尤其是諸位養尊處優的老黨民，七十載革命的老本。所以他們決不能「一退」、「再退」。他們寧願殺二十萬學生來穩定陣腳，絕不後「退」。

鄧小平乃葉公好龍之葉公

因此堪憐堪懼的鄧小平，在此進退維谷的情況之下，就變毛澤東所說的歷史故事「葉公好龍」中的

葉老頭了。葉公好龍，一旦真把龍引來了，老頭可被嚇得半死。鄧公好「開放」，一旦胡耀邦、趙紫陽真把「開放」引來了，老鄧也嚇得半死。所以鄧之絕胡驅趙，非小平個性狠辣如毛，反覆無常也。他祇是個「好龍」的葉老頭罷了。

但是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仁兄，何以好龍而又敢豢養之也？無他，戈氏已是「布爾什維克」第四五代的小律師，他沒有第一代布爾什維克之患得患失也。戈氏週遭的老布爾什維克，都早已蒙主恩召，沒有「老同志」在耳邊嘩啦啦嘩啦啦也。——胡、趙兩氏受制於老輩，便無戈氏之自由矣。

鄧小平自稱為中共第二梯隊的「班長」，是他老人家在「裝小」也——其實他和中南海裏那些鐵拐李、呂洞賓、陳雲、楊尚昆……都是老八路、紅朝第一代開國元勳。那一代的長征幹部、一老八怎能和法科學堂出身的戈大律師相比呢？

其實今日中共黨內的「八老」，其矛盾心理，實頗似國民黨當年的元老集團的「西山會議派」中諸老人。西山元老當時搞的是反共聯俄。反共是為着「黨的利益」，聯俄也是為着「黨的利益」。他們知道，不聯俄，則國民黨更永無出路。但是聯俄又怎能反共呢？

中共今日的中南海元老，則要殺盡民主開放人士，而繼續其開放政策。在政治主宰經濟的紅朝裏，政治不開放，經濟又何能開放呢？這就是他們這個絕對制度的絕對死結啊。

不過諸元老既然承認，龍為中國革命之必需，他們的黨要為龍之出現而努力，則龍遲早還是要回來的。但是龍如回來了，不是要把「好龍」的葉老頭嚇死了嗎？

朋友！本來是「人死病斷根」嘛。中南海諸元老如果被龍嚇死了，馭龍上賓，則一切根本問題，不就徹底解決了嗎？

弔者大悅的喜劇遠景

所以今後中國問題之真解決，其原理原則和方法，早經國共兩黨和全國上下，一致同意矣。——卑之無甚高論，曰「開放」而已矣。開放發端於八十高齡之老祖父鄧公小平，而其開花結果的燦爛光華之遠景，則有待於芳齡才二十一二，寧馨孫兒輩之王丹、柴玲、吾爾開希也。孫兒輩成就之早晚，則又有賴於祖父輩之健康狀態而定。中南海中之八位老祖——尤其是鄧鐵拐——如煉得一身內丹功、外丹功、潛水功，老而不死，孫兒輩則多待些時。老祖父們如支持不了，一一躺入水晶棺內，則孫兒勢必鼓掌大樂，開放有望矣。

憶五十年代之初，余有一 wasp 老友晏頓君者，追求一華裔美女，真如痴如狂，致使此美女上下公車均要有校警護送。晏頓亦因美人未入沙陀利而終日愁眉不展。一日渠忽喜氣洋洋前來向我報信。

「有何好消息？」我悄悄問他。

「有極好消息呀！」他春風滿面地，抱住我兩肩說，「我的老祖父死掉了。」說話間，他這個「屍親」和我這個「弔者」，不覺相抱大樂。

原來晏頓是托州一億萬富翁油商之獨孫。極受祖父寵愛。然而老翁卻是個封建守舊而獨裁專制的種

族主義者。他生前說明，愛孫如討一華女爲妻，則其遺囑上之億萬噸原油，孫兒休想分到半桶！

如今這個老頑固終於死了，宜乎其孫兒抖擻，而弔者大悅也。

如今柴玲、王丹、吾爾開希諸孫兒，於牢內牢外，都在等待油商老祖父之噩耗。海外一些大眾傳播媒體，爲同情晏頓孫兒輩之愛情，也在求神拜佛，幫着咒那老祖父早日歸天。國內大眾媒體，則一再闢謠，報導老祖父健康長壽，還在游泳、還在游泳……爲天安門大屠殺的新聞戰，寫下了最輕鬆活潑的一頁。然孫輩等不及也得等，正如祖輩老不死也得死——屍親和弔者，相擁大悅，總歸有那麼一日，而且不會太遠嘛。——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喜劇和滑稽劇，也是一台悲劇啊！

有人或要問。鄧老携八老歸天之後，孫兒輩就可分得托州油田了嗎？未必也！君不見其接班江澤民與李鵬乎？江李亦非省油燈也。而況他們還是有數百萬大軍、四千萬黨員、和八億農民也。七嘴八舌的幾個「民運人士」，有個屁用。

此語誠然。預測歷史發展，馬克思孫中山所不能，何況我輩？我們祇覺得，八老物故後，孫子可能分不到油田；而李鵬、江澤民那人參貂皮烏拉草也不一定靠得住。

第一，大軍數百萬，恐怕祇有小平一人可全盤駕馭。這是我民族道德中，忠孝節義，劉關張趙的古老的落伍傳統，而今世何世哉？君不見，「八三四一」多麼忠於毛主席，而主席歸天之後，抓主席娘子的不正是他們嗎？兵猶火也。玩火的人，哪能絕對保險火向哪個方向燒？封建愚忠之外，總還有點是非屈直和歷史潮流的影響嗎？中國軍人真的就永遠落後嗎？

四千七百萬黨員乎？鄧李揚今日所持以耀武揚威者槍桿也。如丟下槍桿，他們在中共黨內也早已是「布什維克」了，何況將來？

八億農民將為「後鄧時代」，江、李的忠實農奴和「倚靠階級」哉？曰，非也。在今世先進國家已步入「後工業化階段」（Post Industrial Era，如今日之日本），和「服務工業時代」（The Age of Service Industry，如八十年代之美國）。社會變動之原動力，已自農村移往都市。農民運動早已被「中立化」（neutralized）了。農民意識（rural mentality）也早已隨市民意識（urban mentality）之轉移而轉移。八億農民在社會變革上之作用，已遠不如八千萬市民矣。謂余不信，且看「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中共吭過一聲氣沒有？「農民善良」沒有「揭竿起義」，此為毛主席所一再嘉許者。再看天安門「暴亂」祇一百萬多人上了街，鄧公八老和李宰相已認為末日已至、大禍臨頭矣。然乎？否乎？

鄧老等老八路均是搞「農民運動」起家的，以為貧下中農永遠是他們的「倚靠階級」，其實大謬不然也——這也就是老領導不能領導新階級的基本原因吧。法家的教條是「時變而法不變者亂」。其實時變而頭腦不變；以進為退，以退為進，在任何社會哲學宗派裏，都是死路一條啊！

寫歷史的人祇寫過去，不談將來。但是他們可以看到歷史發展，一瀉千里的浪潮。靠幾個昏庸老人，就想把這個長江上洪峯抵住；吾知其螳臂擋車也。

一九八九，中秋，於北美洲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及十六日號，第二〇一及二〇二期

民權初步！

讀《胡耀邦訪問記》的感想

記得幼年時候（古文觀止），有一篇至今還可背誦的、生動的故事，叫「顏觸說齊王」。它底開頭一段，原文如下：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前為慕勢，不如王前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如何、如何）」

自我「阿Q」的好文章

試把這篇「古漢語」譯成今漢語，這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齊國的國王一次接見一個知識分子顏觸。國王說：「顏觸，走近點！」顏觸也說：「王爺，您走近點。」國王聽了，頗不高興。那些接待單位的陪同人員乃說：「國王是統治者！你顏某是被統

上述這個故事，縱使有幾分真實性，那末齊宣王以後兩千多年以來，在二十五史之上，也未再發生過了。有之，則是統治者恩准的「陛見」；或者是儒生替統治者出「統治」主意的「對策」；而「對策」的儒生，最得意的就是所謂「承旨」——迎合統治者的意志；這樣便可以青雲直上、封侯拜相了。否則說錯了話，則往往自招滅門之禍——這一來皇帝大人就被徹底地孤立了。

這一「固有文化」傳統，到了「民國時期」，被弄得變本加厲。因為「專制時期」，還有些所謂「言官」「清議」，起起哄。民國以後就一切都沒有了。專制時代士子上進，還有所謂「三考出身」！到國共兩朝，就祇剩個「入黨做官」了。因此「承旨」的風氣，乃更不可收拾。

據說當年蔣委員長有要事，要向政學系首領楊永泰諮詢時，楊總預備了四個不同的「條陳」，裝在中山服的四個口袋裏。他可從上司的口氣裏，決定自哪個口袋裏取貨。而另一位大官則不懂固有文化，一次膽敢和老闆爭辯起來，不幸他又不諳「寧波官話」，老闆罵一聲「強辯」，他却誤聽為「槍斃」，而雙膝跪下了。「強辯」既可「槍斃」，則統治者也就自我孤立了。

據深知蔣、毛二公個性的「兩朝領袖」們說，對蔣你還可「槍斃」一下；對毛的金口玉言，你是絕對頂撞不得的。這樣一來，一九七六「四·五運動」時，天安門前究竟死了多少人，毛主席反要去問一問國外來訪的貴賓了。

在這方面，憑天理良心，國民黨這位「難兄」，比他共產黨那位「難弟」，還稍勝一籌。重慶時代《大公報》，在小罵大幫忙之外，多少還可寫寫「看重慶、念中原」，為餓死的飢民伸伸冤。偉大的「

毛澤東時代」，連這點也沒有了——「黨的政策」是碰不得的。祇許擁護，不許批評。這一來「大躍進」、「大革命」，就祇剩下歌功頌德之份了。

鄧、胡、趙這羣羅馬「後三雄」，實在是「命大」——不然也早在「坐飛機」（按：「坐飛機」乃文革時的一種體罰）時摔死了。不親自「坐飛機」，三公如何能領略盧梭名言：「暴君之下，人人平等！」

胡、陸之會是民權初步

此次胡、陸之會，兩尊「大砲」齊發，聲震寰宇。關於萬言長論，則四大護法、十大統一，論者多矣，奚待老僧饒舌。但是作為一個熟讀中國史書的教員，吾不能不攬卷稱慶——這是個民權的初步，民主的開始！杜威、胡適不言乎？「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胡陸之會，便是這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起步。這種「方式」，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專制歷史中，哪裏有過這回事呢？

胡耀邦何人？！別的官銜不談，他底政治權力和地位，總比「齊宣王」那位山東「省委書記」要大得多吧。

陸鏗何人？他曾是KMT黨報的老編；在新朝坐牢二十二年的階下囚。現在呢？食無魚，出無車；採訪、編輯、送報、跑腿、掃地、抹桌……一脚踢底「克難報人」（恕我借用「經國先生」的新名詞）；一位百分之百的人窮志不窮的「寒士」。他居然也大叫「王前」，和當今操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殺大

權的統治者，分庭抗禮，平起平坐。咿唔終宵，作「宣室之談」——祇論蒼生，不問鬼神！這是中國二千年統治史上所未嘗有過的事！

試想三十年前，陸老如不在牢中，而老胡的前任，也有老胡的大嘴巴和雅量，爽朗開明，亦若老胡，也能和老陸來個通宵的「宣室之談」，則大躍進和大革命，豈不會少死幾百萬人！這豈祇是生民之福？劉主席或許可免於「叛徒、內奸、工賊」之嫌；彭元帥可能也不會離婚；賀老總也不會喝小便；無辜的鄧樸方，也不會在輪椅上，度其有為的一生。時來太晚，夫復何言？！雖晚，究比一仍舊貫佳甚。

走筆至此，我並不是說二人的會「談」，是白璧無瑕的。二人一問一答的急就章，有的也是未經過「調查研究」的。就以《人民日報》這座「名山大川」來說吧。它擁有一千九百名僱員，真就太多了嗎？

紐約市僅擁有兩萬讀者的僑報，不是也擁有僱員一百七十餘人嗎？兩兩相較，則日出六百萬份以上，日收「讀者投書」高達四五千封的《人民日報》，比一家小僑報多出十倍，就數據來看，似乎還稍嫌委屈了些！

好在胡、陸二公都祇是在放砲，放過就算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名山大川」之言，如出於胡公的前任，那可憐的《人民日報》，就要變成紐約的「金洋銀行」了。（編按：金洋銀行為華人在美國開設的大銀行，被美國財政部錢幣司以負債大於資產、沒有能力還債的理由，驟行關閉。）

話可隨便講，事要認真做，這原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中重要的一面啊！

一九八五·七·二·匆草·紐約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號第一〇〇〇期

為國共兩黨臉紅

——讀「中英協議」感慨萬千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們在報紙上和電視上看到，「中英協議」在北京簽字了。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雙方所簽的也是個不平凡的——甚至是個劃時代的文件。看後感慨萬千！

英帝的甘棠之思

英國是現代世界史中，最大和最老牌的帝國主義。三百年來它為着最自私和最不要臉的「大英帝國的利益」，用他底「堅船利砲」，幾乎統治了半個世界。它對殖民地的宰割，真正是販毒走私，砲轟槍打，茹毛飲血，無所不用其極。它在咱們中國領土上，騎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稱「皇家」、做「統治者」，做「血腥的帝國主義」，做了一百多年了。現在撈夠了，也不能再撈下去，要捲舖蓋回國了。誰知消息一出，殖民地中五百萬「臣民」(Subjects)——尤其是「高知」，簡直如喪考妣。大家牽衣頓足，攀轅攔路；真情流露，淚眼相看，無語咽噎——好一幕「海瑞罷官」，包龍圖去職的「甘棠遺愛」底感人鏡頭。

朋友！你如是高鼻藍眼的「英帝」，你面對這一幅「牽衣惜別圖」，能不感到驕傲嗎？！

再反過來看，如今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如果也對台灣老百姓來宣佈一下說，一九九七年本黨就要撤回大陸，和全島同胞「拜拜」了。這一天大喜訊，全島同胞，要不爆竹連天、夾道歡送、如釋重負才怪呢！

爲國共兩黨臉紅

事情如發生在大陸，那就更不得了。胡耀邦總書記今日如宣佈，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要於一九九七年撤離中國大陸、退保西伯利亞。這消息一出，想想看，那真是十億人民，歡聲雷動，鑼鼓喧天呢！什麼跳樓、自殺，什麼「政治庇護」，自此以後，都可一概豁免！

朋友！這是我這位躲在番邦，享有「無恐懼自由」的老華裔，故意來戳我們兩大執政黨的整腳嗎？想想在下的妄語，是否也有若干真理，存乎其間？

一次農村知識分子孔二先生打泰山邊上經過，他看到一位老婦人在一座新墳之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傷心的不得了。二先生心有不忍，乃招呼學生子路去一問情由。那老婦人說我一家三代——公公、丈夫、兒子都被老虎吃了，怎能不傷心呢？子路說，這真奇怪了，你們爲什麼不搬家而偏要守在這裏，等着老虎來吃你呢！那老婦人哭訴着說，此地好呀；此地沒有黨棍官僚所亂搞的「壞政府」（苛政）呢！

子路回報了老師，孔子喟然嘆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問題就在這裏了。我五百萬香港同胞，何所愛於英帝——那一條通吃我三代的大老虎！殊不知那兩個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執政大黨，對它們統治下的芸芸人民，比老虎還要厲害！想想英帝的甘棠遺愛，我們能不為國、共兩黨臉紅？！

一篇協議·三項心願

記得中英談判之初，戴卓爾夫人 (Mrs. Thatcher) 恃其雌虎餘威，似曾有「非份之想」——（延長九龍、新界租約？）——但是自從被鄧張飛，長坂坡、一聲吼，嚇得摔了一跤之後，乖得多了，所以這「協議」今日才能順利簽字。兩年前我們的猛張飛當着鐵娘子的面，對翻譯說：「告訴這個婆娘，如果兩年還談不成，我們就要單獨宣佈自己的方案了。」

筆者此次細玩「協議」全文，便深覺其內容是老鄧一手包辦，口授 (Dictated) 條文，要英方參加簽約儀式的。大英帝國外交家不是「湖南騾子」或講江湖義氣的「竹聯幫好漢」。他們是拿破崙口中的「小店東」。只要有利可圖，他們是江湖上第一等能「亢」，也能「卑」的小人。

我們對戴卓爾娘子之參加「簽約儀式」，毫不奇怪。因為她心中有分寸：我們的鄧翼德要「收回香港」，只需要花三塊人民幣，打一記長途電話就解決了；而老鄧竟然不打電話，却要她簽「協議」，而在這份「協議」之內，又把「大英帝國的利益」維護得無微不至。這樣簽個字又何樂不為呢！

使我們感歎的則是；共產黨人惡言惡語的罵他們「帝國主義」罵了六十多年。如今到頭來又要做帝國主義的孝子賢孫。真是老共、老共，你這個銀樣蠟槍頭的傢伙，何前倨而後恭也？

可是我們學歷史的在這兒也不能不替老鄧說點公道話。鄧龍圖老成謀國，他不能像他前任老毛那樣兒戲國事，鬧意氣、逞強鬥嘴——（老毛那樁「批錯一人、增加三億」的人口政策，便是鬧意氣，鬥嘴的結果。）——爲着國計民生，鄧老闆只好一面強調民族大義，一面做到委曲求全。求全之道蓋有三端。

第一、老鄧要把這隻生金蛋的肥鵝香港，小心翼翼地養得更肥更胖，繼續下蛋。

第二、老鄧自知餘日無多。一旦蒙主恩召，毛前任的宮廷之變，不可再有。他不但要搞出個接班制度來，昭示後人，還要借此讓經國以後的台灣，能夠認同歸隊。

第三、老鄧也知道他底貴黨，積重難返。打土豪、鬥地主、抓右派則有餘；搞企業、搞外貿、搞四化則不足。實踐檢驗真理，他要老英在香港爲他開辦個「五七幹校」，以適應新時代和新形勢。

這個一石數鳥，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的「百年大計」，才使我們鄧老板忍氣吞聲地，來受那洋女人的胯下之氣，是耶？非耶？

兩桶油漆，一把刷子

因此如照鄧老板的如意算盤打下去，則九七以後，只要兩桶油漆，一把刷子，就可做到諸事大吉。

兩桶油漆爲何？用一桶黃漆，把九七以後的總督面孔塗黃；另一桶紅漆，把總督府上的旗子染紅，如此而已。既然有了個資本主義的「中國香港」來領隊，又何愁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中國台灣」來認同「歸隊」。有台灣向香港認同，則國內其他「特區」，乃至早已實行資本主義的廣大農村，自然更會向香港看齊，靠攏。如此一來，噫嘻乎！實踐檢驗真理，一國兩制，如發出當年張季鸞所倡導的「向心力」來，兩制合而爲一，截長補短，搞出個雜種「中間制」來，廿一世紀不就是「中國世紀」乎哉？！

筆者雖非老和尚，沒有「他心通」的道行，但衡情度理，我深信這便是老鄧並未守太多秘密的腹案。作爲一個流落番邦的炎黃子孫，我倒希望我們鄧老闆真能變成喬治鄧，爲今後中華合衆國，開二百年之太平，也好讓老美將來到中國來請求點政治庇護；我們不接受，他們要跳樓、要自殺，也悉聽尊便。

鄧氏形式邏輯

鄧公是個智者。他這套腹案，的確是合情合法，言之成理的。問題是「文章不與政事同」，「知難行亦不易」。

自古以來，搞形式邏輯的政治哲學家，能夠如願以償的，幾乎絕無僅有。民國初年的「國父孫中山」不也有一套「軍政、訓政、憲政」的形式邏輯嗎？據他老人家估計，他底每一「政」最多只要五年，就可完功。三五一十五，十五年之後，則天下大治矣。

當今鄧國叔似乎比當年孫國父更有耐性。他要先等十二年好收回香港；收回香港後耐心搞個「五十

年不變」或「五十年後才變」。鄧公能替六十年後的「中國之命運」安排一下，也真是氣魄雄偉、目光遠大，態度樂觀了。

可是我們這些躲在海外的「胡適的學生」，却難忘師訓：「不疑處有疑！」雖然我們對老鄧的爲人和當國則「有疑處不疑！」因爲我們回看過去七十年的中國史，可憐的中國人民何嘗有過「十年不變」底和平歲月呢？現在一吹就「五十年不變！」小民何能心安？！

且讓我們回頭來看看辛亥（一九一一）以後的中國史實。

第一個十年 軍閥混戰。

二十年代 中共建黨。國共合作又分家，人頭滾滾！

三十年代 國民黨「圍剿」；共產黨「長征」；日本鬼「進出支那」。

四十年代 兩黨既外戰又內戰，直到國民黨棄甲曳兵，逃往台灣。

五十年代 毛主席當家。大鎮反、大鳴放、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萬。

六十年代 劉主席當家，毛主席反水；文化大革命，劉主席失蹤。

七十年代 林副統帥造反無理，身死家亡。四人幫鬥倒鄧小平；華國鋒活捉四人幫；鄧小平罷黜

凡是派。

八十年代 鄧副主席當家了。自此以後國泰民安，一帆風順，「五十年不變」……大吉大利？！

翻翻上列「十年一變」的中國史流水賬，賢明的讀者，開明的黨人，你會相信那最後一條「預測的

「內容不會改寫嗎？我們叩頭燒香，歷史發生奇跡，但願它如此！」

香港知識分子的邏輯責任

不過話說回頭，老鄧對香港是煞費苦心的。他顯然知道他貴黨的前科。為免中共幹部插足香港，所以搞個「國際條約」來加以約束。可惜的是英帝的約束能力遠不如美帝罷了。

可是老鄧却也搞出個「歷史奇跡」來——他不倚靠他自己的「幹部」，而把治理香港的重任，放給「黨外」（台灣名詞）或「非黨」（大陸名詞）人士——那些有發展「第三勢力」可能性的香港知識分子。這一點縱是國民黨的開明派都不易做到，而老鄧為之，可見他實在想做好；想造出個「奇跡」來。

現在香港人心大定，股票上昇，地產回漲，「高知」也大樂。但是我們却擔心香港的知識分子們，能否負荷起這個「天降大任」，來搞個「香港模式」。國共兩黨也是知識分子的組合啊！「中國知識分子」是世界上最難合作的動物。他們在「黨內」搞不好，搬到「黨外」就有奇跡出現？！吾不知也！吾憂心忡忡也！

八四·十二·廿六·於北美洲

迎鄧，慰蔣，勸台獨

鄧小平先生此次訪美，凡我居美華人，不論男女老幼、工農商學；不論任何信仰；甚至親共也好、反共也好，都應同感驕傲！

鄧氏此來，一非乞憐大國，二非投靠異邦。他是當今世界三大超級強權之一的實際負責人，應友邦元首之約，為兩國利益、世界和平，不遠千里而來，作國際間重要磋商。他在國際政壇上今日是一言九鼎，舉足輕重；咳唾之間，全球矚目！反觀近百年來，我國外交官員訪美，那種俯仰依人，面覷心酸的往事，今日鄧公一來總算揚眉吐氣，一洗百年屈辱。凡稍有血性的中華兒女，目睹此情此景，怎能無動於衷？！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過去三十年的祖國，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之下，部份海外僑民與人民政府之間，還存在着極深的隔膜——尤其是過去十年「四人幫」橫行之時，全國人民普遭迫害，僑眷受禍尤烈；有的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因而一想起國內暴政，真恨不得與日偕亡！

但是我們今日試想，僑眷親友所受的虐待，比之鄧小平先生本人兩起兩伏，性命旦夕難保，弟兄遭

難，子女傷殘的情況，和一般平民所遭遇的也並無兩樣。那時他們共產黨高級領袖們在普受迫害之下，其「與日偕亡」之心，又何嘗小於海外的「反共華僑」？本來國有暴政，一部份也是三千年專制餘毒之所致。九億同胞，皆匹夫有責，實未可專責於國共兩黨。

而鄧公於國族殆危之際，屹立於驚濤駭浪之中，爲國爲民，置生死於度外。那種政治家的卓識、擔當和勇氣，吾人隔海遙觀，再翻讀中華三千年史籍，真不禁舉手加額，深嘆我漢男兒，尚有斯人！以我輩小民，托庇番邦，整日空喊自由民主之酸勁，比之鄧先生白刃加頸，義無反顧，爲解民倒懸而赴湯火之精神，能毋自慚形穢？

然「四人幫」一旦服法，鄧氏在舉國歸心之下，不居功、不報復；謙沖爲政、老成謀國，以耄耋之年，而旰食宵衣，不綦年便國泰民安，歡騰一片。我們能有這樣一位民族領袖，脫帽稱慶之外，更欲何言？

我們當然也知道，祖國積三千年專制之餘毒，百餘載戰亂之積弱，民主、法制，以及工農科技國防諸端之現代化，未可一蹴而幾。我們更知道，證諸國共二黨過去當政之史實，誰也不能擔保「四人幫」法西斯專政之不再重演。惟其如此，我們對今日在祖國當政的開明領袖如鄧小平先生者，就更應該加倍維護誓死保衛。庶幾他們得遂所願，放膽加速民主、法制之政治建設，不受阻撓、不會中斷、更不致夭折。

我們更應對他們不斷提供意見，不斷箴規；這樣他們才更能通達民情，心胸開朗而擺脫死硬教條，

解放思想，實踐地就國情民隱，逐漸找出真正適合中華民族所需要之合理制度，把百年積弱的祖國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法制科學的超工業的社會主義大國。以前全國人民亦嘗以同樣心願，寄望於國民黨的汪、蔣、胡三公。不幸他們終因相互火拼而卒無所成。今日全國九億同胞再度屬望於共產黨的華、葉、鄧三雄。希望他們能不蹈前人覆轍。爲國爲民合作到底，爲奠定今後三百年，富強康樂，民主法制的新制度而努力！

寄語鄧老：先生是海內外炎黃子孫一致歸心的領袖。萬里外自祖國飛來。金風多厲，樽俎傷神，務必節勞珍重！我們希望你多活幾年！中華民族，今天少不了你！

鄧小平此次訪美，表面看來，似乎是對台北當軸一大打擊。然吾人細加分析，便知未必盡然。鄧氏之行。對台灣甚至有利無弊。

公正無私的海外愛國華僑也知道，蔣經國先生三十年來治台的成績，是功不可沒的。首先經國先生在其尊翁蔣總裁的聲威蔭庇之下，爲中華民族保全了台灣寶島，而未使其落入美國「中央情報局」或其他帝國主義餘孽之掌握，只此一點他們已是民族功臣。

近年來寶島和平安定，經濟繁榮，文教昌明，皆爲近代國史所未有。凡此，經國先生均應居首功。今日台灣之建設當然尚未能盡如人意。然人類文明史上，哪裏又有盡如人意之政權？何況兩黨對峙猶在，海峽砲聲未息，政治建設，怎能萬全？

然國民黨在台雖勵精圖治，國府前途終未能擺脫客觀環境之限制。蔣經國先生率全黨侷促於葛爾小

島之上，除非你真能「打回大陸」，則國府代表全中國主權之實質與形式，遲早終有結束之一日。所以過去三十年，台灣在蔣經國先生主政之下雖百廢皆舉，然其政治實質則始終未脫離「拖」字之「一字訣」，此外則一籌莫展。今日國際情況之發展，便是這個「拖」字，所拖來的必然後果！形勢比人強，能「拖」三十年，已屬意外！

但是在「中美外交正常化」之前後，從台灣方面主觀看來，其拖雖一；然自客觀國際形勢上看，此一「拖」字之定義，則已有今昔之異。蓋在此之前，台灣之拖也，後患莫測；結果如何，無人可以逆料！可是「正常化」之後，局勢便十分明瞭。凡經國先生父子昔日所想望於「拖」者，如今除「反攻大陸」一條（這一條他父子二人皆明知不可能）之外，皆已全部得到北京之保證。剩下的只是個「面子問題」——也是台灣「易幟」或「換旗」的問題一條而已。一旦決心「易幟」，則萬事大吉。此一安全保證，實「正常化」之前所未有也。

「易幟」對國民黨來說，當然犧牲太大，牽涉太多。然吾人熟讀民國史，固知國民黨當年，亦嘗兩「易」其「幟」。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所策動的十次起義之旗幟，均為「青天白日旗」。然中山本人於民國元年卻在「五色國旗」之下，就任「臨時大總統」。「青天白日」反屈居「海軍旗」。此一海軍旗直至北伐完成，始再昇為「國旗」。

共產黨「換旗」之歷史亦復相同。中共於江西蘇維埃時期所用者為「鐮刀斧頭之紅旗」（毛周葬禮所用之旗）。西安事變之後，在執政黨堅持之下，終把「紅旗」捲起，改用「青天白日旗」。三萬「紅

「軍」亦接受政府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嗣改「第十八集團軍」）及「新編第四軍」。中國共產黨此一「受編」「換旗」，真是「丟人」之極。據說前「紅軍」官兵有爲此事而「羞憤」自殺者。但是中共卻並未因「換旗」「丟人」便橫遭滅黨之禍。相反的，中共之轉機，卻正從「丟人」「換旗」開始。換旗之後，不足十年，竟然又紅旗飄飄。

對一個擁有武力的政黨來說，「換旗」的真正意義，只是由自命爲「執政黨」這一政治身份「換」爲被公認的「反對黨」身份，如此而已，不多不少。

一個政黨如真正有主義、有朝氣、有做法、則雖一時屈居「反對黨」，等到時來運轉，亦未始沒有重行「執政」之一日。國、共兩黨於此皆有切身經驗。否則，主義癱瘓，暮氣未改，只知抱着個黨旗，終至以身殉旗，結果還是死他個不明不白。

所以今日中共對國府既提出近情入理的方案，呼籲和平團結，則國民黨自經國以下的賢明領袖，如果真正對主義有信心，對前途有方案，就應會商各界，也提出「近情入理」的對策，才是正途。大丈夫能屈能伸，孫大元帥當年開府兩廣，朱毛二公偈處陝北邊區之往事均有案可稽，有例皆可援引。如捨此路而不由，亂向強鄰作七日之哭，或掩耳盜鈴，硬作駝鳥，其結果必將一無是處。

當然台灣也不是經國先生一人可以作主的。「黨內」「黨外」牽涉皆大。北京當局也不應操之過急，促成內變。假以時日，以兄弟之情，互通存問，慢慢和解才好。天下兄弟手足之爭，哪有永遠吵不完之理？！

事實上台灣今日的實際問題——也是經國先生等黨國元老所枕蓆難安的問題——倒不是來自大陸的「禍從天降」；而是它小島之內的「變生肘腋」！今日那蠢蠢思動，志在必得，而又內有羣衆，外有幫兇的「台獨」，才真是台灣的「心腹大患」！

近三十年來，少數台灣知識分子，昧於民族大義，自外於國人，而欲策動台灣獨立，原亦情有可原。甲午戰後五十餘年，祖國政府與人民何嘗顧及台灣同胞之死活？光復以後，「二八二」之鮮血尤足使海外孤兒寒心。中共當國三十年，那種張牙舞爪的肅煞之氣，和蓬頭垢面鶉衣百結的落後實情，使台澎同胞望而生畏，更是人情之常。然少數野心政客、短見文人，竟據此暫時現象，便煽動羣衆，不認祖宗，脫胎換血，自作蠻夷，則嫌過份！

或曰，不忍以一千七百萬和平自由台灣人民之生命財產，委諸「共產暴政」。今姑不問鄧小平之中國，今後尚能有多少「暴政」（事實上今日大陸與台灣「自由」之差距已漸有相反趨勢）？北京已公開聲明，只要台灣不脫離祖國，自稱「瑞士」，則台灣今日一切現狀便可永遠維持。加以台灣內有糧草，外有救兵，一旦中共自食其言，則其屈在彼，兵哀者勝；到那時拔劍而起，強弱易勢，亦大有可能。

所以台獨諸君子，今日捨「現狀」而不「維持」，偏要撈月海底，逼得解放軍，渡海南征，重啟內戰，卻玉帛而動干戈，究爲何事？

再者，如台獨領袖，利令智昏，一意孤行，非「獨立」不可，吾人亦不知其究循何種方式而「獨立」。近百年來，中國領土上在異族陰謀之下而鬧獨立者，其例有三：最早者爲「滿洲國」；次爲「外蒙」；

最近則有「西藏流亡政府」。台獨如欲步「滿洲國」之後塵，今日日本顯無此力量！台獨領袖既無溥儀廢帝之「藍血」；北京恐亦不能再重覆當年之「不抵抗」。如此，則「滿洲國」如何上演？

效法「外蒙」，更是白日作夢。須知所謂獨立「外蒙」者，原為雅爾達秘密會議中，英美蘇三強聯合謀我之國恥產品也。試問台獨諸公，今日仍能策動另一「雅爾達會議」否？

愚昧而乏常識之少數台獨領袖與海外文人，竟異想天開欲玩其「俄國牌」。他們已完全忘記台獨誕生之本質。所謂「台獨」者，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少數日本政客財閥，各為其母國之私利而收養之政治孤兒也。他們能眼睜睜看此一手扶植之孤兒，來「引北極熊而入南海」？

台獨領袖聞亦有以伊朗之柯麥尼教主自許者。須知伊朗為一國與蘇聯接壤，台灣為一省而海外孤懸。二者黃瓜葫蘆之不同，何可混為一談？

要言之，台獨如今如開罪北京，猶可苟安於一時。得罪華府，東京，則立刻死無葬身之地。玩俄國牌之賭客，切莫引熊自殺。

台灣今日原無「獨立」之必要；更無「獨立」之可能！少數台獨領袖，如定要違天理悖良心，一意孤行與九億人民為敵，究何所恃而無恐？

辛亥革命時之日本援華革命志士宮崎寅藏，對中國大陸便最為嚮往。宮崎君固亦有澄清天下之志。但是他嫌日本版圖太小，難展英雄懷抱。立馬中原，何等舒暢，而宮崎自歎無福。今日台獨志士，江南塞北之間本可與中州壯士為民族復興大基，共效馳驅。他們不此是圖，偏要斷髮紋身，自居化外，偏促

於小於東瀛什一之小島，夢想稱王稱霸，豈不爲後世史家所笑？

再者，年來美日商人企圖打開大陸市場，真如饑若渴而終難如願。如今中共當軸，對台灣出口商品無條件開放，而寶島經濟長才，卻疑神疑鬼，裹足不前，此亦吾人所不能理解者也。

總之，我中華民族自蔣、毛二公逝世之後，已另有一番景象！如今桃符初換，歲序更新，我百年屈辱的九億同胞，遲早總應站在一起，攜手團拜才好。

一九七九年一月廿六日於紐約

原刊《華聲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爲「五四」結賬

發生在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現在是應該到了結賬的時候了。爲結這筆小賬，我們還得把「中國近代史」這本總「流水賬」略翻一遍。

老實說，一部中國近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遠在三十年前，我們一批朋友們曾合辦了一個雜誌《海外論壇》，在該刊第一、二期我便發表一篇長文叫「論中國現代化底階段性」。三十年來我對該篇拙文的細枝末節時有修正，但是對「階段性」這基本觀點，自覺沒有大錯——「五四運動」便是這個「階段性」中的一個大「階段」。在它發生之前已有幾大階段；在它之後，亦有若干階段。請申其說，以就正於高明。

現代化實是西化同義詞

在「五四」以前曾有些什麼「階段」呢？那就不得不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說起。那時的「現代化」實是「西化」的同義詞，也就是魏源所說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就是目前中國

「四化」中的「科技現代化」。

老實說，這一段早期的「科技現代化」搞得不錯——那時的「大清帝國」和「大美合衆國」之間的「差距」，比現在小得多！但是這個第一期的科技現代化是失敗了。到「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以後，孫中山和康有為便認為科技是餘事，政治才是根本，所以這兩位廣東老鄉就搞起「政治現代化」運動來了。孫主張「建立民國」；康主張「君主立憲」。一個激進，一個緩進，二人是殊途同歸的——這是第二階段。

可是這第二階段的「現代化」也不如理想，甚至是失敗了。遺老們不是說「民國不如大清」嘛。朋友！這是千真萬確的啊！

「政治現代化」失敗了。胡適之、陳獨秀，我這兩位安徽老鄉就搞起「文化現代化」來了。在他們看來，科技餘事也；政治亦餘事也。其根本蓋為文化乎。中國固有文明，太糟糕了。不洗心革面，不全盤西化，其他一切改革均屬枉然。但是如何洗心革面？如何全盤西化呢？他二人乃敦聘了兩位洋老師，一個叫「賽先生」，一個「德先生」。

可是這兩位洋老師雖大名鼎鼎，望重華夷，卻口齒不清——他兩位既講不出所以然，更提不出具體（着重「具體」二字）的改革方案來。——這便是「五四運動」這個大「階段」了。

「五四」這個時代從北京大學開始，大師們都多少有點「思過於學」、講起文化上的根本問題來，「自以為是」，而又搞不出什麼名堂來。因此不久，陳獨秀這位好學生便掉頭而去，另找名師了。這兒

我不是說「賽、德」二老師沒學問、沒真理；而是他老人家提不出任何「具體方案」來幫我們解決具體問題——搞個模模糊糊的「一點一滴的改革」嗎？老人家，我們有沉疴在身，等不及呀！這樣就只有另請明醫了。

我們新請來的兩位老師，一位姓馬、一位姓列。

這兩位老師可不像「德、賽」二公的混沌水了。他二人學富五車、有具體方案、有實際經驗，更有獎學金、實驗費……踏破鐵鞋無覓處，這一下可找到了。噫嘻乎！中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是聖哲之言，其誑語哉？

這樣便開始了我們左傾的「社會主義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者，真是烈士如雲，人豈不惜小我生命哉？真理、國家重於生命也。巧的是這時的國民黨在中山既歿和「清黨」以後，從一個從事社會改革的革命黨，來個快速的向後轉，搞他個長袍馬褂，文武周公的「前五四」（Pre-May 4th）的官僚體制來。太阿倒持，把現代化的「意蒂牢結」這個法寶，全部奉獻給「左派朋友」去獨佔鰲頭了。

「後事還須問後人」

「社會主義者」，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是永遠「偉大、光榮、正確」的。在政權上說他們確實是成功了，但是在搞了數十年，屍骨堆山、血流成河之後，才發現自己既不偉大，也欠光榮，更不正確了——這一來又搞出一個「開放階段」的「鄧小平變法」來。

「鄧小平變法」的結果如何？治史者，不敢妄言也——因為那是屬於「星相家」的學問。但是歷史家則可肯定它也是一個極重要的「階段」，而這個階段比其他階段可能更艱苦，因為自「洋務運動」而下，所有「階段」（包括「五四」）都帶有「革命」性。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一刀兩斷，殺人如麻，「笨牛闖進瓷器舖」（打倒孔家店、玉石不分），都不太難。而「變法」者，「變」自己之「法」也。主張吃素「放生」的佛教徒不是說：「世人試各平心問，誰肯將刀割自身？」所以「革」他人之「命」易；「變」自己之「法」（割自己之肉）難也。

再者，革命者，秋風掃落葉——來去匆匆。變法者，磨洋工也，大家慢慢來，不行再換個辦法！為評《河殤》之上演，中央首長王震不是說過：「老子革命數十年……」如何如何乎？真是一針見血之言，不肯將刀割自身之心理現象也。所以「鄧小平變法」絕非三年五載之內可妄言成敗。對它作公平有效之評斷，勢非在五七十年之後不可。至斯時也，這個小小地球是否被美蘇二帝國主義的原子武器燬滅且不可知，遑論小平變法。

筆者草此文時，正隨星雲大師弘法探親團，在國內拜佛，難免受他的影響，且引某禪師一詩曰：「山僧到此休饒舌，後事還須問後人。」就此打住。

「五四」意義所在

我們讀史者翻閱過去流水賬，既有此籠統結論；如今言歸正傳，則「五四」這筆賬，又如何結法？

曰，五四的意義蓋可歸納成如下各條。

一、五四是個「文化運動」，與其他各階段之由政治活動家所推動，又自不同。——它沒有具體的政治方案。因此爲善不足，爲害也不大。

二、它提出近百年來國人尋找問題的最徹底的答案：中國固有文明本身害了不治之疾——人死病斷根，因此：

三、它對固有文化作了「通盤的否定」。——現在《河殤》的思想，便是這一脈絡的延續。

四、它對所謂「西方文明」（概括爲德、賽二先生），作了全盤的肯定。但是：

五、它卻提不出「全盤西化」的具體方案。也提不出（如孫中山先生），有效的方案（註：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是一種政治性的「全盤西化」）。

六、它爲「有具體方案」，「有有效行爲」的全盤西化的政治力量鋪路——這就是後來的共產黨。早期的中共是「蘇維埃化」——蘇化是西化的偏鋒。

七、它忽視了「經濟發展」對社會生活現代化的重要性。五四思想家全部是「士農工商」傳統觀念的受害者，把發財致富，看成商人之言。他們是瞧不起商人的。

八、它在西化上有些雞零狗碎的小成就——如搞「語文一致」的「白話文」，便是西化之一環。

九、它既然也是「中國現代化史」中的一個「階段」之一，它和其他「階段」一樣，承先啟後，自有其因果。

十、「五四」有「五四」的框框。它突破人家的框框；人家也有權利突破它的框框。

重新估定「五四」價值

以上是略談「五四」的意義。至於我們要如何對待這一階段，大致也可提出數點：

一、胡適引尼采之言曰：「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他們把孔家店的一切價值重新估定了。我們現在也應該把五四運動中所提出的一切價值重新估定一下，例如「北京大學」入學作文中，不許用「文言」的那項荒謬價值，就需要重估一下。其餘類推。

二、着重「社會科學」的研究；摒棄「玄學」上空談框框。一切「主義」「思想」，都是框框。連小小的《河殤》，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搞出了個小框框。

三、在經濟必須找到個出路。經濟搞不上去，則其國必窮，其民必貧。既貧必愚，既愚必弱。至於如何增加生產，搞好經濟建設，馬克思、列寧、孫中山、胡適，乃至「五四」大師，「五四」小師，無一而非「黑門」。

經濟上不去，文人大師們底法言、箴語，無一而非廢話。

「鄧小平變法」的重點也在經濟。我們希望菩薩保佑他。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上海成其半，南京赴杭州車中完稿。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號第一九一期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胡適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紀念演講會講稿

一、引言

胡適之先生逝世時，我在紐約未能作比較鄭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寫封長信給胡夫人；(二)在紐約追悼會上四個發言人中的最後一位。(據說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電報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發言刪掉了。)今天來作「二十五週年祭」，也可稍補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齎恨以終，死不瞑目。我們今天紀念他逝世二十五週年，希望能搞出個「胡適的復活節」來，所以我用了「捲土重來」這個成語作講題。胡氏其人雖死，其說長新，又將光照天下。我是爲着這一點，特地自紐約飛來參加的。

二、我是胡適最失意時期的學生

首先要說明我以什麼身份、什麼資格來講這個題目：

第一個條件，我是胡適的學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紀，桃李滿天下，生徒數萬人——良莠不齊，擁、反、左、中、右、獨（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門生遍天下——我也是個門生和小門生之一。千萬人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學生談老師的「一『生』之言」，請眾「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這個有隊伍上萬的學生大隊裏，如果說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毛澤東等等北大學生是胡老師的「開山門生」，什麼俞平伯、千家駒、吳健雄、蘇梅算是「第二代」學生……等而下之，則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認我也是胡適之的學生。胡老師生前一直是這樣替我介紹，我也從未否認過。做胡老師的學生，不是什麼名譽學位；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光榮，但也算不了什麼缺陷或負擔。但是我這個學生，除追隨他去聽他講演之外，我沒有正式拿他的學分，但是我却單獨上過「胡適學」大課在一千小時上下，這是胡適所有的學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賓客，我是真正的在上課——這一點我得感到師恩獨厚！——做了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時期、最孤獨時代的學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榮華富貴，平時得意非凡，意氣風發。但他一生却有個最低潮，那就是五十年代初、中期。老實說，那時他老人家很慘，大陸上正在殺人放火批胡適。——那時與現在不同，那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還認為中共確有一套，大家正誠心誠意的洗心革面，來接受一套新東西來救國。胡適那套太腐朽，要丟到茅坑去——這是當時知識分子誠實的看法。那時台灣亦無力扭轉這局面。海外的老胡適，在海內亦不太受歡迎，任他去「自生自滅」。我那時和我老師比，我覺得在海外，我絕對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開計程車、洗盤碗；而可

憐的胡老師，那時貧病交迫，心臟衰弱、胃潰瘍……十分可憐，又受洋人忌妬，他再無法自生，却在等着「自滅」，情況是十分淒涼的。他雖然有點養老金，但那養老金，抵不了一場大病。社會是冷酷的。一個學生帶一個西瓜、半隻板鴨，去看一個貧病交迫的老師和師母，和一個鞠躬如也，透過三重秘書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學祭酒的老師，味道是不一樣的呢！換言之，我是胡老師最失意、最窮困、最灰溜溜的時代、最孤獨的一個小門生。胡先生那時很需要我們，我對他老人家，讀得太多（家庭也有點關係），禮敬甚重，交情是自然發生的，不是哪個機關、哪個政黨派我去的。後來我和胡氏合組個計劃，我變成哥大的研究員，那時哥大財多勢大，把我胡、唐二人的合作的小研究計劃吃掉了的緣故。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的說，我們在討飯吃。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係，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個乞丐小和尚的關係。這兩個老幼乞丐的關係，不是馬融絳帳，或程門立雪的關係。在那種關係之下，老師高坐講台之上，小學生只有站着的份兒、叩頭的份兒。偶爾老師賜座，也只坐半個屁股，另半個屁股還要懸空，才能表示敬意。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窩內的情況就大有不同了。傳道的語調內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講的和胡先生其他學生所講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話，那也由聞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師生活和學問的另一半——衆人皆知胡老師是終身謳歌美國的。但是美國所謂「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說大陸視如蛇蝎，台灣也不會接受——胡適在爲程天放所寫的「論美國」作序時，就把「這年頭」慨乎言之。但是胡適之會全盤接受美國式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化」的（共

產黨不夠資格說這話)。何也？就因他在美國住的太久，知道美國最深，只有他才配說什麼接受不接受。胡適在美國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詩，做一首有關胡適的打油詩，唸出來大家聽聽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前廿年還小，後十年未老，成熟時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國過了！

所以胡老師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國過了。一個研究胡適的人，要不和胡老師一樣在美國長住過，便很難掌握胡適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態。在美國住久了，有一種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態——這一心態平時不易看出，只有觀察今日大陸留美學生現狀，才能略有啓發——從一個古老文化，接觸另一個新興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震撼是可怕的——最近大陸留美學生一千多人簽名反對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就是這一震撼的結果，這種震撼，新留學生最明顯，老留學生四十年來亦餘震未已。胡適震撼顯然比任何留學生強大，所以他回國以後，才搞起新文化運動來。因此，我這個在美國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學生，對一位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師的研究，或可彌補國內學者的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國內書籍，詳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當然，海外學人更得向國內同文學習，以彌補其另一方面空白，兩方相輔相成，才能得比較客觀而接近事實的結論。這也是我斗膽前來班門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國內同文乞教，此其四。

三、洞山和尚的批判態度

至於我這個學生對老師的學問的學習保持個什麼態度呢？我認爲「老師」一辭的意義，並不代表真理的終點。但是老師畢竟是老師。所以對老師的全盤否定，像毛澤東那樣，甚至把老師的祖墳也給挖掉，那就太混帳了。相反的，對老師的全盤肯定，也是病態，胡先生一輩子都叫我們做個「不受人惑的人」。記得胡氏生前對我們教誨，常常引用一些和尚的語錄，以加重對我們的教誨——胡是禪宗史大師——他經常引的一位「洞山和尚」的胡事。洞山和尚是雲崖和尚的及門高足。於是有人問洞山和尚說，「你肯先師也無？」意思是說，你贊成你老師雲崖和尚的話嗎？洞山說，「半肯半不肯。」其人又問，「爲何不全肯？」洞山說，「若全肯，即辜負先師也！」洞山和尚這句話，也是胡適治學精神的精髓所在。今日的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他的治學方法與胡適學派本有很大的距離，但是他在替胡頌平先生所編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所寫的長序，也徵引了這一段胡適之的口頭「禪」。足見對「先師」學術思想持「半肯半不肯」的「批判態度」，是任何嚴肅學派裏的「學生」所應該共同遵守的態度。不是某一個「學生」，對他的「老師」的不敬或心存離經叛道、譁衆取寵。記得「元曲」裏，有個白話曲牌叫「一半兒」——有一札曲子，描畫一位男士跪在地下向一位女友求愛的故事。那女的所唱的便是這「一半兒」的牌子。她唱道：「碧紗窗外悄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罵一聲可憎回轉身，不是奴心狠，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這位女士爲什麼「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呢？因爲她如全肯，那就不但辜負了愛情，也辜負了文化。洞山和尚、胡適之博士、和胡博士之下的一批學生，對他們的老師，不願「全肯」，不是不敬愛其「老師」，正是由於「不辜負先師」，才不願全肯。全肯則沒有進步，沒有進步

，則文化便停擺了。做個胡老師的真正的學生，就要遵從師訓，不能全肯，全肯便是辜負文化了。

我今天爲什麼未觸及正題，却首先說了這麼一大段態度與方法呢？這也是於師訓有據的。胡先生說，他一生治學，都是圍繞着「方法」二字打轉的。方法和態度不弄清楚，談胡適是不能開口的。現在再談談什麼是胡適？什麼是胡適時代？這時代何以離去？又何以「捲土重來」？

四、什麼是胡適？

「胡適」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已不是個單純的人名。它代表一個「文化整體」(cultural entity)。(因爲胡老師已不只是某一行的老師，他簡直是衆多重要文化行道中的共同宗師。例如「文學」(包括新文學、白話文、新詩、新舊文學的比較與批判，等等)；「史學」(包括對舊考證學的再肯定，和對新史學方法的介紹)；「哲學」(包括對先秦諸子、宋明理學的再估價；對歐美傳來的實用主義的介紹和對辯證玄學的批判)；「宗教」(包括對佛教禪宗的研究與批判；對耶教的立場與看法)；「政治學」(尤其是對民主、自由等形式和西歐北美的政治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介紹)等等。在上述各項中，無一項他不是個開山老祖或總司令。近七十年來的中國思想家——不管他是反胡的、擁胡的或左、中、右、獨(獨立思考也)各派——都是圍繞着胡適在打轉，不提胡適，話便無從講起了。在大陸的經驗，「開談不說胡適之，讀遍馬列也枉然。」

所以「胡適」，這個題目太大了。他是近代中國文化史中的一座大山。從外面看胡適，亦如從外面

看一座大山。古人看廬山，說他是「橫看成嶺側成峯」，兩面不一樣。看南嶽衡山，也有人說「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也是九面不同。我個人前不久去玩泰山，從泰安賓館仰視南天門十八盤，才了解到什麼叫做「泰山仰止」。蘇東坡寫他看廬山的經驗是「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看中國任何名山都是如此。只要身入此山中，便必然的不見此山真面目。

胡適便是這樣的一座大山。一個學者，誤入胡山，搞了一輩子，結果還是不見胡山真面目。如果來他個老辦法，從山外看山，來個「帆隨湘轉，望衡九面。」而每位學者，各有其行道，各有其主觀，他也只能否定或肯定胡山的九面之一而已。因此今天我所想講的，也只是個胡適的笨學生，講他老師的九面之一而已。通盤檢討，則小子何敢，尚乞聽眾專家見諒。

〔在此我想附帶插一句話。我每次飛過東京，總歡喜看富士山。有時飛機繞富士達二十分鐘之久，我始終就看不出兩樣的富士山來，真是太單調了。將山比山，將思想家比思想家，日本人比我們還差一大段，可能也是地理環境使然——日本沒有像我們胡適的一樣那種多采多姿的大山。所以我們的政治家、思想家，要想在歷史上搞的多采多姿，也就應該衝出一個小島的自然環境，然後才能心胸開朗！〕

五、什麼是胡適時代？

以上說的是「什麼是胡適？」但是什麼又是胡適時代呢？

要了解胡適時代，我們得把整個近代中國這個時代分析一下。我們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受了最少外界文化影響的古老民族，在文化上自給自足（self-sufficient），無求於人，亦無害於人。在人類文明史上，實在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現代的革命家、歷史家、評論家，往往把我們老祖宗罵得一文不值。我們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學的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優劣，它要比較着看，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將貨比貨，我們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專政的政治制度，可能還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這自給自足，十分自滿自足的一家，向不懷疑自己有什麼不好。可是近百餘年來，尤其鴉片戰爭之後，在西力東漸的壓力之下，才發生變化，喪失了自信和自滿。因此，我們搞歷史的人，可以大膽地說：近代中國是什麼個時代呢？近代中國是一個「挑戰與反應的時代」（Age 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西方文明向我們挑戰，我們不得已應戰。我們應戰得很艱苦，而這「應戰」也是層次分明的——吃一塹，長一智。

鴉片戰爭（一八三九年——一八四二）之後，我們應戰的方法是側重科技性。也就是「堅船利砲」政策。這一時代的發言人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把這一發展概念化一下，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套着重科技反應的政策，一直延長到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九五），大家才覺悟，中國問題不在科技落後，而是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政治問題不解決，科技也是搞不上去，搞上去也無用。因此，大家才又集中於政治改革，緩進派乃有康梁維新的「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激進的政治改革乃有孫中山先生的排滿革命運動。康梁的緩進派是失敗了，中山的激進派是成功了，終於建立了民國（一九

一二)。但是民國成立以後，袁氏竊國，軍閥橫行，事實上却弄得「民國不如大清」。在超過半世紀的改革而國運仍然如此，癥結何在呢？仁人志士在絞盡腦汁之後，發現科技落後、政治失常都不是民族病症的根源所在——我們民族的絕症是我們不健康的文化，百病叢生的文化，非把這落伍的、野蠻的、吃人的舊文化徹底改造不可，否則，其前一切的革命、改良，都只是治標之策。因而在一九一七年以改良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再造文明、全盤西化終，這個所謂「新文化運動」，出了個大英雄，這個英雄就是胡適之，這個新文化勃起的時代，也就是「胡適時代」。

六、胡適時代的內涵是什麼呢？

胡適時代的內涵是改造舊文化，再建新文明。再建新文明的辦法是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而估定一切價值標準的標準，便是「科學」和「民主」。凡固有道德、傳統制度之不科學，非民主者，則一概鋤而去之，要鋤得徹底，除惡不盡則新善不立。但是胡適是反革命的。他不主張大刀濶斧，流血革命，他是「實驗主義」信徒，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革。改革的最後目標是「全盤西化」，後來他嫌此語有語病，乃改爲「充份西化」。可是不論「全盤西化」也好，「充份西化」也好，中國政治社會的最後的型態，便是「美國模式」。換言之，胡適鋒頭最健，最能顛倒衆生的胡適時代之內涵，有四大要項，那就是「科學」、「民主」、「實驗主義」和「美國模式」。根據胡適的解釋：「科學」是一種方法，合乎邏輯，合乎法理，用這種方法，可以在實驗中求出真理

來。換言之，也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不是像宗教或玄學之中，可作虛無飄渺之談。「民主」則是一種人類生而平等，生而有其與生俱來的不可分割的天賦人權的個體或團體的生活方式。「實驗主義」則是一種由哲學向科學過渡期的哲學。它沒有終極真理，只有有實用價值的觀念才是真理，真理可以隨時製造，隨時揚棄，不是一成不變的。至於「美國模式」則是在科學、民主、實驗主義，交互為用的配合之下所產生的一種「較好的政府」、「比較合理的社會」。所謂「全盤西化」者，就應以美國模式為鵠的。

胡適之說，大體上自他一九一七返國使風靡一時，為青年學生所崇拜。這一崇拜熱潮，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蓋達於巔峯，直至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後，始漸次減退，到三十年代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漸向左轉（此是世界潮流，和一九二九——一九三六美國經濟大不景氣使然），胡適思想才如他左派學生千家駒所說「臭名昭彰」矣。

至三十年代中，胡適個人思想雖無變動，然已陷入低潮，影響力甚微了。雖然他自己却矢志不懈，堅持到底。

七、並不實用的「實用主義」——胡適思想的退潮期

胡適的思想在三十年代已急速退潮；至四十年代，除為少數所謂「民主人士」利用為藉口而興風作浪之外，胡適思想對青年、對政治、對社會，甚至對學術的影響，可說微乎其微。連自稱「民主人士」

之人，也只搞他們自己的「民主」，而反對胡適的「民主」。這是什麼道理呢？說起來也很簡單。胡適是服膺「實用主義」之人，而實用主義最基本一條原理便是，凡是沒有實用價值的觀念都不是真理。真理是有立竿見影底實用價值的；沒有實用價值的真理，不論如何動聽，只是一些偉大的空話。在那個軍閥橫行、強寇壓境、飢荒遍野、餓殍載道、官吏貪贓枉法、洋奴大班、富商地主、驕奢淫逸的不平社會之下，「科學」、「民主」值幾個錢一斤？「一點一滴的改革」從何改革起？我國古人譏笑宋明理學家，說他們「置天下飢饉於不顧，而空談明心見性」。胡適的情況幾乎是一樣的，他「置天下飢饉於不顧，而空談科學、民主、一點一滴的改革。」這在當時看來，是一場完全沒有實用價值的「偉大的空話」。

胡適底「偉大的空話」解決不了問題，代之而起的，則是有自命為特效藥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了。二者對當時中國的情況，都提出有實用價值的觀念。共產黨的辦法，不必多提了，縱是「法西斯主義」，胡適的「實用主義」也抵擋不了。胡適最好的朋友，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名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蔣廷黻先生，那時就主張，中國應有個個人獨裁效率卓著的中央政府。這辦法就是德、義二國，能於短短數年之中，崛起成爲世界強權的實用價值的證明。胡適和蔣氏筆戰一通，並不能扭轉當時青年對領袖效忠、抗日救國的強烈信心。胡適思想終於受左右兩翼的包抄，而一時灰黯無光，形成最大的低潮期。這一低潮期一直延長到五十年代。海峽兩岸，一個是尊而不親；一個是徹底批判、消滅。老胡適只好躲在美國當難民了。

八、胡適的「執拗」與堅持

但是一個對真理有澈底認識和信仰的人如孫中山、如胡適之，他們和我們之別，便是我們普通人容易洩氣，而他們則不顧一切困難而堅持到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胡適對他的「科學」、「民主」、「實驗主義」、「美國模式」的四大信仰，一生也未動搖過。

適之先生的一生成就，大致可分為兩大階段，而以他四十八歲（一九三八）出任駐美大使為分水嶺。在此之前，胡適是位啓蒙大師、學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四十八歲以後，他則逐漸走向民主大師、聖人偶像，而終成爲一座自由神像。雖然這神像手中的火炬，需要別人來點燃，但沒有神像高舉的手臂，這火炬也只是一點海上漁火而已。

由於胡適的倡導、胡適的堅持、胡適的執拗，終於我們東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點火的代有其人，而讓人頂禮膜拜的却永遠是這座神像。這神像高舉火炬提出四大號召：（一）言必有據的「科學」方法；（二）以「人權」以「健康的個人主義」和多黨的議會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爲基礎的「民主」政治；（三）反對流血革命，安心於一點一滴改革實踐求真理的「實驗主義」；（四）以富強康樂的「美國模式」爲今後改革的目標。

九、捲土重來的事實

上述胡適時代的四大內容，終胡適一生，都是空想。所謂「科學」只限於極少數象牙之塔以內的知

識分子。塔外軍政商學，用上科學的就太少了。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其最大的倒行逆施便是不科學，例如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治理黃河、人口政策……等等最不可恕的地方便是無視科學，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連科學之家的象牙之塔也被反科學的魔鬼所突破，例不勝舉。至於「民主」，則古今中外之糟蹋人權，反對 Individuality、反對選舉、反對議會政治，搞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寡頭政治，恐怕除中共之外，再無第二家了。

〔此處也想插一句話：毛澤東究竟做不了北大的學生。他連最起碼的「人權」一辭的定義也搞不清楚。在一次講演裏他說，「什麼是天賦人權，我們的權是天賦的？我看還是人賦人權的好，我們的權是人民賦的……」這表示毛氏連一般初中學生的社會科學常識都沒有。但是他却隻手統治中國大陸二十餘年，斯之謂愚昧統治（rule of ignorance），余另有長文論此事。〕

至於「實驗主義」被看為資產階級最反動的哲學，那就更無論矣。「美國模式」不用談了，就是對美國的所謂「海外關係」亦足以殺身！

上面已提到過，在二、三十年的中國，逐漸把胡適思想擠下去的有兩大主義。(一)是法西斯主義。這個主義不幸在二次大戰時，站在德、義一方，硬被盟軍打垮了，一筆勾銷。(二)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席捲大陸，閉門造車，去實行它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

〔再有點插話：辛亥革命之後，江亢虎等一批社會主義者，要搞「社會主義」，那時孫大總統曾答應他們，將來把崇明島劃給他們做實驗區。江亢虎雖然未搞到崇明島，毛澤東却搞到全部大陸作實

驗區。」

共產黨在大陸實行了四十年共產主義。搞出個什麼成績來是人人皆知的。我去年夏季訪大陸，在北京和上海有一大批青年學生、作家、新聞記者和我談話，說他們要搞「全盤西化」，只有「全盤西化」中國才有出路。他們所謂「全盤西化」，事實上便是「全盤美化」，接受「科學」、「民主」、「實驗主義」和「美國模式」的四大堅持，去代替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這些青年問我的意見，我這位胡適的學生，被嚇得自床上跳起來。我拿起胡適的修正實驗主義來說，我不贊成「全盤西化」，我贊成「充份西化」。誰知事隔不足半年，「全盤西化」竟然變成全國性的口號，十多萬青年上街，來炒個「五四運動」的回鍋肉。真大出我個人意料之外。使我想到他們所要求，正是胡適當年所倡導的，也是今日胡適自由神像火炬之下的四大號召。

〔適之先生生前，常喜歡當笑話說，大陸上在「追趕胡適的幽靈；怕胡適僵屍復活」，我曾爲他這句話，做了一首十四行詩。〕

如今胡適的幽靈果然復活了。胡適的時代，真的捲土重來了，我們可以拭目而待之。

十、何以會捲土重來？

胡適的時代何以會捲土重來呢？

回答這個問題便是，胡適所搞的那一套，是西方文明的正統。法西斯和共產主義只是所謂西方文明

中的兩個邪門或邪教。正如佛教十大宗，禪宗便是個正宗，密宗便是個邪門；密宗中之黑派，更是個邪門之邪門，專搞畫符唸咒、打神驅鬼、呼風喚雨、看命論相等。然長期競爭，邪終不敵正。西歐是西方文化的正統所在；只有這個正統才能撼動我們東方文明的正統。搞點西方邪門，到東方來畫符唸咒，有一時的妖言惑眾之功，五斗米道，終不能治國，這便是邪門必無好下場，此其一。

再者，我們要接受西方正統文明，以增強和改造我們的正統文明，也有其接受的條件。條件不足，則為邪門開路。條件多端，最要者為經濟和教育基礎，還要加上個安定的社會。

〔試看以下的經濟條件，美國平均國民所得一五、〇〇〇美元、臺灣四、五五〇美元、大陸僅三〇〇美元。美國的清寒線為一二、〇〇〇美元。大陸所謂的「萬元戶」三、〇〇〇美元。美國和臺灣的中產階級的力量，大陸尚未形成，教育落後，經濟落後，使中共還可苟延殘喘。然經濟、教育稍一進步，則專政便要動搖。經濟、教育不進步，則亡黨亡國。經濟、教育進步，則必先亡黨。因社會安定，「一點一滴地改革」，則議會政治興，而獨裁專政滅。〕

胡適時代捲土重來，則中華民族兼中西之長，在超西方時代（Post Western Age）走向康莊大道，向西方作文化反挑戰（counterchallenge），為時當不在遠。臺灣在這方面，歷史責任重大，應好自為之。

諸位，讓我們一齊鼓掌，歡迎胡適時代，捲土重來！！

「銅像」遲早會出現的

——紀念雷震先生逝世十周年

一股衛道精神

雷傲寰先生之死如今已十個年頭了。當年他主辦《自由中國》之時，我也是執筆人之一。他終以言禍入獄，受盡折磨，最後坐通牢底，瘐死獄外。但是因言得禍，受「禍」者雖只雷氏一人，而當時和他一起放「言」高論的我輩《自由中國》作家們（當然包括胡適之先生），豈無文責？我雖所撰無多，而夸夸則一——所以也是送雷公進大牢的幫兇之一。今日思之，猶覺耿耿。

雷震先生，照殷海光的看法，基本上也是一位國民黨的高級官僚。只要他肯安份守己，就可長保祿位，富貴終生。雷某不是個碌碌庸材呀！他是位能吏幹材，當年蔣公是頗為倚重的。在國府遷台以後，在黨政上下一片「改造」聲中，是有他一席之地。雷氏捨此高官厚爵的正路而不由，而偏和胡適輩思想有「毒素」的民主人士，去走其獨木橋，搞其反對黨，原是愚不可及之事。但是雷君何以作此愚不可及之抉擇呢？無他，他只是認為國民黨不可一亡再亡。「改造」只可向民主方向前進。「改造」如果只是和共產黨作專制競賽，則大專制吃小專制，台灣亡無日矣。

在那五十年代，作此想法的原不止雷某一人。大至胡適、張君勱；小至海外留學生，島內大學生，無不所見略同，聲氣相通。可是在當時戡亂條款的壓力下，敢於被開除黨籍，扯大旗作虎皮，挺身而出，與極權相對抗，把民主腔調，高唱入雲，那就只有雷做寰一人了。雷氏何以要赤膊上陣，暴虎馘河呢？一股衛道精神而已——他認為我如不入地獄，則中華民族便要無知黨人，搞得萬劫不復了。

明朝初年的方孝孺便以同樣的精神去捍衛他信仰的三綱五常的道統，而弄得「十族同誅」。雷做寰則為建立中國的民主政府，也弄得坐牢十載，肝腦塗地。此二人相去六百年，各人所捍衛的完全是兩碼子事，但是他們底當烈士的精神則完全相同。

註定的可敬可悲下場

胡適之先生那時是雷震最顯赫的支持者：胡氏鼓吹了一輩子民主，處處碰壁，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誰知在垂暮之年，卻遇到這樣了不起的「傳人」雷震。雷震所搞的簡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適民主」。長征接棒有傳人，胡氏當年對雷震讚揚備至。口口聲聲地說，為着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大家真應該替雷做寰造個「銅像」。雷氏在胡大師全力慫恿下，也就搞得益發起勁。

誰知「胡適」畢竟只是一塊掛在十字路口的招牌。「招牌」除替街上行人指方向之外，究竟有什麼實際力量呢？加以老胡適的個性既不是雷做寰，更不是方孝孺。慢說他一己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仰人鼻息；他對推動民主，和民主政治運作的基本條件也模糊不清——胡先生對「民主政治」和「中

「產階級」的關係始終未弄清楚。他老人家只是爲民主而民主，在把「國民黨一分爲二」等空想之外，抓不到政治行爲的要領，所以蔣老總統皺皺眉頭，我可憐的老師也就老態龍鍾的靠邊站了。

中國近代史上的蔣毛二公，可不是宋史上的神宗皇帝。爲着「變法」，王安石可以和他的老闆面折廷爭，「如在私室」。蔣毛二公之前，你可不能「強辯」啊！萬一他二公所說的不是「強辯」，而真是「槍斃」，那如何得了？據以前會做過蔣毛二氏之侍從的張治中，私下告訴他兒女說，蔣公還算是好的。四顧無人，你還可和他「強辯」一下。毛可絕對「碰不得」啊！在這種現代式的極權政治之下，你怎能厚責於我的胡老師呢？

可是我們那位不怕「誅十族」的硬漢雷震，卻不管這一套。他要挺到底，而他卻沒有一個民主政治底「倚靠階級」的「中產階級」來撐腰；他的後勁卻全靠一張銀洋臘塗面的紙招牌胡適。胡適的腦袋比他大，肩膀比他軟。這一不相稱的搭檔，就註定了雷做實做民主烈士，可敬可悲的下場了。

記得做實先生入獄不久，適之先生也永別人間了。當我再次訪台時，斯時還健在的周棄子詩人，在一次宴會上示我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是：「銅像當年雖戲語，鐵窗今日是週年！」我就告訴周君說，「戲語」是書生的拿手好戲。適之先生是一位「白面書生」。李宗仁批評他「愛惜羽毛」。書生連「羽毛」都愛惜，況「頭顱」乎？你怎能希望胡適之做寧誅十族的方孝孺呢？而做實先生卻相反，他是個方孝孺型的人物，是「茅坑裏面的石頭」，又臭又硬。不過臭得對、硬得對，則銅像遲早還是要出現的。

我和周棄子詩人的對話，又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歷史是鑑定一切真理的標準。是正是僭、是真

理、是空談；是造福人類，還是禍國殃民……只有歷史才能紀錄出公正的評斷！雷傲寰先生當年所作所爲，正確歟？錯誤歟？蔣經國、鄧小平、戈爾巴喬夫，不都以政策作出答案了嘛。現在我們真要替這位民主先驅造一座「銅像」了吧！

爲《自由中國》寫文章

我替《自由中國》寫文章，實是適之先生鼓勵的結果。胡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出身的「博士」，所以他對哥大新出爐的「博士」有偏愛；認爲他們是具有嚴格學術訓練和趕上時代思想的新學人。因而他每同我們這些博士班研究生和新博士們談到《自由中國》或新黨，乃至泛論「自由、民主」時，他總說「你們替雷傲寰寫文章嘛。」他有時也批評《自由中國》的內容說談時政的太多，論基本問題的文章不夠。他有時甚至替我出題目，要我寫點杜威晚年的思想等等。

那時我個人精力雖甚充沛，但是實在太忙。我是個有全時工作的僱傭研究員，還在市立大學兼課，日不暇給。在五八年前我的博士論文還未殺青，須於午夜趕工；加以娶妻生子，忙得團團轉。最近爲尋覓雷先生當年寫給我的親筆信，曾把一九五八至六〇的日記略事翻閱，還翻到了一首早已忘記的律詩。其中有兩句說：「稚子初生來遠客，圖書長擁久圍城。」今日回思當年情況，真如在目前。記得「稚子初生」的一兩年內，夫婦二人因帶孩子沒經驗，又無祖母、外婆或保姆幫忙，整日整夜忙得團團轉，真如每天家裏都有遠客來訪般。

再者，爲着糊口、養家和外務，加以「李宗仁」、「黃郛」、「顧維鈞」、「白崇禧」……無限篇章的壓力，我那一房一廳的小公寓之內，堆得四處皆書，小小的個體，擠坐其間，真是久圍之城，無法突破；哪還有工夫去和「雷震」和《自由中國》打交道呢？

《自由中國》被查禁

一九五八年春，適之先生回台北去了，春去秋回。他在台北逗留期間，顯然和雷氏談及他紐約的「一羣小朋友」。當胡氏決定返台定居時，雷傲寰乃正式給我寫信，用目前術語說，就是爲他的刊物「組稿」吧。我沒空寫稿，但是他是前輩，他來了兩封信，我至少得回覆一封。就這樣，我便和傲寰先生通起信來了。通信之不足，傲寰先生乃叫他的長公子紹陵來寒舍三顧茅廬，坐催索稿了，情不可卻，才遲遲執筆，勉力於夜半塗鴉應命，誰知未寫出三兩篇，便聽到美國電台廣播台灣「反對派領袖雷震」被捕入獄了。最令我心頭耿耿的是他坐牢之後，我才收到最後一、二期的《自由中國》，在其中一期的社論中，雷君還特地把拙作提了一下，使我有「幫兇」「送牢」之感。——「牢」是他老人家坐了，而不負責任的放言高論的卻是我們。

與此同時，在適之先生鼓勵之下，大致有十六七位「胡適的小朋友」，在紐約也辦了一家綜合雜誌，叫《海外論壇》。該刊在紐約編輯，香港排印出版，銷行「海外」。這個小雜誌雖然先天不足，命途多舛（主要是內鬨），但是胡適之、雷傲寰，卻把它愛如珍寶，《自由中國》並紆尊降貴，拜它爲姐妹刊，

許以轉載稿件，交換廣告等等特權。誰知終兩姐妹有生之年，二刊只轉載過一篇拙作考據文章「論西山會議派」，便先後關門了。——雙方都是以最不民主底方式關門歇業的——《自由中國》是被「查封」；《海外論壇》是為「援雷」意見不同鬧「內鬨」而關門的。當時社內援雷的多數是消極，少數不同意見的要抓，又力有不及。因此這一家也曾擁有讀者和影響力的「海外自由中國」，也就痲死獄外了。

論「民主教育」，數「歐美學位」，我們《海外論壇》的成員，可能超過當年的《獨立評論》。這一大批受民主教育的中國「高知」，對一個只有小小問題的《海外論壇》裏的糾紛，尚且不能用「民主方式」解決，我們有何面目向祖國同胞和黨人覘顏說教呢？言念之下，不禁汗流浹背，但是汗流浹背之餘，也悟出些真理來。

民主政治不能靠恩賜

民主政治是不能靠「恩賜」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槍桿子可以打出來的。它是「中產階級」的「多數統治」之下，相對「社會力量」均衡下的產品。「民主」才是制裁「內鬨」的不二法門。

開明或不開明的專政者，主動或被迫「下詔立憲」是騙人的。「軍事獨裁」無出路，終於「明令行憲」，也只是自欺欺人。

有些有民主意識的武士、軍頭，要用槍桿來建立民主政治，也是建不起來的。君不見克倫威爾、拿破崙，都不是用武力打倒了專制，倒頭來自己卻作了獨裁者、大皇帝。

書生輩如譚嗣同、雷傲寰、胡適之輩，要用頭顱熱血、筆桿嘴巴來爭民主，也是爭不到的，君不見他們一個殺頭、一個坐牢、一個啣恨以終，但他們是「先知」、是「聖者」，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面。沒有他們「導乎先路」，後一個時代，就沒有那麼順理成章、光輝燦爛了。

等到這個光輝燦爛的民主階段到來，這時也就是為他們建「銅像」的時候了——胡適之先生預言講早了三十年。

「民主政治」是要以一個富裕安定、光彩輝煌的「中產階級」的政權作基礎的。中產階級的「社會力量」相尅相爭，而互不相下，乃搞出個彼此都能接受的民主制度來。什麼叫做「中產階級」呢？從經濟基礎上說，中產階級是個經濟階級。十八九世紀的「西方社會」暫且不提，二十世紀的三四十年代的美國，對中產階級卻有句順口溜叫做「家裏裝電話、兒女進大學」。家裏要不要裝電話、兒女要不要進大學，非關宏旨，但是一個家庭有此經濟能力，就是「中產階級」了。

從智慧上說，中產階級是個「心態」。什麼心態呢？是能送兒女上大學底階層的心態。

進入中產階級專政階段

一個國家，如果這樣的中產階級的家庭變成各該國的多數，或至少三分之一吧，那這個國家就可進入「中產階級專政」（共產黨叫他做「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了。不論是「中產階級專政」或「資產階級專政」都比「無產階級專政」要好些，因為他們有些鈔票。「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有錢人不敢走

險棋，胡亂地殺人。「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淫慾是不好，盜心更壞，「民主政治」原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較好」的制度嘛。

筆者在雷震時代訪台，如見到友人家裏有一架電話，那簡直是貴族了。但是現在台灣，哪一家沒有電話呢？那時幾個孩子上大學呢？現在幾個孩子不上大學呢？

「家裏裝電話、兒女上大學」，不一定能搞「民主」。但是家中沒電話，孩子不能上大學，則民主就是摸不着邊了。

台灣今日電話和大學都不稀奇了，也是我們替雷做喪先生樹「銅像」的時候了。

親炙雷震高風

以上所說是雷震先生和我在文化圈中交往的一些往事。若從家庭方面說，我們還是親戚，甚至是「至戚」呢？因為他夫人宋英委員的娘家，和我家有多少代的親戚關係。從我本家算，她比我長兩輩：從我外婆家算，她比我大一輩。我們唐宋兩家真是姻聯秦晉的。可是當雷公在重慶做大官，我也在重慶穿草鞋、害夜盲、做難童時，我沒有找過他。後來我大學畢業了，在南京作「待業青年」，也沒有去找過他們，雖然宋英委員那時與我姑媽她們頗有往還。姑媽也勸我去「找雷做喪推薦、推薦」，但是我始終未去拜謁過。後來雷公在台灣坐牢了，我奇怪爲什麼胡適之先生不去看望他，而我自己倒想去探探監呢。（可是始終沒有這個機會。）

一九七一年我應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之約返台開學術會議；嗣後並蒙老蔣總統召見，也可算是政府的「貴賓」了。這時雷公已經出獄，但是台北親友們談到「雷震」，還是人人色變。在這情況下，我應不應該去拜望一下雷傲寰先生呢？

我想：雷氏之坐大牢事實也是替我們那一批不負責任，放言高論，自命民主人士的作家們「揩黑鍋」。現在他坐通牢底出獄了，我連看也不看他一下，在做人的道理方面說，我還是個什麼「人」呢？再想：我是政府買飛機票「請」回來的客人。一回來就要去看「死不悔改」的「反政府」首腦，談反對政府之道，是否也有不是之處呢？

這種道德上的矛盾，在儒家的倫理學便是「瞽叟犯法」的案例了。舜的老子犯了法，做皇帝的兒子，是否應該執法以繩呢？

我想了些時，乃作了個「探望」的決定。但是我既然接受政府邀請前來，要反政府，到別處去反。絕不能在接受它的邀請之下「反」它。就這樣阿Q了半天。那時我住在岳家，為免吳開公不便，乃找個借口搬到「中泰賓館」。在賓館內打了個電話給雷先生，說要去看他。

「你不能來！」雷氏爽朗地拒絕了。

「爲什麼呢？」我問。

「我家四週都有特務……我來看你！」

就此把電話掛斷。果不久雷氏乘着部計程車抵達「中泰賓館」；我約他在啖啡廳小坐。

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親炙高風。

雷氏高大的個子，講話那樣斬釘截鐵。真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有其凜然不可犯的器度。哪像胡適之先生那樣斯斯文文畏縮的樣子呢？

看到雷氏，我就想到那時正在四下暗中監視他的一批小特務，真是閻王與小鬼之分。我也覺得：「大丈夫，男子漢，當如是也！」

這次我和雷震沒有談政治，當時暗中如有人錄音，他們可能太失望了。但是我對雷氏那一大把「骨頭」，卻是由衷的敬佩的。

生為正人君子。有主張、有見解、有骨頭，正是頂天立地的好漢。豈可躲躲閃閃，羞羞答答，躲在牆角暗處，作兒女子態呢？

用修養克制自己

這次我與雷先生談了兩個多鐘頭，甚為投契。他告我一個人做人要有骨頭，也要有修養。坐牢就要有修養，他說他坐牢十載，左右隔壁的難友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活了下來。

「有什麼秘訣呢？」我問。

「要欣賞坐牢嘛！」雷說時微笑。

他說他左右鄰難友都煩躁不堪。一個不斷傻笑；另一個終日唧唧咕咕，大小便都不控制，結果一個

一個死掉。

「我想我如不拿出點修養來『欣賞坐牢』，我一定跟他們一樣死掉……」雷說他用修養克制自己，終於神經還能維持不錯亂，而終於「活着出來」。

雷做實這通「欣賞坐牢」的哲學，事實上就是「阿Q精神」，而阿Q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卻是可大派用場。

做實先生還和我談了一些我們親戚間的事。

我還有位姑丈史國英將軍，他是孫立人將軍一伙的留美學軍事的同學，回國一帆風順，在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官拜中將，可是隨政府遷台以後，可能以留美學軍事的緣故而無端逮捕刑詢，坐了七年黑牢。在獄中可能備受折磨與非人道刑求，出獄後已神智不清，成了半植物人，最後含冤而終。

我這位當年一度顯赫的姑丈，在大陸時代我從未見過。他在台出獄後我去看他時，他已神智不清，狀極可憐；也是極權政治最可悲的受害者之一。雷公和史姑丈他們在大陸、在台灣都過從甚密，而牢獄之災亦相同。

雷公和我談了兩個多鐘頭這一類的事，彼此都歎歎不盡。

臨別之時，我們相約再見，下次到他家中吃飯，並好好再談談，誰知竟是永別。如今雷公墓木已拱，憶別時言語，真是「懸劍空壠，有恨如何！」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於北美洲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第一八七期

王賡武天降大任

現時異星突起，在國際間頗享清譽的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和好朋友。由於王君近時譽滿中外，有些新聞界的友好知道我忝在交末，便強迫我寫一點「我所知道的王賡武」一類的文章。其實關於「我所知道的」實在無法多寫，因為賡武和我雖同是當年大陸上「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但是我比他底班次高得多，而中央大學當年又是個全國性、迺至國際性很強的國立京師大學堂。海內外負笈而來的莘莘學子，真是似霧如雲。賡武是戰後始放入中大的南洋僑生，對我這位老氣橫秋的「學長」他是不認識的。我雖然在校中不認識他，但我覺得我們當年國立大學裏的學生有一種特有的氣質——這是我們的共同底文化背景。我們是一個文化模子鑄造出來的，自有其相同之處；因此「我所知道的」這一點，倒未始不可談談。

英倫初晤的印象

我認識王賡武不在四十年代的中央大學，而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倫敦。

遠在五十年代之末，大陸上史學界曾搞起一陣馬克思史學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海外漢學界聞風響應，乃於一九六三年在倫敦也搞個討論當代中國史學的會議。一時海外漢學名宿羣集倫敦。我那時附驥參加，年紀還不算太大。賡武也參加了，而他在這一會議上卻是個小老弟。

這個會議的會場是設在牛津大學附近，一所英國王族的別墅。議程長達一週。這別墅築於一個郊區花園之中，雕樑畫棟，十分豪華。因此我們華裔會員均戲呼之為「離宮」。當時漢學巨星如楊聯陞教授等，都有詩紀其事。不才附庸風雅，也做了些歪詩。還記得有兩句說：「行人漫說離宮美，憶否圓明劫後灰？」

我們這羣與會人士，就在這座「離宮」裏，像和尚坐關一樣，被關了一星期。同人——尤其是華裔——日夕相處，我和賡武才熟絡起來。那時與會諸賢均係歐美名家，差不多都是熟人，彼此之間的「漢學」底子究有多深，大家都心領神會。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中文圖書部主任；同時在哥倫比亞研究院作助教授，教授「目錄學」。與會諸公諸婆底宏文鉅著，無一不縷述於我的「目錄」之內，因此各大家道行如何，我這位「目錄學教師」對之均有持平之論。只有少數剛露頭角青年學者，才間有遺珠之憾，而賡武便是當年第一個剛露頭角來參加開會的青年史學家，我自然對他也就份外注意了。當我發現賡武竟是我底中大校友時，我對他的友情和好奇心，不消說就特別加重了。

我在中央大學讀書的那四個年頭，實是我個人成熟後的生命中自覺學問最大、心情最好、身體最壞、生活最苦的四年，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半個世紀過去了，現在，我所遇見的當年「人間一壩」（沙

坪壩)的舊伙伴，無不有此同感，因而彼此之間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友情。但是我那時在倫敦碰到賡武，友情之外還兼具好奇心，因為他是當年我母校的一位「南洋僑生」。而「南洋僑生」和當年中大的「朝鮮學生」、「邊疆學生」等等，都是構成中央大學學術面貌多采多姿之一環。

賡武在倫敦所給予我的印象是一個兼具中國國立大學學生瀟灑底儒生氣質，和端莊的英國紳士型的青年學者。他說的一口純正的英國英語，和不帶地方口音的中國普通話。他底馬來語文也十分流暢；其他歐洲大陸的語文亦頗可使用。賡武也長得一表人材。風度翩翩，器宇非凡。看到賡武，就使我想起那時還在向我「口述歷史」的顧維鈞大法官來（顧氏時任職於海牙國際法庭）。我想此子也可做個顧維鈞型的第一流中國外交家；也可做個第一流的中國「京師大學堂」的堂長。只因國族不幸，自相砍殺，把這種第一流的人材胚子，都給浪費了；使他被趕到這兒來和一些老男、老女、教書先生們開他個什麼「漢學會議」——我為賡武這樣難得的專材可惜；並為國族有才而不能利用，嗟嘆無已。

再見於北京

倫敦會後不久，我便聽說賡武從新加坡轉到澳大利亞去了——還是在教書，搞他所不必專搞的漢字和中國歷史。我心中總是嘀咕：賡武是個指揮官、大學校長、和中國駐超級強權大使的一級人材。他和我們這些別無所長的教書先生、老兵榮民，在一起吃粉筆灰，未免太委屈了——他應在「國宴」之上吃其山珍海味、超級大餐才對，胡為乎與我輩盪舟於赤壁之下呢。

倫敦一別二十年了。直至一九八五年秋初，大陸上舉行個「林則徐誕辰二百週年紀念會」，寄居北美的中國教書先生鄧嗣禹、何炳棣、陳志讓和我，應邀到北京參加。在北京，豁然又碰到賡武。故人相逢、份外歡娛。北京重遇，余已年屆二毛，而賡武也「偶有幾根白髮」，歲月催人，均多感慨。但我看到賡武自青年已轉入中年，言談丰采，自更非青年期可比。做大使也應是「外交團」的團長了。他本是台閩中人，竟真要與我輩庸材終老於粉板之前哉？我仍然爲他嘆息——不是嘆息他懷才不遇，而仍是嘆息國族之多艱，使他縱是錐在囊中，終無安車蒲輪，徵而辟之，使其脫穎而出。時代如斯，夫復何言！可是會後不久，消息傳來，賡武終於應聘出掌「香港大學」。聞訊之下，我不禁脫帽向港大「校長徵聘委員會」，致最高之敬意。

英語國家，乃至他們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夠在今日世界如此安定和繁榮，實在是因爲他們真能做到孫中山向李鴻章所說的「人盡其材、地盡其利、貨暢其流。」尤其是英美西歐第一流大學校長，和大企業經理之選聘，那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揀精揀肥，毫不含糊。大家不論親疏遠近，唯材是視，務使人稱職而後已。

我不是說英美第一流大學校長中沒有「飯桶」。哥倫比亞大學以前老校長艾森豪就是個大飯桶。那是哥大當年增聘委員會一時疏忽，犯了英雄崇拜的錯誤，不是私心用事的結果。艾氏之庸碌，實出徵聘委員諸公婆意料之外也。但在一般情況之下，都是人稱其職的。港大如今選聘王賡武爲校長，就是中國謀求現代化，杜絕後門，最應該學習的活生生的事例！

翠亨夜話

去年十一月，廣武和我竟然又在中山故居的翠亨村碰頭了。此次見面除我二人之外，還有他底夫人和我的老伴。廣武夫人是位卓越的英語教師，每好以改正公私文件上欠通的英語為消遣。

這次廣武是才得所用了。我不是說他脫穎而出，為他慶賀，只是覺得他做其所應做之事。其才其德，是使他對所做之事勝任愉快，而其貢獻可能是無法衡量的。

以王廣武其人於今日出任香港大學校長，其才華見識、其時機遠景，都會顯出孟子所說的「天降大任於斯人」的實際意義。肩挑港大，廣武不特可做得勝任愉快，他甚至可以在中國三千年高等教育史上寫出劃時代的一頁。

一次我們在「翠亨賓館」夜喝咖啡，廣武虛懷若谷，認為他於此時此際出掌香港大學，責任重大，很想聽聽朋友們的意見。有的朋友認為中國近有大學千所，十年之後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大學」便是中國國立大學之一所，王校長應於此「轉移時代」，把港大逐漸引入「主流」，庶幾十年之後，落葉歸根，一拍即合。

於此，不才卻獨持異議。我認為廣武不應隨波逐流；應拿出魄力來，乘此時會，以十年時間，為中國辦出一所真正合乎國際標準的現代化大學，從而引導中國高等教育的全盤改革。廣武是有此訓練、有此眼光、有此魄力、有此契機的現代化大學校長，導致中國大學教育現代化，正是他底天降大任呢！

我認爲中共辦了二十多年的大學（劃掉文革十年），還未辦出個什麼「主流」來。當今的「四個堅持」，豈是中國辦高等教育的主流指導思想耶？

毛澤東在文革時就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我說的是理工科大學……。」他也問過黃永勝讀過多少年書，黃說，六個月。他說得毛氏龍顏大悅，盛讚黃永勝只讀過六個月書，就可以做人民解放軍的總參謀長。（上引毛語均見《毛澤東思想萬歲》）——這種讀書無用論的「毛澤東思想」，還能以主流自居，指導我輩在大學教書哉？

董仲舒比馬列高明

老實說，縱使搞罷黜百家，獨崇一術，是辦教育的指導原則，則中共之學習馬恩列史也是錯誤的。我們自己的董仲舒、公孫弘的辯證法，便遠比馬列高明。

且看他們二人所搞的「罷」一「崇」，一搞便是兩千年。他們搞的多麼光鮮、俐落、漂亮。時至今日的李光耀還想去「獨崇儒術」一番呢。

可憐我們的毛主席，威武一時，才「罷」了二十年，就被鄧小平、胡耀邦「開放」掉了。身死「罷」滅，老婆坐牢，爲天下笑。如今鄧小平搞個天下粗安，又想恢復先帝之遺則耶？如此，則二十年後，豈不又要爲天下笑？當局者迷，讀史者清。二十年光陰，白駒過隙也。不信，等着瞧罷！

因此，處於這種是非難分之際，身爲祭酒的王賡武博士，就應該拿出自己的魄力、自己的主張來。

還有就是現行中國大學的體制，也真是非牛非馬。一位大陸上的大學校長告訴筆者說，在他底貴校之內，師生員工，一切日常生活，除火葬場外，他樣樣都得管！這是以前「以俄爲師」而走火入魔的怪現象。十年之後，王賡武校長的「國立香港大學」，也要回歸到此一「主流」哉？

大學校長不是公社的黨委書記嘛。柴米油鹽、夫妻吵架、馬桶漏水，可以不必管了吧。

中共一竿打翻兩條船

簡而言之，中國人本是搞高等教育的老祖宗。老祖宗自有其良莠不齊的傳統。它可以不斷改善、改革，從而現代化。不可一竿打翻，全盤否定。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二十年，爛污甚多，但它所辦的高等院校，卻一枝獨秀、有聲有色，永垂不朽。以至今日中共搞建設的高知主力，多半還是國民黨當年所訓練而留下的遺老。如今若輩均垂垂老矣，但是卻以接班無人，還各自在其崗位上，拚其老命。

國民黨執政時代，非不想搞「黨化教育」。「國立中央大學」便是黨方所覬覦的最大目標。但是中大卻始終保持了它的清白。縱是國民黨的總裁兼任校長的時代，他也沒有改變中大清白無染的傳統校風。

中共上台後則不然，它不但把中國高教傳統全盤否定；連西方傳入的優良制度亦一概摒棄。黨人，尤其是毛氏，自作聰明，一竿打翻兩條船，徹頭徹尾，另搞一套，才搞出目前這種非牛非馬的制度來。

如今積重難返，悔之已晚。中共執政三十餘年，對高等教育所造成另一種災害便是以黨馭校，搞出滿教室我輩當年所最鄙視的小黨棍，而美其名曰「光榮入黨」，造成一羣爲黨派作爪牙的特權階級。國民黨雖具體而微，它搞校園黨團，原亦如此。想不到近年蔣經國竟有此眼光與魄力，將國民黨組織撤出大學，這真是個劃時代的進步。在這方面，則中共就顯得心虛膽怯，封建落伍多矣。如此，則一個落伍封建的制度，硬要吃掉一個開明進步的制度，則人世間還有是非曲直嗎？在兩黨和平競賽的今天，中共二三代的開明領袖們，真應閉戶作三日思——槍桿可以出政權，但槍桿不是萬應靈藥，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

恢復學府尊嚴、好自爲之

總之，中國大學的前途在恢復高等學府的清白與尊嚴，不能爲黨派政治所奸污。今日作爲西方文明的代表機構，便是歐美第一流的學府，從牛津、劍橋、柏林、巴黎等大學，到美國的哈佛、耶魯、哥倫比亞……他們都有數百年莊嚴清白的歷史。

當代中國學府歷史雖較短促，然而賢人輩出。我們希望賢而有魄力的王賡武校長，也能承繼蔡元培、胡適之、傅斯年、馬寅初……諸先賢的遺志，重領風騷，把港大辦成個當代中國的模範大學，使僵化了的中國大學教育隨之復興而邁入兼有中西之長的正路上去。

寄語賡武，任重道遠，好自爲之！

有幸有不幸

——美國華人作家看王蒙

有些平民作風

一九八一年在北京友誼賓館中朋友的公寓裏第一次認識王蒙，聊天聊到半夜。後來，他們一夥人夜遊去了，我因為太太在，沒有奉陪。

王蒙來美國幾次，每次來都是被人重重包圍。第四次見面時，王蒙同我擁抱，我告訴他，前幾次你被人重重包圍，要我突破重圍去和你擁抱，實在沒有這個勇氣。

我見過的中共部長級的高幹很多，而王蒙是高幹氣味比較淡的，究竟是寫文章的人，有些平民作風。

王蒙的東西寫得不錯，他的成名之作《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我很欣賞。王蒙生在這個大時代，若能讓他盡量發揮才能，不受限制，其前途是無限的。當然先決條件是要有完全的寫作自由，根據他經歷的解放、反右、文化大革命一路下來，用他的筆反映偉大的時代和人生，必將產生極有價值的作品。

王蒙現在幹這個事情，當文化部長，對他個人講，有幸有不幸。我記得中央大學的老校長羅家倫先生，他就認爲自己是一位很可以造就的史學家或者是文學家。一旦做了官，當了中央委員，他的時間就被官佔去了，而其成就受到了限制。王蒙現在當文化部長，如果真能推動中國文藝界的春天，在他主持文化工作期間，大陸上能產生一兩部偉大的作品，那就是最大的樂事。因爲以歷史的眼光看，部長實在不算什麼，我們看京戲，穿一身紅袍、一身藍袍的，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部長在過去叫尚書。中國的尚書，不知道有多少，可以說是成千成萬；而中國偉大的作家却是屈指可數的。像司馬遷、曹雪芹有幾個呢？我看，作爲文化部長的王蒙，對於作家王蒙說來，也許是個 *Setback*（挫折），是個損失。

文化部長這官不大好當

其次，文化部長這個官也不大好做。不管怎樣，他是共產黨，共產黨的框框不容易丟掉。他要替黨執行政策，再自由、再民主，都擺不脫框框的束縛。從海外的角度看，共產黨能找到像王蒙這樣的人主持國家的文化工作，值得慶幸。因爲王蒙被劃過右派，具有比較自由的觀點，會做得靈活一些。但共產黨「意的牢結」在那裏，他還是要維護的。文化政策如果交由王蒙去制訂，他必須各方兼顧，一定很辛苦。如果由黨制訂好交他執行，那就更難。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那一套東西，到底繼續不繼續呢？如果不繼續，又怎麼堅持毛澤東思想呢？如果繼續，創作自由也就談不到了。黨訂出一個原則，你寫東西要按原則辦事，要達到一個目的，要爲政治服務，要考慮社會效果，即使給你自由，也是可伸可縮的。

。這個框框要由王蒙來把它放大縮小，都是艱巨的任務。一句話，他的工作不大好做。

最後，按照我們學歷史的觀點看，我作為王蒙遙遠的朋友，認為眼光要看遠一點。毛澤東講：「俱往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能算不偉大，而今安在？就以毛主席說，他怎麼知道他做了二十多年「皇帝」，死不到一個月，老婆就被人抓起來了。毛主席當年站在天安門上那種氣概，何等了得，無論如何不會想到自己的老婆是這種下場。大丈夫不能保妻可是奇恥大辱。像毛主席那麼偉大，連妻子都保不住。所以，我們做當代文人，痴生數十年，看他起高樓，看他宴賓客，看他樓塌了。因此，話說回來，眼光決不能看得太近。但王蒙有他實際的困難，如果他看得太遠，過份理想化，就不適合他的職位，如果過份為職位着想，忘記了歷史上的前途，也是一個 *Setback*。二者取捨之間，就要看王蒙如何權衡輕重，發揮他的智慧了。

我們在海外的人，希望王蒙好自為之！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於紐約市立大學

原刊《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號第一一九期

唐

德剛教授的文章，被稱為海內外第一流文筆。

政論文章，常使人懾懾欲睡，敬而遠之，唐德剛教授論政，令人讀來痛快、過癮，拍桌叫絕。

嘻笑怒罵，皆含深意，諷貶評讚，均合道理。

寓莊於諧，論中國百年困惑，錯誤與苦難，不必皺眉頭，摧心胸！

——胡菊人

定價：港幣四十八元正